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文化和传播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信息方式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美] 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http://www.cp.co
ISBN 978-7-100-09940-0



定价：24.00 元

文化和传播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信息方式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美]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

周宪 校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创于1897

2014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息方式/(美)波斯特著;范静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文化和传播译丛)

ISBN 978-7-100-09940-0

Ⅰ.①信… Ⅱ.①波…②范… Ⅲ.①传播媒介—研究 Ⅳ.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180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文化和传播译丛

信 息 方 式

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

〔美〕马克·波斯特 著

范静哗 译

周 宪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940-0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¼

定价:24.00 元

Mark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Copyright © 1990 Mark Poster
First published 1990 by Polity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Basil Blackwell
根据波利梯出版社 1990 年版译出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lity Press Ld. ,Cambridge

文化和传播译丛

总　序

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与动物的根本差异，就在于人的未特定化，因而人有超越自然的文化。哲学家深信，人不但生活在物理的世界中，同时也生活在符号的世界中。所以，亚里士多德“人是逻各斯的动物”这一经典定义，可作如下新解：人是符号和文化的动物。

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于是，人是文化主体，同时又是文化的对象。人生存于世界上，也就意味着人在文化中。这种复杂的依赖关系，或许可以通过稍稍修改一下康德的著名公式来表述：“我在文化中，文化在我心中。”

文化总是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举凡人类的器具用品、行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皆为文化之符号或文本。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从符号的角度看，它的基本功能

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符号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向人们传达某种意义。因此，从根本上说，表征一方面涉及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被表征物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和特定语境中的交流、传播、理解和解释密切相关。这么来看，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所以一些文化学家坚持文化的核心就是意义的创造、交往、理解和解释。

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文化总是和传播密不可分，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文化史家把文化传播的漫长历史做了精致的分期。大约可以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口传文化阶段、印刷文化阶段和电子文化阶段。在口传文化阶段，面对面的在场交流形式与语境，既使得交流是双向互动的，又使得传统的权威得以维持；印刷文化阶段，信息不再依赖于在场，它贮存在可移动的媒介（印刷物）中，使得不在场的交流成为可能。印刷文化出现，在跨越时空限制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的权威。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里，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交流，更加带有批判、怀疑和“改写”原本的倾向。20 世纪电子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历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式，遂改变了文化自身的形态，甚至改变了生存于其中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电子媒介这样深刻地影响到整个社会。

电子媒介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现象。首先，它加速了全球化和

本土化的进程。通过时—空分离或时—空凝缩，“地球村”应运而生。一方面是本地生活越来越受到远处事件的“远距作用”；另一方面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意识异常凸显。我们—他者、本土—异邦、民族性—世界性等范畴，不再是抽象的范畴，而是渗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次，电子媒介在促进文化的集中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不可避免的零散化和碎片化。再次，电子媒介一边在扩大公共领域的疆界和范围，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但同时它又以单向传播、信息源的垄断以及程序化等形式，在暗中萎缩和削弱潜在的批判空间。复次，电子媒介以其强有力的“符号暴力”摧毁了一切传统的边界，文化趋向于同质化和类型化，但它又为各种异质因素的成长提供了某种可能。最后，电子媒介与市场的结合，必然形成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被动的文化行为，这似乎都和口传文化和印刷文化判然有别。

晚近一些有影响的研究，主张把媒介与文化这两个关键词连用，或曰“媒介文化”，或曰“媒介化的文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它构造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关于自己和他者的观念；它制约着我们的价值观、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它不断地利用高新技术，诉求于市场原则和普遍的非个人化的受众……总而言之，媒介文化把传播和文化凝聚成一个动力学过程，将每一个人裹挟其中。于是，媒介文化变成我们当代日常生活的仪式和景观。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的文化情境，显然，我们

对它知之甚少。

有鉴于此，本丛书着力于译介晚近西方传播和文化领域中的代表性论著，旨在拓宽视野，深化理解，进而推进本土化的研究。

周宪　许钧

1999年9月序于古城南京

中文版前言

马克·波斯特

适值《信息方式》译成中文之际，我想借此机会简短回顾一下我自本书1990年以英文面世以来的工作。《信息方式》探讨了后结构主义理论与电子媒介交流的关系，指明前者如何使后者可被理解，而后者又是如何破坏并改变前者的轨迹。因此，《信息方式》首开一种思考方式，但并未将其触觉伸及它的所有意蕴。

其后，我于1995年出版的《第二个媒体时代》一书则力图纠正这本书的某些不足。我特别对后结构主义和电子传播的结合提出来的一些政治问题，开始进行更为详细的考察。我探讨了后现代理论及新技术与多元文化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关系等论题。我还述及哈贝马斯的共识交流理论与波德里亚的模拟符号学。最后，我对早期关于福柯的话语理论与数据库的关系的讨论，尤其是关于主体的构成这一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拓展与澄清。《第二个媒体时

代》的另一首创是联系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发展将刷新我的理论分析。《信息方式》考察了法国迷你电信（Minitel）这种联网电脑的早期试验，从而引入了作为交流技术的联网电脑这一问题。但是，全球化的电脑网的蓬勃兴起是90年代初的事，这时的网络有文字、有声音、有图像。因此，我在《第二个媒体时代》中便能够界定诸如收音机、电影、电视这类播放媒体与因特网这样的互动媒体的特别重要的区别。我把信息方式的概念进一步引入对因特网的分析中，从而使我能够辨别在新技术下身份的形成有着这些独特特征：即人们坚持将自我构建看成是技术文化的直接特征。在因特网社群中，人们为了联机交流而塑造一个身份。联机交谈的成功与否随人们以文字改变自己所塑造的身份的能力而定。我把这种实践理论化，认为这是因特网所特有的，尽管早期的一些习俗，如化装舞会、私人广告以及笔友，也预含其某些特征。关键之处并不是在意识中进行理想主义的自我构建，而是在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中，身体与言语行为或书写的分离使得自我构成的新形式成为可能。这些实践新就新在它们对停泊于社群中的中心主体这一历史幻觉进行系统化的抵制。

自1995年以来，我的工作就一直集中于对因特网进行理论考察。在《赛博民主：因特网作为一个公共领域？》（Cyberdemocracy: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一文中，我批判了人们

常见的那种将赛博空间并入现有的民主形式中的努力。我论证，在赛博空间中，身体与精神的关系、主体与机器以及新的时空适用域的关系已经改变，这暗示了因特网中的政治不会只是旧的统治方式的增补，而且暗示了力的种种新关系将在电子社会中发展起来。《虚拟现实的理论化：波德里亚与德里达》以及《虚拟种族》两篇论文所探讨的问题是联网电脑所特有的那种现实，以及这种现实可能会如何影响种族性。人们置身于赛博空间时，能否继续保持其植根于地域的种族身份？有了因特网就可能出现一种全新的全球政治，《民族、身份与全球技术》一文则比较了印刷在民族身份的形成中所起的作用与因特网上的书写条件。《数字作者与印刷作者》一文考察了福柯的作者功能这一观念，进而对比了书籍时代的原作者身份（authorship）与全球化的多媒体超文本的原作者身份。我们所知的原作者身份这一概念具有合法的思想特性的框架，因此我提出这一问题，在出版向游移不定的电子化转换时，这种原作者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技术的存在》一文对海德格尔论技术的论著加以批判，赞许他拒绝把工具性当作对机器的解释，但也质疑他的理论对信息机器的适用性。作为对自然和人的“挑战”及“储存”的技术被海德格尔界定为工业时代的原则，人们是否能够对赛博空间的技术也进行如此理解？

我目前承担着两个项目。其一是有关数字生产与复制时代的

商品。我的问题是，当物体已变成非物质或教字化的时候，对商品进行资本主义式的构型是否还有可能？其二则是向因特网日益发展的世界提出一个很一般的问题。因特网到底是何物？我的论点是，它与笛卡尔所谓的“广延物体”的任何以往形式都不相似。广延物体使得“思维客体”能够将其自身构建为一个外部他者，处于一个能够认知并掌握广延物体的位置。因特网便是一个广延物体，就像一把锤子：无论其构型是多么复杂，它仍由物质客体构成——电脑、电话线、通信卫星和电缆线。然而，它并没有早期广延物体的固定性和种种局限，而是更像心智或精神的本质上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物体迷惑了主体与它的他者之间的正常联系，为人类结构的形成打开了种种新方向。我们是否将要进入一个决定性不足（underdetermination）的世界，自我在这一世界中将被结构成后人类（posthuman）？我计划在以后的几年里，探讨新媒体所提出的这些较为棘手的问题。

献给 Jamie

目 录

致谢 1

导论　无物之词 3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贝尔与修辞问题 31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经济学的语言 61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参与式监督 99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电脑的主体 139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后现代政治的诸种可能 183

注释 221

人名索引 243

译后记 247

致 谢

本书观点的酝酿发展历经数年。在此期间，许多同事及朋友以评论、建议、批评、鼓励及警示等形式参与了这一过程。我对下列诸位的帮助以及他们阅读我手稿的不同章节表示感谢：David Carroll,Andrew Feenberg,Rob Kling,Tania Modleski,Leslie Rabine,John Rowe,Gabriele Schwab,Martin Schwab,Miriam Silverberg,Jonathan Wiener.Robert Sieber 帮助我完成第五章中所讨论的关于电脑科学学科的研究。我在不同研究所提交过本书中的材料，在此过程中获得许多人的有益反馈。对他们的兴趣及关心，我深表谢意。在过去的十年中，我深深得益于我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批判理论研究所的工作；这不仅是经济上的支持，而且有诸位同仁对我的工作的反馈意见。加州大学的校长人文研究基金会容许我有时间写完此书。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历史系学生以及学校对批判理论的重视，以及他们对我观点的怀疑、热忱或批判使我获益匪浅。导论中的部分内容以“无物之词：信息方式”为题刊载于

《十月》学刊第五十四期（1990 年冬季号）。第三章的部分内容以“福柯与数据库”为题刊载于《话语》第十二卷，第二期（1990 年春夏号）。第四章的部分内容的初稿将以“电脑的主体：德里达与电子书写”为题收入 Jose Lambert 编的《文学与技术》（*Literature and Technolog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一书（即出）。

无物之词

一个人口相对稀少的国家，若其交通手段发达，其人口就比一个人口数量大而交通手段不发达的国家稠密；从这层意义上讲，例如，美利坚联盟北部诸州的人口就比印度的稠密。

——马克思《资本论》

以电子设备作为媒介的传播环节与日俱增。人们看电视、打电话、听收音机、看电影、使用电脑、传真、录像机及音响。这样的手段存在于每个机构及每个社会群体。政治、工作、消费、家庭、军队、教会、教育、休闲活动——一切的一切都在不同程度地采用电子装置进行交流。每种情形下，符号的交换、信息的发送与接收、资讯的获取都仍像人类使用语言之初，一如既往。然而，变化总还是有的。电子交流手段因为其电子化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为新的语言经验。但是，它们与普通的言说及写作有何差异？此差异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本书便探讨这些差异，并

特别考察种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它们可能会有助于从这些差异的角度为社会批判理论开辟一些新的阐释策略。

有些评论者论证，电子设备的引入并没有对某种交流的性质或结果造成实质性差异。在电视竞选广告上游说的政客，仍然得
2 按宪法的民主准则尽力获取选票。工人用电脑控制流水线工序或打印一封信，还是以聘用合同按劳取酬，这跟过去是一样的。消费者通过看电视获得的商品信息，其商品仍然只是能在商店里买到的，这与读报了解信息极为相似。军人用电脑控制导弹以击中目标，正如箭手以目力瞄准一样，操练的仍是毁灭敌人的艺术。电子设备只不过增强了所讨论的这种交流的效率而已。从这一角度看，语言似乎只是有所行动的人类主体实现其目的的一种工具，与特定体制结构中个体具体职位的意图相比，其重要性显然处于次要地位。

电子设备也没有使得解释传播的性质的诸种理论失去效用。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新的交流手段仍然被囊括在阶级斗争的论题之中：一个人能否获取更多信息，因其在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而不同。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言，电子媒介强化着文化工业，使意识形态的霸权力量更加强劲。对经济学家而言，市场法则决定了谁将使用电脑，谁将在电视上做广告，谁将给收听无线电的人播放他们的歌曲。对一个韦伯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使社会进一步分化为各种亚系统，并助长了科层权力。对自由主义者而言，电子交流不会游离于名目繁多的宗派间的权力角逐之外。甚至对技术决定论者而言，这也毫无新意：电子媒介进一步

证实机器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进步，机器减轻了人类的艰辛，使自然顺乎人类愿望。无论一个人的理论视角是什么，其结论似乎都不容争辩：事物并没有随着电子媒介交流的引入而发生根本改变。

这些视角都看出并谈到了电子交流带来的某种改变：人与人之间符号的交换如今已不再受到时空的制约。如今，从理论上讲，全球范围内的信息瞬息即得，并且只要有电能就可以存取信息。时间和空间已不再限制信息交换。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而随之而来的诸多重要结果，将会对现有种种理论及立场的适当性提出质疑。60 年代末，越战场面被电子化再现，传送到美国家庭，对政治造成的影响令人振聋发聩。1985 年菲律宾叛军占领了一家政府电视台后进行的播送，使公众对他们的成功更加确信无疑，从而深刻地影响了马科斯政权的命运。最近出 3
现的电视直销则预示着消费品营销惯例的一场革命。对指纹进行电脑分析，而给逮捕疑犯提供线索，这使得执法部门的情报获取手段达到了一个新水平。电子媒介为人们展现的全球信息瞬间即可获得的这一前景，显然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仍然有待确定。电子媒介对时空的征服所预示的是，理论及种种机制仅仅再转一转惯例和观念的调谐钮是远远不够的，它们这样是收听不到新的传播频率的。

例如，电子媒介使得互联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这便加重了社会网络的脆弱性。以研究机构的电脑网络为例。早在 1988 年 11 月，报纸便报道了一家由国内的军队、公司和大学约 6000 台电脑联网的 ARPA 网（译按，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计算机网）

被“一种病毒感染”，结果是功能瘫痪。[①]“病毒”是附着于其他程序或文件上的一个很小的“程序”，或者说是一组指令，它在进行自身常规操作的同时又可以复制自己。病毒既能在一台电脑内传播，又能随着电脑文件或信息的传输从一台电脑传输到另一台电脑。病毒还能执行种种指令，这些指令可以是“在屏幕上显示‘搞到你啦！’”这样没什么危害的指令，也可以是“删除硬盘上的所有文件”这样灾难性的指令。1988 年 11 月份出现的那种病毒只是锁死了电脑的存储器，无限制地复制自己。对用户来说，关闭 ARPA 网代价很大，而又无可奈何。尽管没有文件受损，没有资料丢失，也没听说有什么犯罪行为，但中央情报局还是被召来追查肇事者。

病毒是指在活的有机体间传播疾病的介质。把这一术语转用到电脑上，也就强调了电脑网络与活的有机体间的相似性：电脑相互联结得如此之深，这就使得它们的行为好像一具身体中的许多器官一样。正常情况下，机器若是机械性互联则不会把物理力传输到其他机器上，因而这一互联链中的其他点上仍然可以不受故障的影响。电脑则像活的机体一样，呈信息性互联，这样就能相互传递复杂的指令，从而可能使整个电脑网络失灵。随着越来越多的机构日益与电脑网络相联，并依赖它们发挥其作用，社会
4 便像产卵一样产下了大量的电子的、信息的“机体”，它们像人类社群一样易受“传染病”之患。如今正当艾滋病毒威胁人类社群之时，其他病毒则威胁着电脑社会。若说艾滋病由性接触传播，电脑病毒的肇始，在 ARPA 网一例中，则出自俄狄浦斯式的性心

理语境。该病毒的原创者乃康奈尔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其父亲是一位电脑安全顾问。如此看来，资讯学分析（Cybernoanalysis）与心理分析两个领域似乎可以相互联系了。但是电脑病毒实在常见，且出现的日益频繁。1989 年 1 月和 2 月所报告的病毒总数达三千例。[②] 病毒不再是一出弗洛伊德所言的俄狄浦斯情结戏（Oedipal drama），也许应把它看作是一种新的对抗形式，所抗衡的是控制着电脑化信息的那些人。

在另一个颇为不同的层面上传布着这样的报告，说电脑显示器，实为整个电子网络，能改变 DNA，从而在深层影响使用者的身体。[③] 如果说病毒这个隐喻暗示，电脑网络已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机体，那么与电脑显示器打交道便受到潜在的辐射影响这种说法，则暗示电脑与其使用者之间的联系已经密不可分。人类与机器间的共生合成体（symbiotic merger）可说是正在形成。我们一直觉得人类身体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界限，而这种共生合成体威胁了我们这种感觉的稳定性。人类创造了电脑，接着电脑又创造新类型的人，这也许正在悄然发生。无数电影（如《机器警察》）和科幻故事（尤其是菲利普·K. 迪克的小说）对此已有预示。虽说这些推测有可能把我们引向一些极富成果的方向，但我们可不能撇开眼前更为直接的问题。

电脑病毒传播的速度之快更加显明了信息方式时代中社会新的脆弱性。从病毒开始传播到整个网络的关闭，几乎不用什么时间。同样，1987 年 10 月证券市场瘫痪的消息瞬间便从纽约传到伦敦和东京，而对方的反应传回纽约的速度也同样之快。两个地方

相距甚远，本可给人提供一点时间宽限，以便使人作出谨慎的反应，而如今距离已不再起缓冲作用。金融恐慌自一个金融中心传到另一个金融中心，犹如动物对危险的感觉一样很快便传遍整个群体。《纽约时报》报道过一件事，注意到了电脑对股票价格下滑的影响。[④] 通信网络把世界金融中心连接起来，使它们能更好地获取信息，但同时也使它们可能在顷刻间经济瘫痪。于是乎，语言的高效率传输这一简单实用的优点，只是因为速度的提高而变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确如量变“辩证地”转化成了质变。而这一社会现象促使人们对文化的语言学层面予以细致关注与考察，这也许是史无前例的。

有些分析家认识到，研究电子交流所要求的不只是对新技术或新机器的关注，此研究也不只是意味着符号交换效率的逐渐增强。卡洛琳·马文（Carolyn Marvin）做过一项这样的研究，她论证说：电子交流的历史“与其说是交流效率的演变，还不如说是人们在一系列竞技场中所商谈的对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至关重要的种种话题。这些话题包括：谁在场内，谁在场外；谁可以说话，谁不可以；以及谁有权威且可以相信。”[⑤] 例如，她成功地论证了电话的引入不仅仅使得人们可以进行远距离交流，而且拓展了谁可以与谁交谈的界限，从而危及了现存的阶级关系；它还改变了求婚的模式以及风流韵事的种种可能。同样，电灯的引入极大地改变了大众休闲及文化：例如，夜间的观赏型娱乐活动对大众文化影响很深，它们便是电灯带来的产物。[⑥] 因此，很显然，电子交流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社会问题。

马文将她对电子交流的展望归纳为如下理论观点：种种新技术“企图精略、简化，或者强化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规范的行为准则，其结果可能会使这些常规被重组成一些新事件”。[7]在此理论前提下，虽然她认识到了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在技术革新关头对塑造新的交往模式所起的作用，但她却没有质疑这些变化所蕴涵的某些更为广阔的理论意义。为了识别这些“新事件”或新的交往行为，就必须对行动与语言、行为与信念以及物质现实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重建，从而将现代社会中交往方式的性质作为问题提出。尽管文化主义观点展示了交往方式研究已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诸如马文的分析所示，但所取得的进展还不足以从新的交往形式的角度，对主导性的理论范式和学科范式提出质疑。

要想恰如其分地描述电子化交流方式，便要有一种理论，能够对社会互动新形式中的语言学层面进行解码。作为向这一目标迈进的一步，我在此提出信息方式这一概念。“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这一术语借用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其他著作中，马克思赋予生产方式以两方面的含义：（1）作为一个历史范 6
畴，它按照生产方式的变化对过去进行区分和分期（区别不同的生产手段与生产关系的组合）；（2）作为对资本主义时期的隐喻，它强调经济活动，把它看作是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终极的决定因素”。我所谓的信息方式也同样暗示，历史可能按符号交换情形中的结构变化被区分为不同时期，而且当今文化也使“信息”具

有某种重要的拜物教意义。

每个时代所采用的符号交换形式都包含着意义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以及意义的手段和关系。信息方式的诸阶段可以试做如下标示：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以及电子媒介的交换。若说第一阶段的特点是符号的互应（symbolic correspondences），而第二阶段的特点是意符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igns），那么第三阶段的特点则是信息的模拟（informational simulations）。在第一阶段，即口头传播阶段，自我（the self）由于被包嵌在面对面关系的总体性之中，因而被构成为语音交流中的一个位置。在第二阶段，即印刷传播阶段，自我被构建成一个行为者（agent），处于理性 / 想象的自律性的中心。在第三阶段，即电子传播阶段，持续的不稳定性使自我去中心化、分散化和多元化。

在每个阶段，语言与社会、观念与行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各不相同。这其中的某些差异将在第三章中讨论。在此，我只想强调一点，这些阶段并非“实有其事”，也不能在每个时期的文献中“找到”，而是由理论强加在知识获取过程中的一个必要步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这些阶段并不是历时存在的，而是同界面地（coterminous）存在于现时。它们之所以并非相继存在，还因为每一阶段中的某些成分至少也是隐含在其他阶段之中。信息方式这一概念的逻辑状态既是历史的又是先验的。在这层意义上，最新的阶段并不是对以往发展阶段高屋建瓴的辩证解决。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亦即马克思所预言的那层意义上，当今的构型

（configuration）必然是对早期发展阶段的总体化构建：也就是说，人们必定会在现时情境中看到早期的发展。套用马克思的观点便是，对电子化信息方式的解剖必然会使口头传播及印刷传播的信息方式的解剖更加明白易解。马克思的公式必须予以避免的危险是进步论（progressivism）。我倒宁可将当今时代仅仅看作是话语总体化所难以避开的语境，而不看作是发展过程的本体论实现。 7

如果上文这些阶段证明具有启发价值，那么它们将会有机融入各种规点的总库，使我们借此理解过去。从这层意义上看，这些阶段便是“历史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任何理论的诸概念都为该理论的经验主义研究提供所需信息，并使该理论的检验得以确定。由此观之，本书首先应被看作是将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价值引入传播史研究，并在该领域开创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的努力，故而也可被看作是福柯称为现时史研究的一个主题。

现在我想提及“信息”这一术语的某些特殊含义，并想指出此术语在第三阶段已开始具有的一种特殊的结合能力（valence）。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意符（signs）如今都被看作是信息，正如控制论中以及大众常说的那样，“信息”与“噪音”或无意义（non-meaning）相对。信息已变成我们文化中一个备受瞩目的术语。信息服务机构的电视广告告诫消费者和公司管理人士，如果他们或他们的孩子不能与当前的信息同步，就会在成功之途上的赛跑中落伍。信息被当作当代生活的钥匙呈现在人们面前，而社会亦被信息富裕者和信息贫困者所瓜分。“多信息的”人是一种新的社会

理想，对中产阶级来说尤为如此。而在美国，可以说除了无家可归的人以外，所有人都声称是中产阶级群体之一员。于是，本书标题中的“信息”这一术语也使人想到这种文化新局面的某种特征。人们对待这种局面必须抱疑虑态度。

因为心存这一警觉，我便要提出信息方式研究需要予以关注的几个主要领域。该研究必须包括对各种信息存取形式的研究，从岩洞壁画和泥碑到电脑库和通信卫星。信息保存和传输的每一种方法，都深深地交织在构成一个社会的诸种关系的网络中。例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如果没有文字记录，政府便不可能扩展。口头传信员只能依赖记忆，这严重限制着国力。分配给通信的资源只能是那么多，如果再多就会使军队和经济部门受到损失。便宜、可靠、耐久的通信是帝国所必不可少的。

如果弗朗兹·约瑟夫皇帝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以电话或电脑而非电报进行沟通的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也许就有可能避免。
8 这种断言并非太牵强附会。奥地利大公遭到暗杀后，德奥两国政府便一直急切地交换消息，了解彼此对俄国总动员的消息做何反应。威廉二世发给奥皇的电文大意是，德国不愿支持奥地利攻打塞尔维亚，但由于电报的诸多局限，收到这一消息已为时太晚，没能阻止战争——进攻开始几小时后，这封电报才收到。[8] 如今，平民大众对核战浩劫可能带来的全球大毁灭惶恐不安，而通信系统的神速则使得这一浩劫越发显得难以避免。同理，如果没有印刷机，也难以想象当代大众社会会呈现为现在的形态；意识到这一点，传播媒介的深刻影响和重要性也就无须赘言了。[9] 政治事

件、社群形态、经济体制都得由交流媒介进行协调。如果还是套用马克思的说法，磨坊与封建主义相联系，蒸汽机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那么同样，我也可以这样说，电子化通信手段则与信息方式相联系。时空对交流的限制程度支配着社会可能发展成怎样的形态，其力度之大非常显著。

尽管对交流的时空远距化（distanciation）进行研究是信息方式这一概念的重要环节，[10] 问题的核心却并不在此。这是由于在交流效率（*efficiency*）这一点上，虽然在上述讨论中至关重要，但却并没提出信息交换的构型，亦即我所称的语言包装（wrapping）这一基本问题。除非对社会性质的传统假定及解读此性质的理论提出质疑，否则对交流远距化所作的研究无论多么重要，也只能依旧是既成观点的补遗而已。如果交流只是能促进或阻抑其他活动，那么它就不会有独立的后果。要是这样，对于像信息方式这样的新理论何以发轫，就没有什么合理解释。而我则要从反面进行论证：从分析角度看，任何特定社会中的交流构型都是自足的经验王国，其自身便很值得研究。再者，20 世纪种种新交流模式出现得很快，这也构成了理论发展和经验研究一个亟待探讨的领域。新的语言形成（formations）尤其重要，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关系网络，并重新结构着它们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及主体。 9

音乐复制说明了电子介入是如何改变语言情境的。录音发烧友（audiophiles）小圈子力求在他们的家里制作出与音乐的原始演出完全一样的摹本（copy）。[11] 录音发烧友们坚信，某些录音的音槽中包含着创造音响技术奇迹所需的全部信息：即造成听众

身临音乐演出现场的幻觉。要想实现这一魔法，一切都得毫发不爽。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录音够格达到这一目的：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标签上的狗有色调变化的那种）可精选出几种，水星公司（Mercury）50年代末至60年代所发行的几种，百代公司（EMI）60年代至70年代初所制作的录音中有可数的几种。音响的部件必须细加选择并匹配，以便完美均衡地达到声音再现能力。甚至那些连接各部件的缆线也至关重要。房间本身也是一个音响部件，这是因为其声音反射与吸收的特性影响着所听到的音乐效果。录音发烧友坚持说，如果环境理想，当唱机在家中播放乐曲时，听者所听到的将会与在音乐厅所听的原始演奏非常接近。在这一情形中，录音发烧友把音乐信息或语言看作是艺术表达的中性媒介。他们认定，音乐信息可以在电子媒介形式中毫无改变地得以复制。信息作为一种表征，在此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摇滚乐的录制所呈现的语言构型则颇为不同。许多摇滚乐录音室开始建造时的初衷就是为了在家中再现。往往根本就不存在原始演出。取而代之的是每一位乐手先在不同的“音轨”上录好音；有些时候乐手实际上是在不同城市演出，而有些音轨，尤其是打击乐部，可能是从合成器上录下来的，根本就不存在“演奏”。技师把互不相干的“音轨”组合成一盘母带，这就成了“原始带”。技师这样做便带来了突出的变化：为了振幅和频率灵敏度或调性平衡，每一音轨都被调节了。除此以外，在录音中，乐器在音响音场内的位置也被“重新排布”，扬声器则被假定为恰好呈直角分开六英尺、面向听者放置。例如，对鼓声的平衡往往是要使每

一节拍好像分别从左右两个扬声器中轮流发出，这样，鼓手的位置就好像是在房间后部的开阔空间中。播放录音时，消费者所听到的演出并不是原始演出的摹本，而是一次拟仿（simulacrum），一个没有原作的摹本。这些摇滚乐演出只是在他们的复制中才存在。这种情形中，电子的介入生产出了数百万计的音乐信息的摹本，而这种音乐信息是永远不会在音乐这一术语的通常意义上演奏出来的。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说明信息系统能产生仿像（simulacra）。

电子的介入使得语言的传播复杂化，并颠覆了总想把语言的作用限制为一种简单的表达媒介的语言主体。录音发烧友这种情形表明，这种想原封不动地复制音乐的努力很快便超越了听者的意图。录音发烧友力求从乙烯基唱片的槽纹中汲取越来越多的信息，但很快便发现他或她比听原始演出的人所听到的还要多。录音发烧友声称能分辨出每一件乐器周围的空间，能从乐队所奏的复杂音乐中分辨出每组乐器的声音（例如中提琴声部或第二小提琴声部），从合唱中听出个别演唱者等等。例如，虽说合唱的目的是为了将众多人声混成统一的声波，而发烧友声称，他们借助昂贵的声响器材将复杂的声音分解为分离的音部，便能从合唱中分辨出个人的嗓音。由于电子介入，他们听到的“信息”就比听原始演出的人所听到的多了。原来只是沉迷于重现过去的音乐语言，如今这种沉迷不知不觉地演变成制作信息的新复本了。在信息方式中，复制原件就意味着创造仿像。

对许多发烧友来说，开始时只不过是为了在家里追求音乐享

受，很快就变成全方位多角度地追求音响系统的完美了。越来越多的时间、心思和金钱投入到复制声音的媒介上；在控制听音环境上所耗费的心血也越来越大。甚至还怀疑通进屋子的电流也可能造成失真：于是必须安装一个“线路调节器”给电流“除污”，输电公司认为已经不必再调整的电压被调整得更为精确。听音室要尽可能地与外部世界隔绝，以减少周边街道噪音的分贝量。有些情形下，房间的地基要加强，墙壁也要改变，要安装反射和减震的组合材料，以便达到完美的声学性能。发烧友的身体端坐在与两只扬声器等距离位置上，也就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微观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听觉乌托邦中，主体与客体、听者与房间融入了至美之音的同一性之中。

或许这是发烧友的美梦。而实际上，他们的欲望总是得不到满足，不断地考虑着改进，朋友与家人的闯入又会打扰听音佳境，
11 而音响系统的不完美之处总要被认识到。电子对音乐信息的介入颠覆了理性的自律主体。对他们而言，语言本是现实的直译，而它如今所例示的则是镜映成像（mirror reflections）的一场无穷游戏，一个深渊，主客体在其中彼此进行着不确定的交换。其中的符码、语言和交流的意义暧昧不清，而现实与虚构、外与内、真与伪则在这种暧昧意义的波光中摇摆不定。在这个世界上，主体没有停泊的锚，没有固定位置，没有透视点，没有明确的中心，没有清晰的边界。当福柯在《物的秩序》中写道“人”已死去时，[12] 他表达的便是信息方式中主体的迷茫。在电子媒介交流中，主体如今是在漂浮着，悬置于客观性的种种不同位置之间。不同的构

型使主体随着偶然情境（the occasion）的不确定而相应地被一再重新构建。

我在本书的研究中借用了后结构主义者的这一主题，即主体是在交往行动及交往结构中被构成的。我探讨了交往模式（patterns）的变化是如何引起主体的变化的。语言构型中的变化，或说是语言包装中的变化，改变着主体将意符转化为意义的方式，这是文化生产中极为敏感的一点。因而，当语言从口传包装和印刷包装转换到电子包装时，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也就被重新构型。如果我要成功论证电子媒介交流对主体的影响，那么显然还必须在社会领域建立理论，对社会批判理论最根本的立论假设，甚至对更普遍的社会科学的最根本的立论假设提出质疑。

我在本书中还希望引入后结构主义理论，使它能更针对电子交流中的诸多现象，为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建有所贡献。我希望能论证语言包装的新形式给社会领域带来的巨大变化，并且论证后结构主义理论能针对这些新现象提供独特而合适的阐述策略。反过来说，我也希望能说明电子媒介交流是如何变成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社会语境的；并希望能说明，用后结构主义者的眼光审视这些现象，也会为该理论带来一种反馈效应，从而迫使人们在一些重要方面对该理论的阐释习惯进行重新校正修改。

信息方式这一领域的构建首先遇到的障碍便是理论方面的。我参照了社会理论家的这种倾向性做法：将意义客观化，将词语限制在单一意义上，把语言看作是行动的透明工具。作为一名思 12
想史家，我对这一理论问题进行了追根溯源。社会理论产生于将

主客体截然分开的笛卡尔文化，产生于将心物概念推而广之的二元论形而上学。[13] 在这种理论语境中，社会科学家被构建成一个与其研究客体分离的认知主体（knowing subject），以单一意义的词语界定着一个与他 / 她自身截然分开的客观社会领域。社会理论的话语被结构成社会理论家心智的直接表征（representation）。与此相对的是，在已经构成的社会领域内，语言被假定为存在于与理论不同的层面上，但又保持其意义单一性。日常的语言世界（观点、态度、观念及意识形态）也与行动的世界截然分开，变成一个可能与行动语域（register）并不同步的独立语域。然而，社会科学家仍然认为话语的社会层面，如理论话语，是个体心智的表征。在这一理论语境中，语言只不过是一种透明的中介，是以书写或言语对意识进行的明确表征。在这种理论系统中，电子交流缩减了时空对意义的远距化作用，也只不过是增加了语言的表征力（representational power）而已。

可是今天，语言的表征特性尤其脆弱，且漏洞百出。在日常生活的诸多领域，词与物的关系因指涉对象（referent）的丧失而复杂化。这里以作为表征意符的货币（money）为例，对此稍作思考。[14] 它曾经指稀有贵重金属，政府把它们铸成硬币，因而具有合法偿付手段的作用。例如，黄金既起着交换中介物的作用，其自身又被认为具有价值。其指涉对象便是该词稳固不变的基础。黄金作为交换中介的这种表征功能与它作为稀有商品的独有特性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货币”这一意符代表着“黄金”这一事物，这几乎没有歧义。接着，货币开始指纸币。纸币代表着储存

在坚不可破的国库中珍贵的金属硬币，由于纸币可以大量印制，其本身并不珍贵。词与物之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关系更可取，而它们之间的那种对应关系（correspondence）便被舍弃。后来，代表纸币储存量的支票又被开始用作货币。由于它们比纸币更容易印刷，就其自身而言便更不珍贵。现在，信用卡取代了支票。信用卡代表的不是纸币的储存量，而是数据库中的电子信息，数据库则又是纸币储存量的代表。“货币”这一词语如今则是指银 13
行电脑部门所藏磁带上的氧化物的构型。氧化物与其所起的交换中介的作用之间的关联是任意的，这便揭示了这种关联的社会构成特性。“货币”的表征面由语言及语言的构型所维持，其指涉对象则离它甚远，难以分辨。“货币”这个例子说明，表征语言的弹性极大，即词语既能指涉与之遥遥相隔之物，但又能指出这种弹性的局限。语言变化的下一步便是仿像的形成。

当词丧失了与物的关联并逐渐取代物的位置时，简言之，当语言表征其自身时，表征的功能也就处境可悲了。无论媒体纷繁复杂的语言世界，还是电脑以及它可以进入的数据库，无论政府与公司的监视能力，还是科学的诸多话语，它们都各自构成独立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不同的交流模式已使语言的表征功能受到质疑，而每一交流模式都将语言自我指涉这个层面推到最前沿。本书下文将对以上四种新“语言”的每一种都单辟一章文字进行专论。在每种情形中，所论及的语言都被构建为一个具有独特包装模式的智力理解领域（intelligible field），它的力量与其说是出自对其他事物的表征，还不如说是来自其内在的语言学结构。虽

说在使用时，语言总会呈现这一特征，但在今天，意义越来越靠自我指涉的种种机制来维持，非语言的（non-linguistic）物，亦即指涉对象则黯然隐退，它在维持文化意义这一微妙过程中所扮的角色越来越无足轻重。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客观主义社会科学的诸多范畴迫使知识过早封闭，把信息方式的矛盾复杂性缩约为行动工具语言的“合理性（rationality）”。

有些社会评论家抱怨，在诸如媒体、科学、电脑以及政府与公司的监视中，信息语言的增加本身便瓦解着表征功能的根基。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认识到了非表征语言传布范围如此之广，自有其新奇之处，这位重要的理论家哀叹：“不幸的是，还没有哪一个社会像我们自己的社会一样被如此神秘化，且神秘化方式又是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充斥着音讯与信息，而它们正是神秘化的
14 载体……”[15] 杰姆逊所暗示的是，当语言的滥用导致荒诞不经的混乱时，语言便不是行动的工具了。对他而言，音讯倍增从根本上损害了大脑对意义与噪音进行有选择地辨别的能力。另一位批评家对最近的信息爆炸所作论述给人印象之深，使他能够以此作为划分历史时期的新基础。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写道：“在一个话语饱和的世界，语言本身已变为各方争夺的领地。我将论证这种饱和是一种文化种差（*differentia specifica*），区分了现代时期与早期形态”。[16] 要对信息方式这一概念进行全面研究，就必须对每个个体所面对的全部自指信息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这种探讨可能会为理性个体或中心化主体（centered subject）的不稳定性提供一个衡量尺度，而该个体或主体所假想的自律性所

联系的则是把意符与指涉、词与物结合起来的能力，简言之，这种自律性联系着语言表征功能的发挥。

我想说的是，表征危机不仅源自信息爆炸，杰姆逊与特迪曼已注意到这点，而且也源自信息流通其间的新型交流结构。一旦超越某个特定点，说话者与受话者之间的距离增加便允许对传输者与接受者、音讯与它的语境、接受者／主体与他／她的表征等关系进行重构。这些重构，亦即我所谓的语言包装，转而将一种新的关系强加到科学与权力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个人与社群之间、（原作者性）权威（*authority*）与法律之间、家庭成员之间、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总而言之，作为现代社会特征的种种坚固的制度性常规虽已存在两百年左右，而今却正被电子媒介交流这场地震所动摇，并被重新组构成新的常规，其轮廓迄今为止仍一点也不清晰。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语言是意向（intentional）行动的工具，按说也必须在信息方式理论范围内对它加以论述，但语言还有另一种极为不同的能力：它是一种描绘性的（figurative）结构化权力，它构建言说主体，同时也构建作为言说对象的主体。在语言的这一层面上，电子媒介交流具有非常强有力的功效。电子媒介交流使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的关系变远，并且摆脱了阅读者或书写者与印刷或手写文本的可感可触的物质性之间的关系，因而它搅乱了主体与主体所传送或接收的符号之间的关系，并以极其新的形式对这一关系重新构建。对置身电子媒介交流中的主体而言，客体则倾向于变为能指流（the flow of signifiers）本身，而不会变

15 成语言所表征的物质世界。在信息方式中，主体要想辨明能指流“背后”的“真实”存在已越来越难，甚至可以说毫无意义。结果是，社会生活已部分地变成一种操作，将主体的目的定位成接收并阐释信息。

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信息”虽指明了信息方式这一方向，但走得还不够远。他着重探讨接收者主体的“感觉中枢（sensorium）”，从而认定主体是一个感知的而非阐释的存在。他继续着洛克式的认识论传统，把人当作有感觉的动物。但是有一点例外，他强调这些动物所面对的感觉作用构型中的变化，尤其是电视带来的变化。然而，信息方式所质疑的不仅仅是主体性的感觉器官，而是其具体形式：它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它对该世界的看法，它在该世界中的位置。若说我们面临着由“热（hot）”交流媒介到“冷（cool）”交流媒介的变化，或说面临着麦克卢汉认为的感觉中枢的整改，还不如说我们面临着主体普遍性的去稳定化（destabilization）。信息方式中的主体已不再居于绝对时/空的某一点，不再享有物质世界中某个固定的制高点，再不能从这一制高点对诸多可能选择进行理性的推算。相反，这一主体因数据库而被多重化，被电脑化的信息传递及意义协商所消散，被电视广告去语境化（decontextualized），并被重新指定身份，在符号的电子化传输中被持续分解和物质化。按照德勒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视点来看，我们正在从扎根于时空的“树居型（arborial）”生物变为“根居型（rhizomic）”游牧民，每日随意（随何人之意尚存疑问）漫游地球，因为有了通信卫星，我们

连身体都无须移动一下，漫游范围便可超越地球。[17]

因此，身体已不再有效地限制主体的位置。或者这样说也许更好些，通信设备使整个地球上的神经系统延伸到这样的程度，使它能将我们的这一星球笼罩在，借用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术语便是，语言的意识域（noosphere）内。[18] 如果我坐在加利福尼亚便能与巴黎的一个朋友直接或通过电子邮件交谈；如果我不必走出家门便能目睹全球各地发生的政治文化事件；如果遥远的某地有一个数据库，它包含着我的个人资料，并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政府机构提供了这些资料，使它们做出了有损我的生活的决定；如果我通过电视或电脑就可以在家购物；那 16
么我在哪里？我又是谁呢？在这些情形下，我不可能认为自己还占据着我理性的、自律的主体性的中心，也不可能认为自己还是被一个界定明晰的自我（ego）所限定着，我只能认为自己是分裂的、颠倒的、消散于社会空间之中。

信息方式的研究与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的研究有某种程度的交叉。下文论及的电视广告和电脑购物也是研读大众文化的学生所熟悉的话题。80 年代，大众文化的研究终于超越了法兰克福学派有关文化工业对大众的操纵这一论题的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源于他们对高雅文化的推崇，把它看成是解放性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和“文化研究”大纲在大众人群中寻找抵制支配形式的出发点。[19] 与此相反，我研究信息方式更关注主体对文化经验的构建方式和形式，而不关注已经构成的主体群是如何抵制或趋同于大众文化的“外部”要求的。我的研究与文化研

究中的这一倾向更密切相关：探讨通俗文化是以何种方式将大众构型为“女性的”、被动低劣的、接受型的。[20] 我们还会看到，信息方式的某些部分还将主体构型为“他者”，成为与自律理性的文化理想不同的“他者”。我将在下文中着重讨论与这一理想之间的断裂，并探讨随这种断裂产生的解放性的以及压抑性的诸多可能。

本研究一个更宽泛的目的是要探讨要有怎样的理论条件，才能理解主体新的构型方式。因此必须明确说明该研究的一些重要界限。提出“信息方式”这一术语，并不是把它作为控制或铭写现时代的某个图型（figure）的总体化或本质化的范畴。首先我们必须明白，它是多重性的：信息有许多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有其历史特殊性，它们之间有连贯亦有断裂。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并不打算生成一套信息方式领域的正式理论。马克思论述生产方式以及韦伯论述合法权威的理论时，都勾勒出诸多概念，而我却没有这样做；但在所论述的每一点上，我都限定并控制所论及的经验研究领域，或提供解释性模式以说明一种信息方式向另一种方式的转变，或提出用来进行历史分期的分类法。我之所以在理论上采取这种谦卑态度，乃是因为我所采用的理论策略迫使我应该谨慎。这些理论策略是大家所熟知的后结构主义式的，在我看来对我的研究尤为恰当并很有启迪。因而本书只是初步的研究，
17 权作当今情境下信息方式方面的抛砖引玉之作，希望这部实验之作能促进更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及经验研究。

对社会批判理论的检讨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不应采取以行

动为中心的模式（actioncentered models）来考察当代社会。其原因有二。首先，在最近的抗议运动中采取主动的群体，如妇女和少数人群体（minorities），已被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元叙事铭写为“他者（other）”。这些宏大理论（grand theories）诉诸于被认为有能力从主导性中解放自身的理性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集体）的不满。妇女和少数人群体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或至少是处于中心化的政治戏剧的边缘。因此。70 年代妇女和少数人群体占据政治对抗的中心舞台时，移位（dislocation）——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特别着力谈到的移位，便被强加给解放理论的早期传统。为了将“他者”政治纳入研究，社会批判理论必须进行认识论上的彻底检讨，在此检讨过程中，理性主体的图型不应再起着基础或框架作用。由此我们才能得以重构正常 / 异常、多数 / 少数、男性 / 女性的对立。除了女性主义及特称（subaltern）理论以外，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以及波德里亚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也正朝这个方向转移。[21] 有些解放性元叙事（metanarratives）已不再起批判作用，而他们则矫正了向这些元叙事的伪回归做法。他们还告诫我们，不要把理论家，尤其是男性理论家，定位成理性主体，或定位成解放运动中的中心特权位置；为此他们还建立了理论机制。

在我看来，对以行动为中心的理论应采取怀疑态度的第二个原因是：我感到社会场景越来越由电子媒介交流所组成，而电子媒介交流例示并放大了语言的自指层面。新的语言结构并没有将语言视为理性自律主体控制客体世界的工具，并没有把主体执著

地控制客体世界的目的看成是对更高度自由的追求，它们反而回过头来指涉自己，颠倒了指涉性，因而作用于主体，使得构建主体的这些新方式出现了方向性错误。同样，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文本也对这个艰深新奇的领域有所开拓。虽说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显得与重建后的社会批判理论尤为一致，但它们也严重制约着这一
18 规划的开展。如果说，人们所说的理论是指一套概念，这套概念能通过某种策略打开一个研究领域，而这种策略则又绘制出该领地的种种话语之图，那么后结构主义者所质疑的便正是理论自身，这一点倒是奇怪得很。因而，我转向后结构主义便预示了信息方式理论的发展，即该理论在映照生产方式理论的同时又置换这一理论。

我在本书中所采用及制定的策略所依赖的是一种双重规则。[22] 此策略将电子媒介交流划成几个部分，并援引后结构主义观点对每个部分所例示的自指性语言机制进行集中考察。后结构主义观点阐明了电子媒介交流对主体的去中心效应，而相应地，电子媒介交流则迫使社会语境变成使理论去中心化的基础，从而颠覆了后结构主义观点的权威效应。于是，我将电视广告与波德里亚，数据库与福柯，电子书写与德里达，科学与利奥塔两两结合。预期的结果是能使大家的注意力转向当代社会空间结构上的某些新特点，完成这一承前启后的工作，也想进一步激发大家对更具启发性的诸多理论发生兴趣。当然，并非仅仅我所述及的才是可以探讨的论题：在语言包装这一论题中，我下文未加论述的，随便举几个例子便有，电话、摄影、电影等。在信息方式这一主题下，

它们是完全恰当甚至是很必要的论题。

本书当然也不是第一部用后结构主义策略作为写史大方向的著作。随便提出几个名字便有：妇女史研究的琼·司各特（Joan Scott），文化史中的林恩·亨特（Lynn Hunt）和让-克里斯托夫·阿格纽（Jean-Christophe Agnew），社会/历史理论中的欧内斯托·拉克洛（Ernesto Laclau），尚塔尔·莫菲（Chantal Mouffe），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阿伦·麦吉尔（Alan Megill）。他们都已先行一步，用后结构理论考察有关的历史、社会诸问题。我力图集中于新的交流现象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交叉点，把这种交叉作为我向更具普遍意义的话语创见所迈进的一步，以此探讨该交叉所衍生的结果。话语创见一直被冠以文化研究、后现代理论、特称话语、局部知识等形形色色的名目，而我则把这些倾向看作是向人类科学现存的学科进行挑战的一部分而提出的新式问题；这些倾向的出发点是自我反思的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为了探讨“后现代”立场而抛弃了“现代”立场。我这话的意思是指，自18、19世纪以来关于解放的政治元叙事一直是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 19
规定的构架及参照点，而如今似乎正在丧失其贯通力，正在丧失其给种种假定提供基础的能力。这就使我们似乎自然而然地要去问某些问题，并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会界定真理问题的界限及范围。我所指的问题有如下等等：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地点，工人阶级的条件（曾）是什么？政治机构（曾）如何保证天赋人权并推翻专制权？一个特定的国家（曾）如何保证其荣耀与权力？一个

经济体（曾）如何工业化并保证持续的发展？这些问题以及其他许多类似问题一直是人类科学中的一些最主要且很有活力的问题。现在是时候了，是质疑它们的话语霸权的时候了，是提出一些新问题的时候了，这些新问题一直从属于旧问题，或被旧问题忘记或压抑。这些新问题所激发的政治创见可能还不容易归入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式的自由形象的文化框架中，可能会走向“边缘”，走回 70 年代和 80 年代的新运动。然而在目前阶段，这一可能命题的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远不能在支配的诸多形式与自由的种种可能性之间规定什么坚实的关联。而这种自由一方面用信息方式理论加以昭示，另一方面则用女性主义的进展、少数群体话语及生态批判加以昭示。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也会偶尔努力将我的发现与有关性别、种族及阶级的讨论联系起来。

我将信息方式的理论及社会的起源置于相互竞争的话语场中，并设想它会威胁到既成观点的主导地位。但我并非主张老问题已经不再相关或应当抛开不谈，而只是认为它们必须与新问题相互对应起来处理。反其道而行之，就等于是给排他性思维（exclusive reason）维护一个借口，而不是维护话语的竞争。这种主张正是后结构理论从一开始就予以否定的，而我从后结构理论中受益颇多。然而，我也确实承认某种“新事物”的兴起，并肯定这种“新事物”与现代有着断裂，与目前的范式并不连贯。而且在我如是断言时，我也深知作为“新事物”的电子媒介交流或信息方式在很多方面根本不可谓新，而且几十年来甚至几个世纪来的社会发展和理论创见对此早有预示。电子媒介的信息系统可追溯到 19 世纪

的电报及照相术中。

但我的问题并不是为了例示过去缓慢连续地向现在进行演变的这个过程，借此造成一种熟悉效应，造成一种伪认识的意识形态迷雾。这种伪认识断言我们从来便已处于信息方式之中；它所 20
赞美的是我们所论述的现象，并将这些现象的实质夸大。与上述断言相反，我把这一论题看作是对某些现象进行的一种理论构型，以便使这些现象的破坏性潜能被人们所认识，并在适当时机或许还能让这种潜能发挥作用。我之所以选择不连贯性而不选择连贯性，选择新事物的新颖性而不选择其陈旧性，是出于政治的而非认识论的原因。我相信马克思在处理生产方式这一概念时也是这样做的，这样做可能会进一步开拓理论前景，以便界定支配的诸种结构，并对可能瓦解这些前景的过程有所裨益。当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进行理论化研究时，工业资本主义既是一个少数现象又是长期的历史流变的结果；而今信息方式所浮现出来的特点也许可说是与之相同。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贝尔与修辞问题

人的力量已经与信息技术的力量以及它们的第三代机器相互联系，共同创造出某种并不是人，而是“人机”难分的系统。时至今日还这样说，岂不陈腐？这种融合岂非以硅代碳？

——引自吉尔斯·德勒兹，《福柯》

近来，想生成当代社会世界领域的新理论的诸多努力遇到了很大阻力。对马克思主义而言，发达资本主义的概念，而对韦伯主义者而言，现代化的观念，仍然支配着各自的社会理论及经验研究的传统。过去几十年来社会秩序发生了变化，总的说来，对这些变化进行的解释仍然局限在旧有模式内。虽然考虑过选用其他醒目标题，诸如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原子、核或电子时代，但大体都被摈弃了。

然而，社会机制正发生变化，这些变化极其新异，局限于成规见解便不能对此予以充分解说。可以这样说，社会研究者面对着一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只不过知识异态情形，亦即抵制旧有框架的因素，还没有达到临界质量或者仍未构成足够大的量，还不能使观察者相信有必要抛弃传统立场，支持新立场。同样，也可以这样说，最近的社会变化在现存框架内还可以理解。

22 另一种可能便是，此理论并非以一个总体化框架代替另一框架，而只是一种能解说新现象的局部理论的展开而已。这便是我在下文中将要维护的立场。这种新的历史成分可能会引起社会秩序根本变化，要对此进行研究，必然需要一些条件，我想证明这一研究的可能性，并将这些条件理论化。再者，要分析该历史成分就必须具备一些理论条件，其中的一部分便是要反驳总体化理论。这是界限分明但又互为联系的两个理论议题。我所要论证的是，社会上的新事物只是一套基于语言学的支配结构，这些结构的特征之一便是它们对话语的总体化形式的依赖。因而，批判理论的一个难题就是要发展出一种话语形式，且这种话语形式不能重复它所要分析和驳倒的种种话语的总体化性质。于是，诸如“后工业社会”等概念的首要缺陷便是，它们只是以一种总体化立场代替另一种总体化立场。

在对后工业理论提出批判之前，我首先要表明我对总体化理论的批判。通用理论（general theories）与总体化理论（totalizing theories）必须加以区别。通用理论在一个具体的分析层面上或者

为经验中某个限定了的部分指定一个范围，覆盖社会绝大部分。人口统计学便是通用理论的一个例子。当通用理论声称它已将该领域内的社会现象或社会“本质”尽数囊括之时，概而言之，当它使该理论范围外的观点和经验被边缘化了的时候，这一通用理论就变成总体化的了。我所使用的这一术语是指，总体化理论将敌对观点排挤出局，并声称它已经将整个社会领域的意义研究透彻；或者没这么极端，它只是声称已经将作为其理论上的研究对象的那部分社会领域研究透彻。总体化理论的立场都建立在自然、辩证法、理性、统计运算等领域，从而具有将社会领域去历史化（dehistoricize）的倾向。在理论形成过程中，总会有某个时刻，总体化过程不可避免，也不该避免。因为当理论家面对各种可能的研究主题，从中选择其研究领域或主题时，其选择过程就暗含了某种总体化行为。仅从这个意义讲，总体化过程是使得任何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的一个条件。

总体化的诡计

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的话语效果是，它能够否认那些源于对工业社会所进行的分析的观点的有效性。后工业社会理论导致了一种比较彻底的断裂，这种断裂缩减了该断裂之前的那些社会层面的意义，使得那些社会层面无足轻重。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出现后，社会理论家便再也不可能声称工业社会时期所具有的社会特征还有分析意义。于是后工业主义的理论家便重新界定社会现

23

实，重新构建分析场，使得那些不具有新模式典型特征的经验领域变得无效。这一注销（cancellation）过程便是总体化术语的权效（power effect）。总体化带来了理论的零总和博弈游戏（zero-sum game），这种游戏在社会理论史中一玩再玩，各种理论相互争斗，像春季的两头公牛为了控制一群母牛而争斗不止。且不说后工业理论这一概念的论点的有效性如何，其总体化特性带来的那种修辞姿态，也引发了同等程度的总体化回应。

丹尼尔·贝尔的著作与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具有最为紧密的联系，他犯下的总体化错误最为严重。[①] 他把后工业社会界定成与以往所有社会的形成方式截然相反，以一个只是区分了新与旧的图式（schema）覆盖整个人文史。贝尔援引马克·波洛特（Marc Porat）对美国经济的统计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将近百分之五十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工资，来自信息商品及信息服务的生产、加工和分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经济已经变成了信息经济。”[②] 早期社会则与此相反，其收入主要来自“采掘”或“制造”。贝尔认为，除了基于收入来源的区别以外，后工业社会的独特还在于，如今已有超过半数的劳动力由信息工人组成，这是史无前例的。[③] 贝尔衡量后工业社会的第三条标准，是对收入和劳动的有关标准的衍生和进一步的发展：如今，知识与信息是社会的轴心原则（axial principles）。用他的话说，“后工业社会的轴心原则……［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centrality）……”[④] 虽说他已意识到，所有社会都在生产中利用知识，他所提出的命题是，只是到了最近，经济才具有“科学与

工程技术相融合……”的特点。在贝尔看来，收入、劳动及知识的指数证明一个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出现——这就是后工业社会。

贝尔作为理论家实在精明，他自然不会完全不顾总体化这个问题。他假装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只限于经济社会结构这一层面，这就免得他归纳“社会总构型”的特性。[5] 然而就在这段文字的下一页，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论述：后工业社会是“现实”中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赋予社会世界以优先权，而使自然和物质从属 24
于它。语域（register）则从社会分析转向本体论，而理论家的分析范畴也就变成了现实自身的指数。事实上，说到底，问题并非贝尔是否将他的分析限定在社会结构上：自始至终，贝尔的论著都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统统网罗在后工业社会的一元化定义之中。真正的问题是，总体化修辞是他可能命题的必要成分。他界定了社会新现象的界限，但是在他的话语行为得以实现的语域中，对新现象的界定变成了对整个社会的界定。

贝尔并没有尽量限制其分析的范围，因而他免不了要给人造成一种新的总体化的印象。他所采用的统计分析是大逻辑（macrological）层面上的，他对后工业社会特性的断言也只是一般事实的平板陈述。例如，他将其所描述的社会“下层建筑”的历史一分为三，从交通系统到能源系统至大众传播系统呈循序发展。第三发展阶段中，产生了大众媒介与电脑的融合，这个变化标志着我们迈入了后工业社会。[7] 于是，社会世界转型的标志是界限模糊的一般过程。所有这一切之中最令人遗憾的是，虽然贝尔想避开“技术决定论”，[8] 他还是将后工业社会的起因归结为技

术革新（电脑 + 大众媒介 = 后工业社会），因而也就自相矛盾了。即便人们对贝尔滑入技术决定论宽宥对待，但由于他把社会现实的整个领域描述为受到电脑化大众媒介同质均匀的影响，他对总体化这一问题也就难辞其咎。

贝尔的总体化话语另外还有一个难题，那就是他使用了社会科学语言来使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有效、合法。他论证说，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主要“变量”已经从资本及劳动的变量变成信息及知识的变量。[9] 在此，贝尔使用了“变量”这一术语，从而将他阐述公式中的含糊性掩盖起来，使他的陈述含有一种精确的科学味。他断言知识是后工业社会中独立的变量，它决定着其他隶属变量，如资本与劳动等。这些陈述作为一种猜想提出来，算是给将来的研究做一个指导似无不可，但贝尔却以修辞的魔法
25 把臆想转化为发现，将它当作一个结论呈现给读者。事实上，这种断言所假定的正是需要经验研究予以证实的。

贝尔宣称知识与信息如今已是“决定性变量”，这已经不仅仅是违背科学方法的秩序了。这种阐述公式实在是太过总体化，在经验社会科学中并不具有多少用途。术语全都不对，资本、劳动、知识和信息并不是分析中的可比单位。它们不像年龄、性别、种族、收入这些范畴可以在研究中“操作”。即便有人作出研究，证实了贝尔的命题，他们也会因为其研究所涉及的通用层面，使许多观察者难以信服。我们再回到总体化这个问题：要想得出知识与信息是主要变量这一结论，就必须找出社会的所有变量，并证实相互间的所有可能联系。简言之，贝尔声称“知识与信息是后

工业社会的决定性变量”只是一个理论论点，披着已证实事实的外衣而已。

贝尔也可能是在隐喻意义上使用“变量”这一术语，指重要的或最主要的现象。若是这样，他立论的难处，便刚好落在他的判断所依据的认识论权威性这个问题上。他的陈述是行事性的（performative 译按，又译“完成行为式的”）而非记述式的（constative）。[10] 知识与信息是社会最主要的变量，这种说法并不是贝尔宣明或证实的，而是他断言的。作者将这一断言套上科学的外衣，他便对读者有所行事（doing things），便控制读者对社会领域的感知，使他们对其中事物的重要性的秩序进行重组。他绝非仅仅是传输知识。而且这种秩序重组是在社会总体性层面上，而不是在特定现象层面上展开的。当贝尔论及总体性时，他的论证便诉诸于行事性陈述，这绝非偶然。由于总体性不可能是处于既定位置的个体所能知道的，因此它必须被“赋型（*figured*）”，[11] 其手段通常是采用行事性的话语策略，正像贝尔所用的那样。

语言的压抑

若说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的形成因为总体化修辞而有缺陷，那么当它将某些现象标识为新现象时，因为压抑了这些现象的语言层面，从而使它在理论上显得先天不足。无论是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所构建的社会领域层面上，后工业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有忽视语言问题这个倾向。尽管他们优先考虑诸如知识、信息和交流 26

等现象，但他们没有将这些现象当作语言问题来对待，而且他们也不注重自己的话语的语言素质。这种缺失很严重，有损于他们为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提出一种连贯的论点所作的努力。这个问题所针对的是一门不愿与语言理论有所瓜葛的社会科学的界限问题，因此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难题：如何在不同学科和它们本质上的非统一性（non-unity）之间划定界线。[12]

像马克思和韦伯一样，贝尔假定社会领域由种种行动组成。我们已经看到，他把后工业社会的特性看作服务经济（service economy），其中大部分人已不再从事原材料的采掘或商品的制造，而是从事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换或“游戏”。贝尔坚持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中心特征是知识和信息在经济中所扮的新角色。为新的社会转型作辩护的作者们，一般说来也确实都集中在信息上，把信息看作是探讨正在出现的经济新世界的重要主题。他们把信息的生产、分配及消费的新模式膜拜为新时代的首要属性。他们全都把信息当作一组经济事实对待，而贝尔尤其如此，因此他们便是在资本主义的（在有些情形中则是马克思主义的[13]）经济理论的旧范畴内消化这些社会新现象。

贝尔敏锐地注意到信息的异常性质：信息不像物质商品，它不因消费而耗竭。一个人从数据库中获取信息并不降低另一个人获得同样信息的能力。实际上，甚至每个人都可能在同时“拥有”同样的信息。物质资源的限量（scarcity）是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首要原则（the prime axiom），但它对信息并不适用[14]。资本主义大厦似乎受到了信息的不可耗竭性、信息对商品形式的抵制的威

胁。超出限量商品界限的经济是否可能，贝尔并没有提出这一理论问题，而是匆匆忙忙地就调和了新事物和旧事物。但贝尔争辩说，虽说信息并不适用于限量的空间形式，但信息却肇始了一种新的限量形式，即时间限量。信息变成商品，从信息再生产所需的时间来看，仍然可以用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原理加以解释。总的说来，贝尔和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们都已发现，信息可以像汽车一样卖出去，因而也就没有超越市场体系。在他们看来，决定信 27
息价格的法则，仍是支配物质商品分配的供需法则。

因而，贝尔使得新的信息王国具有了商品延伸形式所具有的合法性，从而逆转了这个由来已久的自由主义原则，即在一个民主政体中，总的来说，知识与信息必须是可以自由获取的。18 世纪的自由思想者丹尼·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中，包罗了主要手工艺生产工序的详细信息资料；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是希望能摧毁知识保密这种原则，这一原则是旧行会体系的核心。他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财富有赖于科技信息畅通无阻的流通。而像贝尔这样的 20 世纪重要的自由思想家，竟然会想逆转这个原则，这多少有点不像话。大众传播与电脑的融合，使得信息的全球化快捷分配成为可能，因而从理论上讲，极大地扩展了知识的民主化，也许因此会使社会民主化进一步深化。而正当此时，贝尔看到的却是将信息限制权授予付得起账单的人的最佳时机。于是，对那些没有获得授权便进行知识再生产以及不付费便获得知识的人来说，是资本主义为他们拓展了犯罪领域。如果贝尔固执己见，那么，个体与群体间的信息交换就会呈现为商品形式，而按马克

思和卢卡契的看法，这种交换进而会使社会关系的另一侧面异化并物化。

电子信息有一个特征起着反商品化的作用。新技术使信息的再生产能力大大向前迈进。氧化膜塑料磁带的录制技术与电子编码技术的组合，使许多种形式的信息能得以快速准确地复制，如词语、数字、音乐或视觉图像等。信息处理及再生产的技术与信息的空间传递技术（远程传播系统）相结合，便为交流新模式展现出种种远景，这些远景很可能要引起社会秩序的重大变化。信息能够很便捷地被复制或传输，这已经严重破坏了声称要保护物质商品私有权的法律体系。版权法所假设的是，复制行为是一个困难而昂贵的过程，电子新技术则使这些考虑毫无意义。有关隐私权的法律所假设的是，人们侵犯他人空间便威胁到个人隐私，这也反映不了信息采集技术的现状了。同理，这种现状从一个领
28 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播撒信息的能力总是比保护和限制个人财产的机制更胜一筹。[15]

电子技术打开了新型交流播撒信息的种种可能，而后工业社会理论把信息当作经济事实而非语言事实处理，也就将这一问题隐匿不见了。[16] 虽说资本主义肯定无疑会在市场法则这张网中尽量多地侵吞信息，但当新的信息结构被当作语言现象处理时，这些新结构便会在社会中引起交流形式的变化，并使该社会中主体的位置失去稳定性。为了回避交流新模式这个论题，贝尔所采用的一个策略是，仅以定量方式处理这些模式，从而以归纳法延伸了他的经济学隐喻，而同时又否认其经济学分析具有任何意义的

隐喻色彩。他认识到，借助大众传媒的传播能力，“人们所知道的人（或地）的数目，以极高的指数率递增”。[17] 于是，后工业社会的传播系统从量上增加了人们之间的交际行为。

为了佐证他对信息的量化分析的论点，贝尔引用了诸如香农（Shannon）和维纳（Wiener）等控制论理论家的观点，他们把交流当作信息与噪音之间物理的和统计上的关系对待。信息是指交流在其传输过程中没有“失去”的那部分。而失去的那部分，即噪音，则被类比成能量转化过程中散发出的热量。控制论理论家多少有些抵制那种把信息完全还原为一个物理主义模式的诱惑。有些理论家简单地把信息定义为物质与能量的组织形态，[18] 这一定义严格说来是避免了还原论（reductionism），但却使信息状态与物理学关系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无论怎么说，这种物理主义模式仍然是一个量化模式，信息在其中与物质及能量保持一种含糊不定，多少有点神秘的关系。

除了使语言学现象量化之外，控制论理论家明确地要对通信进行中心化控制。例如：诺伯特·维纳对控制论的定义便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信息传输的电子工程理论”和“把信息研究看作是控制机器及社会的手段”。[19] 大体上，控制论是一种精英理论。它是一种工具，为技术官僚而设计，使他们能更好地管理被认为是无序的社会。控制论产生于与希特勒德国进行抗争的时期，它沾 29
染上了军事导向及敏感性。维纳所定的策略如下：“控制论的目的［是］要开发一种语言和一些技法，使我们确实能够从总体上对控制与交流这个问题发动攻击。”[20] 控制论是为全副武装的兵营做背

水一战而提供的理论。但是，维纳的著作写于50年代初期，当时的美国正被麦卡锡分子的狂热所紧紧控制，因此他的文本中弥漫着的一种政治-军事气氛。这种气氛从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抗衡，转向与自然进行竞争。维纳又写道："自然具有一种贬低损毁有组织有意义事物的倾向，我们一直在与自然的这一倾向作斗争……"[21] 熵"法则"使得技术官僚对语言的支配以及政府官僚把意义还原成"电子工程"的正当理由（just cause）合法化了。

贝尔基于控制论理论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后工业社会中，信息可说是增加了，因而传播也就是更好了。这种多即好（more-is-better）的传播理论有效地抑制了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把后工业社会理论限制在一个经济学隐喻上，而这一隐喻只是在对马克思主义最简单的描述上才有价值，因为社会理论新阶段的起点正是贝尔半途而废的地方。他争论说，知识/信息的某种描述是当代社会的中心"轴"；如果他的这一论点正确，我认为他确实正确，那么，这论题便不是信息经济学的论题，而是社会关系的质变这方面的论题了，而这种质变则是社会关系渗透到新的传播形式的历史场中才会发生。贝尔以这两种方法有效地把交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拆散了：（1）把交往缩约成一个经济学隐喻；（2）使文化这一论题游离于社会，把它转移到一个独立的"轴心原则"下。[22]

社会新现象中语言转型的性质这一问题躲过了后工业社会报信员的耳目。由于后工业社会理论家所配戴的眼镜片是为辨认社会经济目标而设计的，所以他们对最近的这些转型仍然视而不见。贝尔和其他人注意到，经济领域里有种种新的发展，这些发展当

然已经发生了。但是，他们声称这些变化已引起了社会秩序根本上的重构，即后工业社会的兴起，这恐怕就不会无懈可击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其他人宣称，这些变化只是程度上的，而非性质上的。这种观点可能会坚持，服务及信息工人像工厂的工人一样，仍是拿工资的雇员，受劳资关系约束。而经济中的服务及信息部门，很大一部分确实还是以工厂作为样板。快餐馆用流水线生产汉堡包；许多工程师还得分工，其分工程度堪比电影《摩登时代》中所描绘的流水线工人的分工。虽说信息部门的有些工作确实能 30
鼓励工作民主和创造性，但是这些工作在总数中只占很小的比例。[23] 绝大多数信息工人执行着单调沉闷的重复性任务，工资低，社会地位低，在管制严密的条件下工作。对他们来说，后工业社会的前景所预示的只会是更加沉闷的千篇一律。

当然，最近几十年的经济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家们正确地指出了这些趋势：科学对经济大规模渗透，劳动力成分变化，生产国际化，以及复杂而相互依存的先进技术越发脆弱。[24] 从我所使用的社会批判理论这术语的角度看，对于理解社会关系的性质而言，这些变化还没有交往经验的结构中的变化来得重要。

对马克思和韦伯的期望的限度

我可以举例说明，马克思和韦伯在其理论框架内预见到并解释了被我称为信息方式的那些社会现象。起码可以坚持这种立场：

人们没有必要全盘抛弃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才能批判性地理解信息方式；人们只需对他们的立场进行增补便可覆盖历史的诸多新发展。虽说这种立场有一定价值，但我以为，马克思和韦伯基于行动的（action-based）理论，对于把握作为信息方式核心的语言学机制来说，其能力有限。马克思和韦伯的话语对将要发生的事物的方向具有一种很强的预见力，这表明他们的理论所具有的洞察力非同一般。然而，即便这些具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也不能完全超越其历史环境。他们的精神世界受某些文化假定所局限，这些文化假定使得交流结构的概念难以充分成形。起码这将是我在下文中所要论证的。

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著述《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Grundrisse）时，他非常清楚地看出，自动化过程，亦即机器代替人工劳动以及因此出现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中的变化，
31 正逐渐削弱政治经济学最根本的劳动力价值论这个原则。由于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位批判者（*critic*），他只是在需要用以论证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时，他的观点才会依赖劳动力价值论。对马克思而言，劳动契约并非一种平等的交换，而是一种剥削过程，在此过程中工人的付出并未得到完全回报。马克思能够完全面对这一前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发展可能会把劳动完全变成生产过程的附庸。他明明白白地写道："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㉖] 马克思预言，机器代替人的这一过程将进一步发展，直到生产毋需工人的参与也可以

进行的程度。马克思继续分析道："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机器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于是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27]

不用说，在这些情形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被翻了个里朝外。机器"干活"，人类监工。在这样史无前例的条件下，工人造反的前景及社会变革的希望显然也会有很大变化，在马克思看来这些后果肯定很有意义，他不会注意不到。可是他对此却只字未提。相反，他只不过说，这些条件意味着"社会个人"的出现，换言之，社会主义本身的出现。马克思对此论点的原文值得详加引述：

>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32
> 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就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28]

在这段非同一般的文字中，马克思预见到了自动化的最终后果：剥削与异化的消失。社会主义的产生，"社会个人"的出现，

是资本主义内在发展的结果。起码在上面所引的这段文字中，马克思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

然而，对我们而言，这段文字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对自动化过程中科学所起的作用的认识。他再次显示了令人赞叹的敏锐：自动化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29] 在另一处，他这样阐述道：“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30] 科学代替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坚称，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31] 当未来展现在历史唯物主义者面前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便与科幻小说这种体裁很类似了。资本家变成了某种外星人，其超常力量可以随意对知识与物质的种种力量呼风唤雨。

马克思论述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的新地位，但这就好像他对劳动过程中工人角色的变化所做的分析一样，令人奇怪地不够充分。马克思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对生产方式中的种种变化的社会意蕴特别敏感。然而，他在此似乎只想着将注意力投向资本的内在矛盾上。他正确地指出了生产过程中刚刚显露的巨大转型，但对这些变化给他的生产方式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却连简略的述及都没有。例如，如果科学是生产力，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是否还站得住脚？是否有必要将科学家归入劳动力范畴？果若如此，工人是“失去的只有枷锁”的贫困阶级，这一描述该当何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断裂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分工的一

个主要成分，这一断裂该当何论？由于马克思已经认定，自动化是一种迫近的必然，而非遥远的可能，因此，上面这些问题便具有一定程度的紧迫性，这就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缄默不相一致。确实，马克思所概括出来的变化，使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政治经济 33
学理论的整个思想机器（intellectual apparatus）都令人生疑。

科学，正如马克思所述，是知识的一种形式，是一种话语。因此，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看，如果检讨科学所使用的那些概念是为了揭示劳动主导性的诸种结构而设，那么这样的检讨便是行不通的。借用经济学的范畴来说，科学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与劳动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受不同的逻辑所支配。从劳动行为的解放（emancipation）这个观念走向科学话语的释放（liberation），这一理论步骤并不明显，且要求大幅度的概念重组。自然材料转变成商品的媒介不仅仅是操作机器的手工劳动，而且还是一些科学话语，而这些话语与研究机构、政府拨款资助的机构、新闻机器以及学术会议的社会仪式紧密相连，在这样的情况下，劳资间的主 / 奴关系就会变得难以辨认。

科学话语对生产过程的深层介入，对马克思的文化世界中的许多基础性假定提出质疑。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便能够合情合理地维护改造了的唯物主义，把唯心主义作为实践的积极方面而与它结合。他把在时空中运动着的人的身体看作是自觉理解力的一部分，想保证它得到应有的承认。但是，他最关注的理论应能够解释身体在时空中的运动的新方式，简言之，即劳动活动的组织。他的理论的形成受制于 19 世纪文化中的诸多

假设，而19世纪文化仍然深深受惠于启蒙运动，具有人／自然、主体／客体、精神／肉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理性／非理性等诸多对立观念。在这些对立观念的语境中，科学的位置被固定在人、主体、精神、唯物主义、理性这边。科学是人类智力的一种行为（an act），驱散宗教的迷雾，界定自然界的进程。它立刻成为对人类利益的贡献，是“缓解人类现状”的工具，是自由斗争中的进步力量。例如，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这表明他信奉科学。

按照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意思，[32]科学与工业相互纠结，使得人们必须要有一种摆脱启蒙运动的诸多假定的分析策略。对科学进行分析，必须把它当作话语与实践的一个集合，它既要消除社会主导力量的羁绊，又要拓展社会主导力量的种种权力。当科学变成一种合法的话语形式，并与既定机构（如公司、国家、学
34 校、甚至军队）融为一体后，它便非常危险了。与科学相联系的认知活动不可能被社会批判理论当成纯粹的精神现象而予以区别对待，它们必须被当作政治力量加以检讨，这一视角转换是马克思所没有做到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试图这样重新定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了《启蒙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写了《单向度的人》，哈贝马斯写了《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一文，在这些著述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调整着科学的概念，解释它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所起的新作用。他们的思考都基于科学／意识形态这组对立，强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科学对主导力量的合法化过

程所起的作用。对他们而言，科学具有一种本原（*original*）意义，与理性及解放相联系，与一种正在消散的意识形态相联系，这种意识形态以宗教、神话及迷信的形式出现。[33]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中论证道，尽管科学具有了这种进步作用，但它与支配、与对自然的支配也脱不了关系。科学认识论中有一个客观化层面，这是把自然作为他者进行支配的基础。科学的这一“缺陷”将会证明它的这种破坏便是一种进步力量。当社会／文化领域，如现代广告或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称的“文化工业”，采用了科学的认识论时，人类就变成了支配的主体，而科学则变成了意识形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只是在认识论这一层面上对科学这个问题进行阐述。在阿多诺的一些文章中，这种阐述甚至俯就了日常生活的领域，如《陨落的星辰》（The Stars Down to Earth）[34]和《论音乐中的拜物特性及听觉的退化》（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in Listening）[35]，它们有力地论证了通俗文化的保守作用。然而，这种分析的局限在于，它把话语理解为上层建筑的内容，而不是形式。阿多诺把《洛杉矶时报》的占星术栏目及广播电台的流行音乐都理解为语义学的条件制约作用（conditioning effects）。被忽视了的是这些话语的结构作用，而这些话语却是“条件制约作用”的条件赖以确立的机制。《如何看待电视》（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这篇论文写得引人入胜，阿多诺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观众，从心理分析角度分析系列节目的程式化内容，但对电视的交流结构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带而过。[36]简言之，阿多诺既没有把报

纸、电台及电视看作语言现象，对它们的交流结构进行理论归纳，
35 也没有检讨报纸、电台及电视对信息接受者的构建方式，而这种构建方式之所以可能乃因信息接受者摆脱不了媒体的影响。

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把科学作为意识形态所进行的批判，也因一个与此类似的问题而减弱。在《单向度的人》中，马尔库塞把这种批判限定在认识论层面上。举一个经验社会学中的例子来说，在马尔库塞看来，梅奥（Mayo）对霍桑的研究，因其实证主义的假定，便是意识形态性的（可以一提的是，这种批判可说是与阿多诺的《权威人格》（*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处于同一平面）。马尔库塞争论说，因为实证主义使社会领域操作化，所以就使阶级对抗政治化，并在总体上使其客体失去历史性。虽说马尔库塞的论点很有力，而且在我看来还从没受到经验社会学家的反驳，[37]但他的论点还是没有捕捉到社会科学话语的结构效果。在20世纪的下半世纪，社会科学已广泛运用到主要的公共机构中（公司、福利机构、基础教育、刑罚机构等等），这样社会科学便借助其话语的权效，塑造了社会世界。问题并不是指，当社会科学暗中破坏工厂中的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时，才是意识形态性的，而是指社会科学制定（*institutes*）许多其内部便具有支配性的实践。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一样，马尔库塞对科学进行批判的假定是，存在着一个主体与客体组成的二元世界，其中的科学使主体对象化，从而变成了意识形态性的。

哈贝马斯在1968年一篇题为《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论文中，发展了他对科学问题的观点。[39]哈贝马斯正面反

驳了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指出马尔库塞并没有充分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是如何在政治上变得保守的。[40] 为了纠正这一缺憾，哈贝马斯转向马克斯·韦伯将科学作为工具行动（Zweckrationalitat）的理论。在继续讨论哈贝马斯对韦伯的分析之前，我首先来探讨韦伯的观点自身。韦伯的观点一直是社会理论家普遍感兴趣的课题，并且对后工业社会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请容我重述眼下的问题，以提醒读者：在何种程度上，韦伯预见到了我以“信息方式”这一术语所标识的现象？因而便要问，古典社会理论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解释信息方式？）。

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比马克思的理论对理解交流经验及语言经验更易于借鉴。这是由于韦伯与马克思不同，他基于行动理论 36
论述社会向现代性的转型，他的行动理论并不强调劳动，而是强调在将他人考虑在内的情况下，按其对个体的意义而区分的诸多行动类型。[41] 从这层意义看，韦伯的理论是一种主体的社会互动理论。接着，他区分了四种这样的行动类型：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感的（affectual）和传统的。韦伯著作的意义和热情在于，他分析了现代性是如何与理性及支配成逆向联系的。在此，现代性被定义为工具行动的蔓延。韦伯非常敏锐地认识到，现代社会以科层组织（bureaucracy）形式将工具理性制度化。科层组织一旦确立，就会把工具理性转变成支配性，这种逆转是不可能在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范式内阐述清楚的。

现代社会（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自相矛盾及令人同情之处是，它假设有一种个人自由，这种自由被定义为理性选

择能力，这样就摈弃了具有早期社会制度特点的所有支配形式。[42] 同时，现代社会建立了一种组织形式（科层组织），这又构成了一种新类型的支配性。于是韦伯思考了难以设想的事物，即构想出了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核心同时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它之所以是理性的，是因为科层组织假设个体行动的工具性，个体不可能背道而驰。个人充任了相应的形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其理性决定的利益；如果没有人充任，科层组织就会瘫痪。然而，科层组织变成了一种支配形式，用韦伯的话说便是一个“铁笼”，这种支配形式带来的障碍，在他看来，是所有制度化了的障碍中最难以改变的。科层组织如此僵化的原因是它并不对理性的批判开放，这正是韦伯思想的关键所在。由于科层组织已被定义为制度的一种理性形式，因此，假定工具理性行动具有合法性的诸种理论便不能对它再加以鞭笞。这个逻辑的最后一环便是：由于理论与宗教和神话相反，理性本身就假定合理性（rationality）是行动的基础，又由于批判与革命只能基于理论才能进行，因此科层组织不会受到理论批判及社会变化的已知形式的任何伤害。[43]

韦伯观点的一个难题是关于科学在科层制社会中所处位置这个问题。当然，科学已变成科层化的了，这个问题我们可暂且搁置一边。与本书研究联系得更紧的是如下问题：科学作为理性的
37 一种形式，却并没有被韦伯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毕竟，韦伯的伟大成就之一便是证明了理性在现代社会中已变成支配性。但是，韦伯竟对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命运缄默不言，这实在难以理解。

难道它也变成了支配性的一种形式？在韦伯的论述中，科学受到了独一无二的特殊优待，它享有超越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中立空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争论说，虽然种种价值观及政治使社会科学家的工作充满生机，指引他或她去选择一个特别的问题进行研究，科学范畴（理想类型）的有效性（*validity*）来自它们作为研究向导而被普遍接受这一事实，而不是源于它们的政治的或规范的（normative）特性。[44]在《以科学为业》一文中，韦伯又一次对科学与政治进行截然区分。[45]然而，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不仅就自然科学在工业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如此，而且就社会科学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而言，尤其如此。

韦伯的立场很明确：科层组织依赖于科学。他写道：“科层制管理从根本上说意味着通过知识进行支配。这是它的特征，这一特征使科层制管理特别合理。”[46]对现代社会进行科层制控制与管理，要求拥有关于人口的最新资料，科层组织自己会收集这种资料，但社会科学家也会提供。韦伯的工作，以及他社会学领域中其他同仁们的工作，都直接地加强科层组织的支配性。韦伯并没有试图区分科层制知识的认识论与社会学知识的认识论。由于科层话语的“真理”和社会学话语的“真理”是相同的，因此韦伯的著作便刚好加强了他哀叹的现代性中的支配过程本身。

人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韦伯的理论中缺少了某种东西，某种使得人们能够对社会学（或批判理论）的合理性与科层组织的合理性进行区分的东西。我的看法是，韦伯所缺少的是一种基

于语言学的交往行动理论，如我在此想建立的信息方式理论。[47] 正如马克思的观点一样，韦伯的观点植根于一种行动理论，植根于行动与意识的二元论之中，这种理论是很难把握语言学机制的，所以他的论述不可能阐述清楚现代社会中的新近发展。能够对语言现象进行批判性阐述的理论，应该能绕开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这种两难。我希望在下文中能例证这一点。

韦伯的著述中，除了认识论上的问题外，当信息方式涉及语言的社会形式时，他的社会学对此的阐述也就勉为其难了。作为
38 一种社会行动理论，韦伯的社会科学并不是为了破译信息交换日益显出电子媒介化形式这种特点的社会而建立的。事实上，韦伯理论所阐明的科层组织这一中心现象，最好应看作是数据存储系统的一种雏形，简言之，是一部电脑。韦伯对科层组织的理解是，它们不是政治性的，它们只不过在联系着自己有关个案的知识时，将规则运用到各个个案，从而落实了政策。科层组织的核心是知识或信息。韦伯写道，它们只能在它们可以获得的“档案材料库”基础上才能行动。[48] 一个科层组织的档案卷宗大体上与计算机的数据库相同，正是数据库才支配了官僚阶层的行动。如何对待每一个体是由数据库而非官僚决定的。在这一层意义上，韦伯的理论阐明了电脑数据库功能的民主的一面。

科层制统治这一政治问题不仅源自科层组织的社会行动中所固有的权力，而且也源自由于电脑化的数据库才完善起来的监视和监督功能。因此，韦伯的科层组织理论需要围绕电脑化数据库的诸多语言形式这个问题而重新改造。简言之，电脑数据库这种

代码产生出一种毫无歧义的语言形式，而科层组织权力的很大一部分便源自这种语言形式。该语言形式一旦建立．就能按电子化方式变形，以便能在空间中快速传送并可以随时检索。失去了电脑化数据库这些固有特点，科层组织对数目巨大的现代大众的监视和监督就会无能为力。没有电脑，就不可能运作社会安全系统、福利制度、邮政等等。换一种说法即是，要想管理一批劳动力，就需要整个那批劳动力的劳动。在这方面，必须牢记这一点：现代监督和控制的建立并非仅仅是技术革新（即电脑）的结果。它要求对语言进行编码（ASCII），以便把符号转换成电子形式。下文第三章将全面分析数据库话语权力的作用。

因此，韦伯虽然将社会理论向信息方式的方向转移，但却没能进一步发挥他的观点，这是因为（1）他仍然紧抱着行动／意识理论，（2）他太强调科学话语，（3）他的理论仍然拘囿于理性／支配这一启蒙命题。于尔根·哈贝马斯起先提出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的概念，后来又提出交往互动（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的概念，试图以此超越韦伯观点的局限。 39

哈贝马斯同意韦伯的这种观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并非理解现代社会的充分基础。现代性亲历了“目的-理性［工具性］行动这些亚系统的膨胀，因此便对权力合法化的传统形式提出质疑”。[49] 哈贝马斯理解了韦伯的理论，所以他才论述道，资本主义把工具行动延伸的基础设置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军队、学制、健康服务，甚至家庭（另外还有市场和科层制组织国家）”。[50] 对于个体而言，这些制度避开了统治的传统形式，因此它们便被合

法化，并显得合理。对现代性所进行的马克思主义式批判只限于提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替代形式，以此作为非传统的合法性的一个更为合理的形式。但是，哈贝马斯声称，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国家干预论的兴起以及科学对工业的渗入，限制了社会主义立场的说服力。

第一个论题是政治上的。体制维持（system maintenance）问题从劳资关系转换成国家对于合法进入经济系统的要求。从国家角度看，经济行动揭示了资本主义关系的政治层面。经济行为不再显示为自然法则与个人的工具性行动的聚合（convergence），它们不再是服务于自身利益的“中立”机制，而是受制于“外来”因素的“操纵”。当国家进入市场干预时，如福利、军火采购、法律限制、仲裁劳动纠纷等，经济系统便连自我调节的外表也丧失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秘密便一览无遗；原来一直是合法的，如今则暴露出它的意识形态性。[51] 社会体制的矛盾已经从马克思式的问题转变为韦伯式的了。

第二个论题是科学对工业的渗入，这与我们的关系更为直接。对哈贝马斯而言，若说国家干预论力图将经济政治化，科学的发展便起着去政治化（*depoliticize*）的作用。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没能阐述清楚科学对社会的影响。哈贝马斯论证说，马尔库塞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所进行的批判，也没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人们所说的大科学（big science）把“中立性”重新引入政治行动，从而使得国家干预合法化了。当某国政府为了解决某个问题，按“科学”依据，采取“技术性”行动，其行为便自然而然地合法化了。政府聘用科学“专家”，从而获得了普通市民无法得到的知识。

于是，人民必须赞成国家的行为。起码这是晚期资本主义政治的 40
倾向。同样的法则亦适用于大公司，这些公司聘用科学家做研究，以便生成新产品，这些新产品既模拟“科学”又把“科学”变成经济。

但是，科学的这些新角色对工具理性行动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科学已不再是纯粹地把认知心理功能运用到对自然的了解和控制上，以便“缓解人类现状”（弗兰西斯·培根语）。由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期，科学对于经济功能的发挥及国家实力至关重要，人们就不可以再像韦伯那样争辩说它是“中立的”了。再者，科学丧失了中立性，这也对工具性的合理行动的性质和局限提出疑问。如果科学的真理功能与政治学／经济学再也不能分离，工具理性本身也就再不可能是现代社会中合法行为的基础了。这便是哈贝马斯对当代社会中的科学进行的分析的关键。

为了克服马克思、韦伯及马尔库塞的现代性理论的局限，哈贝马斯提出了一个新的批判范畴：符号互动，在其后期著作中，则是交往行动。20 世纪晚期，人类处于一个重大的十字路口。直至今日，解放工程（或人类进步）仍是基于（工具）理性向社会的延伸。当人类获得了关于其自身处境的知识并将这种知识应用于生活时，人类便向前进步了。如今的论题是，这种适应性行动的形式本身已变成非适应性的、倒退的，或说已变成支配的一种形式了。哈贝马斯争论说，将来的进步依赖于“摒除对交往的种种限制”，他把这种合法行动的新形式称为“理想化的言语情境（the ideal speech situation）”。[53] 于是，他把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点

从工具性的理性行动转到了符号的理性互动。如今，成为理论主体的是个体之间交换符号的条件，而不是他们的行动。哈贝马斯已经从行动理论走向语言理论。因而，他也部分地预示了信息方式这一概念。

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语言学转向并没能为电子媒介交流的分析提供一个框架。其原因有二。第一，他首先集中考察了一个不同的论题，其着眼点是解放，而不是对支配性的分析。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要想进一步发展当代社会的批判理论，到底需要什么，对此应有怎样的判断。

哈贝马斯集中考察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说明他很关注解放运
41 动的传统基点已经垮塌这一事实（例如，西方工人阶级融入社会，“事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已发展成新式的极权主义，工具理性向支配性的逆转，女性主义以及其他“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取代了传统的工人阶级政治）。这第二个原因不像第一条原因，它更为严重，它已不是理论策略的选择问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概念力图维持一种启蒙的理性观念。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条件是，个体遵从对称的或平等的关系中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个“普遍的有效性要求”，从而寻求共识。[54] 而今，这些条件的总和便是哈贝马斯对理性的定义。这种阐述方式存在的问题，倒并不是这些条件不可能达到，而是这些条件构建了一个一直由理论家所界定的历史-本体论的研究领域。在此情形下，理论家与使用理论的大众之间的关系便仍然是工具性的：理论家是主体，大众是客体；理论家推论，大众行动。

哈贝马斯的论辩中仍保存着脑力与体力、理论与实践、精神与物质这种笛卡尔式和资本主义式的区分，这种历史残留与他自己的交往行动观念相矛盾。理性又一次变成了一种支配形式，而这一次批判理论家的理性支配着解放运动。

哈贝马斯在援用理性的传统范畴的同时，还采用了一种总体化的策略。因为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概念的真实性是不可能仅靠逻辑证实的。由于阅读奥斯汀的著述，哈贝马斯注意到，言语行为不只是记述式的（constative）真理要求。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概念有一部分是施为性的（illocutionary 译按，或译“以言行事的”），是一种对读者有所作用的行为。所以，如果哈贝马斯只是向他的读者描述一下他的概念，便指望读者接受其论点的言外之意，并依此行动，那是不够的。交流行为包含着修辞力（rhetorical force）因素，而哈贝马斯已将修辞力排除出他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而这本身便是他自己的权威显现，因此他使自己的论点合法化的根据就必然不能来自其论点诸要素的内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哈贝马斯采取了一种总体化的历史姿态。他断言，在发达工业社会，个人遵从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能力（简言之，他们的交往能力）就是人类的历史发展顶峰。[55] 42

哈贝马斯对于人类进化的总体性所作的断言，导致他只好基于普遍理由为其理论进行辩护。[56] 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一论题对每个人都是有效的，因为从规范性角度看，交往能力是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像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哈贝马斯把他的论点语境化，并不是为了对其观点的可能局限进行界定，而是为了将其观

点普遍化或绝对化。这一策略的施为结果便是，理论家在读者的抗议下无懈可击。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精神），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以及哈贝马斯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实为相似的言语行为，其相似性在于，为了使其理论合法化为普遍性理论，他们都对历史进行了总体化。在这层意义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有违他们所力求促进的解放规划。总而言之，哈贝马斯已经撩起了社会批判理论中一种压抑行为的面纱，这种压抑行为即是把语言纳入上层建筑。但是，他又把一种总体化因素再度引入他的理论，因而使得信息方式批判难以产生一个充足的基础。

归根结底，后工业主义理论家、马克思主义者及韦伯主义者的观点都具有严重的缺憾，这些缺憾使他们难以提出一套信息方式的理论。特别是总体化的倾向、无力发展一套基于语言学的信息理论以及强调科学的认识论地位这种癖好，促使他们走进了死胡同。在以后的章节中，我将尽力说明，某些“后结构的”理论是如何帮助社会批判理论的重建的。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经济学的语言

电视把我造就成这个样子。

——吱喳头,《电视人》

(译按,吱喳头(Talking Heads),一支摇滚乐队)

媒体与信息方式

如果考虑到遍及不同阶层、不同收入群体的人们有多少时间是花在媒体上的,那么历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给予媒体的关注就不能算多。对媒体的探讨仍是如此粗浅,以至于对媒体的性质还几乎不存在一致看法,而对如何阐释媒介,一致意见则更少。德国社会哲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受了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影响,将媒体定义为在独立的市

场般的公共机构内部起调节作用的机制：

> 媒体……是通过简化了的复杂事物的传播……解决偶发性这一问题。媒体采用自己的选择模式作为接收这种简化的动机，以便人们与其他人融入一个具有相同的理解力、互补的期待以及可确定的话题的有限世界。媒体不仅是词语、符号或代码；它们还是组合遴选的意义群集（constellations），这种遴选可能从法律、方法论或其他方面被词语指明、象征和编码。突出的例子有金钱和权力，而我们还想加上真理、爱情，或许还有艺术。[①]

虽说卢曼的定义可能适用于报纸、电视和电台，但他对媒体的界定把艺术、爱情及其他现象也包括在内，这就令人吃惊了，因为这些现象似乎与常人所理解的定义毫不相干。在社会机构的普遍分化之中进行社会整合这个难题，简言之即，现代化这个论
44 题，经帕森斯提出后，无疑给卢曼对媒体所持的观点产生了影响。将济慈式的价值观与金钱和权力（为何没再加上名望？）强行糅合在一起的动机，是社会统一的最大理论难题。对卢曼和帕森斯而言，媒体仍是将现代社会中分化了的机构维系起来的肌腱。

这样定义媒体也许更恰当些，即把媒体定义为传播系统，这些系统构建了一个未知的接收者群体，换言之，它们拥有抽象的受众。如若这样，媒体便是一些信息中心，向广大公众传递话语及图像。从这角度看，媒体所扮角色与福柯所言的“普遍知识分

子”不无相似，与葛兰西所言的有机的传统知识分子则相反。按此定义，媒体便是与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任何社群都没有关联的文化传播系统；他们只是信号传输体，其信号接收者是一个混乱的远距社会（tele-anomic society）。在《无位置感》（*No Sense of Place*）一书中，梅罗维茨（Meyrowitz）认为媒体与其观众的奇特关系极其明显地重整了社会秩序。梅氏的观点基于欧文·考夫曼（Erving Goffman）的著作，[②] 梅氏争论说，媒体使日常生活中正常情形下彼此分离的观众混合起来，从而改变了社会。电子媒介模糊了制度性构建的亚群体之间的界限。考夫曼所言的台后行为（backstage behavior），即只有亲近同伴间才互相使用的亲昵言谈，以及能够加强观点迥异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纽带的非正式谈话，都因为电视和其他媒体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对此有所了解。

在梅罗维茨看来，电视这种技术成就是为了消除时空距离的影响，使得异质（heterogeneous）人群的异时（asynchronous）“聚会”成为可能。[③] 他认为，要维持一种基于等级差异的社会秩序，便要求每个身份阶层中的每个人都具有一种“位置感”。按他之见，印刷媒介和识字能力总的说来从没危及这一保守原则，从社会角度看迥异群体的分离状态因它们而得以维持。他把妇女运动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这些“传播技术的转变”。[④] 尽管这些断言的有效性充其量也只是很有限的，但梅氏的基本观点还是富有启示性的：“媒体是不同类型的社会环境，以种种特有的方式接纳或排除、团结或区分着人们。”[⑤] 为什么世界大同的态度广为传播与狭隘的地方主义相对萎缩这种现象在前几个世纪是那么常见，他的

论断或许有助于解释其原因。但是，这一论断忽视了政治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到了60年代，当激进运动有效地挑战了早些时候显得那么稳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时候，描述民族、人种及低地位群体（如黑人、同性恋者、单亲家庭）的情景喜剧才取代了诸如《父亲最明白》（*Father Knows Best*）这类电视
45 节目。电视紧跟着政治变化，且有可能强化了政治变化，这种假设很难自圆其说，正如梅罗维茨与此不同的观点一样。

要充分说明媒体的力量，就必须超越会话（conversations）的行为（behavioral）侧面，超越这种剧作法模式，而在语言层面上探讨交往实践这一问题。倡导电子媒介的人声称，电子媒介确实改变了社会交际行为的时空参数，大体上使得任何人都能够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进行交流。理论上，麦克卢汉的地球村图景已有技术可能性。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远距交流却是新的话语结构。交流性交际行为的较早模式基于面对面或印刷文字的情境，它们并不会因为电子的介入而简单地扩展或倍增。电子的介入改变了这些模式的结构，改变了构成符号交换之基础的种种条件。可以这么说，现在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交谈，但所说的话的意思则再也不会与原来完全相同了。

首先，电子媒介会话取消了语境（*contexts*），创造了新的言语情境（speech situations）。电视机是一个新的言语语境，它与过去极其显著的不同在于，说话者（可理解为整个播放机构）对语境的控制程度，迄今为止仍难以想象。电子媒介通过控制种种语境而编创了会话的脚本，有的微不足道（如新闻播音员身后背景颜

色与衣着的颜色的搭配）[6]，有的则非常重要（如伊朗门事件的听证会期间，摄影机角度使诺思中校［Lt.Col.North］显得很是英武，尽管当时的环境是，讯问人的位置高于证人，以便降低证人证词的力度）。语言总是语境性的，词语的部分意义源自在何处使用它们，在这个程度上看，信息方式引入了一种新语言，它在与日常生活的物质限制毫不相干的场所出现。因此，播音员传送给大家接收的词语和姿势是远距语言（tele-language），是一种新形式的英语。

其次，媒体上的会话主要是独白式的（*monologic*），而非对话性的（diologic）。交流的一端几乎输出了所有信息，另一端则只是接收。人们调好台，心甘情愿地变成旁观参与者（spectator-participants），每天三小时、四小时或五小时，一言不发地接收音讯。他们选择了旁观，但有所选择地旁观。旁观接受者（spectator recipient）被构造成只能利用现有的播放内容制订他或她自己的节目表。但这还是从积极参与这个角度来说的。乍看之下，电视观众选择接收者这种无言的角色令人迷惑不解：为什么人们普遍地宁可接收电视的独白式谈话而不愿意接受互动性会话和印刷文字 46
呢？像《圣·芭芭拉》这样的节目有可能比一个人的亲戚、朋友，以及印刷文字的无穷宝库更有趣吗？也许，如心理学家所称，会话会导致焦虑，而阅读则是有氧健脑运动（mental aerobics）。我认为答案是，当一个人在接收媒体的独白式谈话时，他／她并不仅仅是被动的。媒体强化着观众自我构建的形式，这些形式把他们深深地纠结于其中。这一论题我将在下文充分探讨。

第三，媒体的独白式无语境语言是自指性的（*self-referential*）。虽说所有语言都有某种程度的自指性，但是，按它与语境的距离及它的独白特性的比例来看，媒体语言的自指性程度比绝大多数语言更大。在一个稳定的文化中，社会关系通过对话而被再生产出来。在这样的文化中，语言／实践越是与日常生活的面对面语境脱离，语言就越发需要从语言内部生成并再生产这些特征；换言之，媒体必须模拟其语境并对其观众卖弄口才。电视的语言／实践同化了文化的多种功能，其程度比面对面的交谈或印刷文字来得更深，而它的话语效果也是为了从不同于言语或印刷文字的角度构建主体。言语通过加强人们之间的纽带，把主体构建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印刷文字则把主体构建为理性的自律自我，构建成文化的可靠阐释者，他们在彼此隔绝的情形下能在线性象征符号之中找到合乎逻辑的联系。媒体语言代替了说话人群体，并从根本上瓦解了理性自我所必需的话语自指性。媒体语言，由于是无语境、独白式、自指性的，便诱使接受者对自我构建过程抱游戏态度，在话语方式不同的“会话”中，不断地重塑自己。由于和接受者说话的人并不认识接受者，又由于广播之外并不存在一个明确限定的指涉世界来提供一个标准以评价意义流，因此主体并不具有作为会话的一端这种明确的身份。

媒体语言的这些特征可以有所区别地应用于每种类型的媒体，而与电视相关的，则可应用于广播的每一种类型。电视广告最有力地例证了媒体语言的这些新特征，因此，作为分析信息方式的一个主题再合适不过了。

作为社会事件的电视广告　47

电视广告是大家广为经历的社会事件，对信息方式而言，它是一种很独特的事件。电视广告是一种行事性的（performative）符号学现象：它利用词语与图像来改变音讯接受者的行为。其美学效果并不崇高；它所传输的信息几乎没有真理价值；它所传达的道德态度不具榜样性；它所唤起的种种欲望也不是力比多动力学所能解释的。电视广告与哈贝马斯所论述的交流的普遍语用学的任何一点都不相符；它不能证实任何有效性要求（validity claims）——参与者没把它当真，它也不代表世界上的任何东西；它不表达说话人想说的任何意思；它也没有满足任何社会救赎价值。电视广告是人们之所以要离开房间、要用快进键跳过去、要不耐烦地咒骂的东西。它们真的是贬了值的现象，受到普遍的不屑、愤恨、嘲弄，至多也只是宽容而已。然而我坚持认为，它们是一种呼之欲出的新文化的重要的符号学标记。

当一个人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时，发生了什么呢？我们知道，一般人一年要看到数千条广告，一生中也许要看到数万条广告。在发达工业社会，看电视是一种主要的社会活动；就所花时间而言，它仅次于工作和睡觉。所有的社会群体都观看广告，但是年纪特别小的、特别老的以及家庭主妇，显然是最忠心不二的观众。花在电视前面的时间，就是从其他活动中夺来的时间：如与亲朋的交谈、宗教仪式、政治组织、创业、休闲、社区生活等活动。很难否认，当今美国社会中，人们宁可看电视也不愿进行以上这

些活动，且看电视是最受大家欢迎的自愿活动。与空闲时间最同义的便是看电视时间。尽管在很多方面，人们对电视颇有微词，但上述事实依然如此。[7] 当一个人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时，社会的主要社会关系被再生产了。

当一个人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时，发生了什么呢？制作广告投入了很大精力。广告公司开出的薪水很高，制作费也很可观。广告公司要做出成功的广告，压力很大；而电视台要把广告信息传给尽可能多的人，压力更大。如果成本是评判经济的标准，那么
48 必须把广告看作是经济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广告还处于经济中的一个中心结构位置上，与消费手段和消费关系都有交叉。为了稀有的资源而与自然进行的斗争，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而自 20 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的主要问题从生产转向了消费。怎样高效生产这个问题已开始转变为如何激起最大消费这一挑战。20 世纪后半期，人们在一个小巧的竞技场上应战，即在 19 英寸电视上做 30 秒钟广告。当一个人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时，经济的健康就岌岌可危了。

最近，电视广告的至尊地位已受到种种威胁。录像机使得观众能够跳过广告或观看不带广告的电影。像另外许多新技术一样（如：复印机、磁带录音机等等），录像机为人们提供了便宜、快捷、方便地复制信息的能力。它使观者能控制他或她所观看的图像。有些有线频道为交费用户提供不带广告的节日。录像机和收费电视都是避开电视广告的手段。但是，还不清楚这样的躲避是否令人称心。电视广告这种做法非常成功，以至于它已经扩展到

从商品到公益信息，从政治竞选策略到军队征兵以及宗教募捐等领域。有一个有线频道，电视广告是唯一的主题。它集广告、零售、分销于一身，从不间断地播放。这肯定是电视广告登峰造极的最终状态了。商品流通的整个过程全都集中在看电视这一行为中了。如果对电视上所展示的某一款有兴趣，观众只需打个电话订购，便会亲眼看到他或她自己消费行为的发生过程。在一个人看到这种电视广告时，他或她便上了电视，既是这种交流的主体又是其客体。

种种因果

我们很难不得出这一结论：电视广告是重大社会事件，是发达工业社会图景中的显著特征。它们是一种范围甚广的屡发现象，公司行政人员、政客、宗教界人士及社会批判家都看到了它们的重要性。除了认识到广告的普遍重要性，如何阐释广告这一问题就赫然呈现出来。无论是购买一种商品还是低价巧取某件物品，最常采取的策略是把广告看作是经济的或是社会文化的起因或独立变量，并把它们当作个体行为的隶属变量测定其效果。社会科学，尤其是市场研究，一直有一个无奈之处，即没有能力确立电 49
视广告与消费者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假若没有其他相关变量的介入，广告播出后，商品销量上升了，对于市场研究者来说，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但是，用自私自利的资本家的观点来积累社会知识实在是不可取的。

市场研究的观点受公司工具性需要的限制。公司的目的是增

加利润，这就正面干扰着对电视广告的批判性分析。市场研究的话语被商行的竞争姿态结构成理性主体的立场：世界显示为一个无言的他者，可以推来拉去。唯一的问题是，图像的哪种构型将起到最好效果。商行的立场把知识结构成一扇中性的窗户，向着一个由离散的互动客体构成的世界敞开；其主体仍然是商行的欲望，而科学只是它的皮条客而已。如果取消了商行的欲望，便不再有理由说明话语为何要把世界构建为互动客体的一个机制，构建成原因与结果的一个温床。因此，知识作为一种因果比率或因果图表，是与理性自律主体这个假设紧紧相连的，而这个主体无疑是男性的，这种假设则是一个幻想，把欲望当成利润。

我们可以提出这个问题：上文所述的那些相互关系是否是理解电视广告的最佳研究策略，而把构建了这一话语的广告商定义为一个理性的自律体是否恰当。如果电视广告只是无言的物体在一个牛顿式世界中移来动去的话，那么这些运动的原因与结果也许确实是知识的客体，那么，超越了物体世界的主体也就有可能被描绘为理性而自律的了。这一话语立场的困难在于，电视广告以及它们的接受人并不是无言的物体，不是自然界的微粒，而是语言模式。因此，在探讨电视广告的交流作用时，把它们当作受制于机械力学法则的物体对待，便只会搞乱交流行为的语言逻辑，将一个符号系统还原为一个行动系统，把真理话语呈示为结算逻辑。当一个人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时，他或她亦被一种话语所看，这种话语自称是科学，但实际上却是为着合理与利润的目的而在监督着消费主体。

作为意识形态的广告

50

其他事件也发生了。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看待电视广告，为了商行的利益着想，可以不把广告死板地看作是经济事件，而把它看作是一种社会政治事件，它讲述着或参与着社会场中各种力量之间正在进行的游戏。电视广告作为社会参数，其主题有好几种重要的变奏。

电视广告可以被读解为时代的标志。可以把它们采集起来汇编成册，作为一本书的文字或一本图册的照片。每页文字或每幅照片都可以对照其社会语境进行阅读。在此话语方式下，广告有多种主题，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和幻想，因此它们便描绘出日常生活的轮廓。如果细支弗吉尼亚香烟向妇女宣告“你们已经走了很长的路，宝贝”，而与此同时，一位特时髦的模特又以一副满不在乎的放纵姿态喷云吐雾，那么，70 年代的矛盾就得到了调和：一个女人可以在参与对父权制的摧毁行为的同时，继续做一个非常女性化的男孩玩具。在这种阅读中，广告揭示了时代的种种社会张力，而同时又为这些张力提供了解决之道。电视广告被阐释为一种社会记录文件，日常生活的主题学。[8] 这种主题认识到了电视广告的语言学特性，但却没有在这一层面上提出如何对广告进行阐释这一问题。相反，把电视广告作为时代的标志进行阐释，反而强调了它们与其社会语境的关系。

电视广告与社会语境的关系很难确定。没有一个简单的阐述公式可以预先保证广告与社会恰到好处地联系起来。如果真有的

话，广告制作者就能保持常胜不败的纪录了。没有人能够准确预测，一则电视广告将如何被各种群体与阶层的观众所接受。大西洋富田（ARCO）石油公司的一组电视广告，把该公司与对环境的关注及普遍的社会责任感联系起来。而广告观众可能会反过来解释这些符号，把广告看作是对生意的掩饰，他们的生意污染环境，把攫取利润置于社会善行之上。电视广告是视觉文本，因而允许多重化阐释。社会语境这种阐释方法并没有解释这个难题，这种投机取巧的方法把阐释者置于一个无所不知的位置。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可能会不自觉地在广告与社会语境、在细支弗吉尼亚香烟与妇女运动之间臆造出某种联系。在这种情形下，笔者
51 则绕开阐释问题，对此问题不予考虑，而是把人们所称的社会这种复杂的多层面现象的一个侧面与观看电视广告的一种方法放在一起考察。

对电视广告的定义，如果联系到社会语境，就经得住各种不同政治立场的检验。对电视广告的批判文献中，有一个不变的中心主题，那就是广告对观众进行非理性操纵这一莫须有的罪名。广告商为资本家卖命，而资本家的目的就是要把他们的产品卖出去。在这种商品交易中，只有“货物售出概不退换（*caveat emptor*）”这个警告还保持一点批判距离。电视广告的目标就是要破坏购买者残存的理性根基，把商品交换中的工具理性蜕变成欲望这种贱金属，追求没有必要的消费。许多自由思想者及马克思主义者也持这一看法，按此见解，广告商为了增加销售量，维持市场分割，无所不用其极：在电视广告中，汽车象征着社会地位，

腋下除味剂实现了革命抱负，复印机促进了上帝的劳作，乘飞机也成了狂欢经历；妇女的身体受到贬损，健康的价值观遭到败坏，无辜儿童成了贪婪的受害者。[9]

虽说对广告的这种否定阅读无可置疑，但提出的难题非常严肃，还没有得到充分论述。首先，有时还有一些未表明的反女性主义倾向与这种批判联系在一起。广告史学家发现，广告已从商品介绍转变为非理性操纵，前者假定的是理性消费者，而后者则受到批评家的贬责。这一转变发生在 20 世纪初期。它是广告商认识到妇女才是主要消费者的结果。[10] 广告商认定，妇女是无理性的，于是便对广告进行调整，使它们诉诸社会焦虑及不切实际的渴望，以便更好地向女性观众促销其产品。批评家在慷慨激昂地反对广告时，也隐约其辞地责怪广告的受害者——妇女，因而把交流中的道德责任从输出者身上转嫁到接受者身上。当一个（男）人（man）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时，他的自律性便会受到女性非理性的威胁。

其次，对于资产阶级男性主体这种自律的理性自我，电视广告的批评家已经无意识地把它作为话语的基础进行辩护。在这些读者看来，广告从根本上进行瓦解的，正是自我的自律性，而这种自律性一直被不假思索地当作道德、政治及本体论的善。在自由主义者的论述中，这种辩护往往直言不讳。[11] 在马克思主义者笔下，情形就复杂多了。有一种奇怪的置换发生了。理性个体，即古典资产阶级，作为理想主体被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立场所占有并融合，而现今的享乐主义消费者则又变成资产阶级，承

52 担起毁灭这一理想的角色。[12] 自相矛盾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竟然与对资产阶级主体性的怀旧情绪结合起来了。例如，李尔斯（Lears）和福克斯（Fox）把清教禁欲主义的精神气质向消费文化转换的根源归结为处于进步期的资产阶级，而消费文化则被勾勒为“自我实现及及时满足”的欲望。[13]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改头换面，或者按李尔斯的葛兰西式话语来说，这只是一种“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另一种走向而已。

不过，李尔斯论述这一变化时，把它变成了衰落的一个转喻。在新型的消费文化中，有一种因“语言误用”而出现的“意义崩溃”。[14] 广告产生语言的讹误：“广告助长了一种文化的产生，这种文化中很少有基于特定习俗（如诸多传统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甚至连具有特定指涉物的意符也不多（如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15] 但是为什么这是一种“误用”呢？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的指涉意义的文化霸权转变为20世纪的广告语言，这只是一种支配系统走向另一种支配系统，很难说是因语言误用而产生的衰落。像克里斯托弗·拉什（Christopher Lasch）一样，李尔斯指责这种分析疗法的生命意识，把生命看成有些腐蚀性（corrosive）的连续成长：“归根结底，分析疗法心态最具腐蚀性的方面，是把成长及过程本身当作目的加以崇拜。”[16] 到底被蚀去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回答，但是其潜台词是，旧资产阶级的文化是受到威胁的客体，这个文化具有自律的、富于牺牲精神的、稳固的男性自我。

李尔斯的论述采取旧资产阶级的立场，以鞭挞新统治者的心态，这很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17] 这一举动必然有其缺陷，甚至是反动的。这种观点并没基于语言对广告进行批判，反而倒退成对理性主义的主体性进行辩护。从这一观点出发，人们便只能对现在发出道德上的抱怨，而不可能对支配的种种结构与解放可能性加以区别。对于这种马克思主义而言，对当前事态的分析已成为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的挽歌，纵使这并不是作者的明显意图。假若没有像信息方式这样的概念，批评家便会腹背受难，前有广告语言这一六头妖（Scylla，译按，出自希腊神话），后有资产阶级指涉性这一旋涡怪（Charybdis，译按，出自希腊神话）。要想批驳前者，就必须将观点立足于后者。在许多男性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由于资产阶级的指涉性语言植根于自律自我这一主体，因此这种语言始终显得是较佳的选择。主体的这种定义，把女人置于被排除出去的他者位置，所以这一选择自然惹怒了女性主义 53
者。如果探讨广告语言的方式既要避免对主体的定义含有性别歧视色彩，同时又要阐述清楚支配的新兴语言结构，那么社会批判便要求建立一些超越马克思主义框架的范畴。[18]

我在阅读李尔斯对电视广告所做的分析时发现，他的文本中并没有公开维护他对一种价值（自律性）的依赖。我之所以在批判其论点时求助于这一价值，是因为仅有这一价值便可填补其话语中的一段空白或弥补一种缺失。当他使用诸如“腐蚀性”或“误用”这些术语而又不说明其先行词时，便出现了这些空白。于是便指望读者会以适当的术语（以“合适的”或指涉性的语言使

用代替“误用”，以“理性化”代替“腐蚀性的”）填入那些先行词，而又因为这些替代性术语仍未命名，所以并不能对它们自身细加探究。李尔斯使用这些术语，就可以对照着广告中早先呈现出来的“拯救”心态的背景，批判如今广告中的“自我实现”心态，而又不必与马克思主义立场纠缠不清。其话语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的）读者有权认同李尔斯的批判，而不必质疑其批判赖以产生的立场（马克思主义依赖指涉性）。李尔斯的文本说明了这一问题：对电视广告的批判除非是立足于以语言为基础的交流理论，否则这种批判将会堕落成对指涉性话语的辩护，而这种辩护自身则又依赖于理性主体的本体论。

在文本分析的表层上，李尔斯的话语参照了葛兰西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受到这种观点的吸引，因为这种观点把文化和意识形态解释为压迫的种种形式，是国家暴力的替代。持葛兰西式立场的人争论说，在正常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社会维护其霸权的方式，不是诉诸于警察的压制，而是以它的种种观念和文化价值进行较温和的统治。电视广告把工人与消费者自我实现的形象混淆起来，因而有助于使工人的激进主义失去威慑力。按此观点，电视广告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的又一种机制而已。葛兰西的文化霸权观念为马克思主义立场衍生出的第二个好处是，工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屈从已显得不再那么尴尬了。当一个工人看一则电视广告时，阶级意识是虚假的。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指责葛兰西的观点“不成体系”，并力图纠

正这一缺憾。[19] 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个体与他们生存的真实［生产］条件之间的想象关系”的再现。[20] 他强调说，他的 54
定义并非集中在“生存的真实条件”上，而是集中于个体与那些条件之间的关系。[21] 在阿尔都塞看来，个体与那些条件之间的关系总是想象的（按拉康的意思而言），这种想象界是话语“扭曲”的基础，马克思以及其他人已经注意到，这些“扭曲”是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阿尔都塞与马克思主义的大多数意识形态观点在本质上并不一致。阿尔都塞宣称这种想象植根于一种机构以及与这种机构相联系的实践中，因此他便肯定了这一想象的物质性。例如，广告的意识形态便是植根于广告公司这一机构和该机构的生产设备以及广播系统之中。除此以外，看电视这种“实践”也是广告的意识形态之一部分。

阿尔都塞又进一步争论道，意识形态的主要影响是将活的个体（living individuals）构建为主体。[22] 于是，电视广告的观众被广告所结构，并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消费主体。由于广告把个体与他或她“生存的真实条件”间的关系再现为一种想象关系，因此这种认识立刻便成为意识形态性的，而且还是一种错误认识。广告把个体构建成一个能够购买产品的“主体”，一个会劳动并挣到可供花销的收入的“主体”，一个能够自由选择想买怎样的产品的“主体”。严格说来，一个人除非不是在观看实践中被构建成这样，否则他或她就不会接受广告这种交流形式。个体在观看过程中“认识到”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主体，并正因为这种自我认识而使该个体“错误地认识”他或她与“真实生产条件”之间的关系，广告

的意识形态作用就是再生产种种条件，使个体借此变成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主体”，一个法律上自由的、自律的工人和消费者。这样的主体自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一种想象关系；而该主体相信他或她是一个行动者，可是事实上他或她却被该结构构建成它的承受者，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扭曲的”关系。阿尔都塞提醒读者说，这一切意识形态实践并非发生在某个公众空间，而是发生在主体的家庭这种与外界隔绝的、远离历史与政治的喧嚣的“私人空间”。于是，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产生，而同时却还在否认其正在发生。不过，意识形态因为植根于（大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这些饱受各方
55 争夺的机构，它可能是，并且也常常是阶级斗争的舞台。[23] 当一个人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时，资本主义要么被再生产，要么被鞭挞。

像阿尔都塞这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作出了一些重要贡献，使人们能以社会语境批判的眼光来理解电视广告。然而，一些严重的难题有损阿尔都塞话语的批判价值。阿尔都塞解释了一些文化实践的具体作用，例如电视广告对主体的构建，因而便能向前迈进，一方面把文化霸权与物质实践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从根本上瓦解中心主体这一人道主义观念，从而超越了葛兰西。这样，对电视广告进行阿尔都塞式的分析，便不会因为要依赖某个不在场的自律主体而产生破绽。尽管如此，主体这一难题还要随科学问题而再次出现在阿尔都塞的话语中。

阿尔都塞声称他的意识形态概念具有科学地位，他把自己的话语与意识形态的话语加以区分，从而得出他的话语的真理价值。

意识形态是所有主体的一种普遍状态，一直给每个人施加扭曲作用，而科学话语则免于这一局限。阿尔都塞断言，这是因为科学话语无主体："如果一个作者声称他所写的文字具有科学性，从这一点看来，这个作者是完全不会作为'主体'出现在'他的'科学话语之中的（因为，按定义来说，所有的科学话语都是一种无主体的（subject-less）话语，除了在科学之意识形态中，否则不存在'科学之大写主体'）……"[24] 另外，他对诸多特定意识形态的分析，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意识形态性的，这是因为他的分析采取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只有用阶级的观点，亦即阶级斗争的观点，才有可能解释存在于社会形式之中的诸多意识形态（ideologies）。"[25] 给予马克思主义话语的这种特别强调，只会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体构建成资产阶级主体，构建成自律、超验及理论化的、具有未被扭曲的知识的自我。

当阿尔都塞声称他的话语能够进入社会总体性时，中心主体这一问题又暴露出来了。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关于整体的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已经扩展到科学的整个领域，所以其他所有观点——女性主义的、反核的、同性恋的、反种族歧视的——都因此而表现为意识形态性的了。即便总体化理论是从"批判"立场派生出来时，如阿尔都塞所做的那样，它们也不会减少几分压迫性。归根结底，阿尔都塞警告说："它是基础，……决定了整座大厦。"[26] 当一位阿尔都塞式的理论家看到一则电视广告时，广告的意识形态作用是中性化的。

如果说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长处源于该理论对（译按，

56 大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生产手段之间所描画出的关系，那么其短处则在于，该理论不能说明在这样的每一种机器（apparatus）中起作用的种种机制。在电视广告这一个案中，阿尔都塞的观点便不能在传播实践这个层面上，详细阐述主体得以构建的结构复杂性。归根结底，这才是他的意识形态理论最严重的问题。由于缺少广告的语言作用（language-effects）理论，阿尔都塞的观点就不能判断，电视广告在何种程度上不是意识形态的，在何种程度上并没有强化存在于社会世界其他地方的剥削。相反，它们为自己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不是生产方式所能还原的，它既非直接源于生产方式，又不能因改变生产方式而得到纠正。

最后，与植根于历史的（译按，小写）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截然不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把一切文化都阐释为生产手段的延伸。在他看来，在这层关系之外，意识形态便是一种与历史无关的（ahistorical）现象。他写道："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它是误识（misrecognition）普遍而必要的镜子，就像拉康的俄狄浦斯阶段一样，是一个宽泛的一般范畴，很少揭示出年龄的经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尔都塞未能提出，到底什么才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一个特定的文化现象是如何变化的？这一变化如何产生出具有历史独特性的支配方式？要讨论电视广告，或更广泛地说，要讨论电子媒介交流，就必须提出这一问题。在文化层面上提出新的支配形式这一论题，便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领域的控制权。如果能够说明，支配形式是在文化层面上被构建并产生作用的，而且这些支配形式并非源于生产手段，

那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还坚持“生产手段的终极决定因素”，马克思主义就会大声反对对当代的支配方式所作的理解，并且必然会被看成是倒退力量。

符号系统

电视广告所例示的交流情境越来越成为许多社会的特征，当面对这些社会时，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作为一种批判理论就显示出它的诸多局限。意识形态概念以表征逻辑的坐标格（grid）阐释语言现象。意识形态实践可以在生产手段上体现出来；这些都是“客观的”过程，经得起科学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57
生成了诸多表征社会结构的概念。现实居于理性的中心。想象界或无理性界（the nonrational）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普遍现象，变成了意识形态的一个层面，将前科学（prescientific）主体的头脑全都搞混。然而，电视广告以及整个电子媒介交流，因其非指涉性结构而具有重要作用。阿尔都塞争论说，意识形态机器构建了一个虚幻的（illusory）中心主体。电视广告则与此相反，它们强化一个失去中心的（decentered）主体，这个主体从根本上摧毁了对虚幻与真实的区分。而电视广告则从根本上摧毁了科学与意识形态、真假意识、真实与想象的区分。它们是没有直接指涉物的结构，是现实的虚构模型；这些结构和模型自身便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区分进行抗衡，它们是一串只表征自身的文字与图像。

我将尽力以下列两种方法，证明关于电视广告乃至整个媒体

的这一论点：（1）批判性地评述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观点，他与我们这一论点的联系最为密切；（2）把电视广告作为话语/实践，勾勒出它们的交流模式。

波德里亚对媒体的思考，沿着一个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路线。[27] 他写于1968年到1973年间的早期著作，努力以消费客体的理论补充马克思主义。波德里亚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加上了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生产方式之上加上了表意方式（the mode of signification）。他站在“正统的”新左派立场分析消费主义：发达资本主义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从生产转换为消费。今天的经济难题不是如何生产一辆汽车而是如何卖掉它。对消费的分析也要求要有一种范畴方面的转换，即价值及效用这些经济学范畴要转换为符号及能指这些语言学范畴。波德里亚从一种拉康式弗洛伊德的角度对巴尔特的《神话》（*Mythologies*）进行综合：商品生成欲望的手段是把幻想与庸碌、色情及经济合为一体。这种合并之所以能在符号学意义上得以完成，是以对语言结构的转换为手段的。

通常情形下，一个符号由一个词和头脑中的一个图像组成，它联系着一个指涉物，即“真实”世界中的一个“物（thing）”。当个体之间进行符号交换时，符号就变成象征性的了；它们的意义在个体间含混地流动，这种意义必然与彼此的关系相联系。这个词不仅仅具有某个“意义”，它还被说话人彼此分享，像礼物的
58 互换一样，丰富或缩减着社会关系。至少，这是波德里亚的语言乌托邦，他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

广告中的消费客体改变了这一切。广告占据一个能指，亦即占据一个词，这个词与广告所促销的物体并不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关系，但却被附加到那个物体上。广告构建了一个新的语言及传播现实。在广告中，这些流动能指的语境被重建，而它们的作用正是源自这种语境重建。浪漫或性感一旦从恋人的实际关系中抽出，便在语言力量中得以增加。广告中，性感的地板蜡比实实在在的性爱关系中的男女还要浪漫。赘言一句，这一剩余意义源自广告独特的语言结构。地板蜡广告中的浪漫，是以日常生活中找不到的语言和图像构建而成的。一位迷人无比的男子突然出现在（闪入）一间平淡无奇的厨房，而一位平凡无华的妇女因用错了产品，徒劳无功地擦洗着。正是因为这个性感男子不可能在厨房现身，所以他的现身（例如，借助于对录像带细心切换，他便跃入画面）才使得广告脱离了表征的及科学的逻辑。这个男人卡通般的现身使这一形象带有幻想色彩，成为一个对白马王子的幻想，但这一白马王子并非存在于虚构作品中，也非存在于遥远的童话故事中，而是就在一间很像她自己的厨房的图像里。现在，庄臣公司（Johnson's）的地板蜡便等于浪漫的英雄救美人了。这一商品已被赋予一种符号学价值，这一价值与商品的使用价值及交换价值迥然不同，事实上它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层面。正是“浪漫 = 地板蜡”这层关系的“愚不可及”才是它的传播意义得以实现的一个条件。

波德里亚的论点并不是说人们“相信”广告，也不是说广告自身会假设一种表征逻辑，一种有待因果分析的逻辑（多少人购

买某种产品只是因为看了广告）。他的论点也不是基于非理性操纵这种观点；广告作用于观众的无意识，下意识地催眠了观众，让他们去购买某种产品。这恐怕是对表征逻辑作弗洛伊德式的颠倒。波德里亚与这种论述不同，他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立论：广告塑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新的意义组合（地板蜡／浪漫），每个人都言说着这种语言，或者更确切点说，这种语言言说着每个人。波德里亚把商品广告的这一集体语言称为“代码”（the code），但他并没有对这一术语加以充分定义或详细阐述。

此代码可以理解为信息方式及电子媒介交流系统所特有的一种语言或符号系统。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可以理解为它
59 们全都言说着个体，而这种代码也以同样的方式言说着个体。正如索绪尔很久以前所论证的那样，符号的二元结构，即意义借以构建的一整套语义差异关系，为了它的可理解性，要求把言语主体定位成语言结构的结果而非行动者。[28] 当一个说话人发出“I”（我）这个词时，他或她就被英语所说，在英语中“I（我）”和“you（你）”被区分开来，以标明它们所处的截然不同的语言位置。那则广告（地板蜡／浪漫）的社会作用不是经济的或心理的，而是语言的：电视观众参与了一场交流，变成了一个新的语言系统的一部分。就是这么一回事。但这也足以构建一个社会形式。如果不能理解广告的这一语言效果，社会批判理论便不可能把握信息方式带来的新的结构维度。要抵制广告的这种诱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表征逻辑内以质疑解释学方式对广告进行阐释，即把广告看成是价值的“败坏”，语言的

“滥用”。这一策略必将不切要点，必将搞乱代码语言，并会将它的作用还原为资本逻辑的作用。[29]

作为一种语言的社会

罗兰·巴尔特把一种已被界定的社会现象——时尚（fashion译按，或译时装）——作为一种语言结构进行分析，便把语言作为代码这一观念向前发展了一步，从而超越了索绪尔。他推出了他对时尚代码的分析，但对时尚的语言结构该采取历史的观点还是采取普遍性的观点，他摇摆不定。对他而言，时尚代码，一方面与晚期工业资本主义相联系，另一方面又是象征系统的人类学范本，就像文学一样。他对时尚做了如下定义：

> 它是一种机器，维持着意义，却从不固定意义，它永远是一个失望的意义，但它怎么说也是意义：它没有内容，于是便成为一种景观，即人类赋予自己以权利，使没有意义的有所意指；时尚于是便显示为一般表意行为的示范形式，因此便与文学的存在本身重新聚合……于是，它变为“真正人类”的符号。[30]

他在此争论道，代码的语言并非与信息方式相联系的一种新现象，而是所有语言的一种内在可能性。虽说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论点是正确的，但这一论点并没有在电子媒介传播所引入的新的交流情境与诸如代码这样的新语言之间建立联系。这种代码的社 60

会力量不可能被从这些交流的背景中抽出，放进语言的共性域中。要这么做就是要否定语言的历史维度，从根本上瓦解代码的社会批判理论，而最糟的是，这样做就会把理论家构建为共性的主体，把受条件制约的、有限的作者升格，使他们进入绝对化的与历史无关的知识领域。虽说巴尔特的《时尚系统》毋须以普遍主义的方式加以阐述，但他没有将他的分析充分基于历史语境和社会语境，这就为这种阐释可能性敞开了大门。

《时尚系统》并没有在历史分析的路途上一直走下去。巴尔特表明，时尚的运作以限制意义、封闭语义场为手段，因此风格的变化就很有限。每种新风格都可以由“强烈的、明显的、耐久的符号”组成，这些符号要能及时地在下一季度来临时被遗忘。这种符号间的持续游戏不会使人感到厌倦，而是把时尚本身提升为二级层次上的符号。要想永葆时髦，就必须与现行时尚保持一致。时尚必须将它自身作为一种代码持续下去，必须在符号学层面上加以分析。如果只是把时尚理解成为增加销量而进行的操纵手段，那么就看不到它的符号力量。因此，“作为语言，社会学最终还是逃避不了这种［符号学层面上的］分析……”[31]

巴尔特以历史分析弥补了符号学的结构分析。曾几何时，时尚只限于贵族，而如今却是每个人的。[32]时尚的延伸要求以批量生产的方法对商品进行标准化。标准化物品生成了一种代码，在此代码中，物品又变成了它们的标志符号（例如，宽边高顶帽＝［美国］西部的）。巴尔特从没有以波德里亚的那种热情解释过这一过程。相反，在《时尚系统》和《神话》中，[33]他争论道，大众

社会使这些符号“自然化”——这就是其语言的独特性。前现代的社会只“阅读”自然；现代社会才“解释”自然。[34]不过，用以解释的语言使这种符号“合理化”，使得它既是任意的又是自然的。现代社会既隐蔽了这种符号严格意义上的语言性质，又使得商品只能成为一种符号。在此基础上，巴尔特创立了一种元语言学的（metalinguistic）标准来判断社会语言：“因此我们才能够设想对人类社会的界定，可以根据其语义学系统的‘直言性’程度，并且根据它们必然要赋予事物的可理解性是直言有所意指，还是想当然地合乎理性……”[35]“直言性（frankness）”只有在文学中 61
才能实现，因为文学在创造了固定意义这一幻象的同时，又从根本上瓦解那些意义，因此便否认了语言的“自然”特性。虚构作品既假装“真实”又抹擦这种假装。

巴尔特的分析通过把文学本质化，从而也就巧妙地绕开了语言批判理论。他的“直言性”标准可以放到信息方式中，这样他就能断言电视广告也是真正“直言性的”了，因为广告只是模拟自己的现实，而假装没有做任何别的事。电视广告远非把某种商品“自然化”，而是对商品的意义进行游戏。电视广告把主体构建成这样的一个人，他通过选取商品的不同“意义”而与自己的身份进行游戏。电视广告的主体对语言的不固定、不自然、无根据这种性质的认识是“直言的”；而小说的读者正因认识到小说语言的虚构性真实，并因此被本质化为“有文化的”主体，所以他能避开这种“直言性”。电视广告的观众则免于这种危险。当一个人观看电视广告的时候，语言被认为是从社会意义上构成的一种差异游戏。

作为模拟的社会，或超现实

语言的历史构建牵涉到对符号及符号系统进行重新结构，因此，在每种表意（signification）方式的交流行动中，现实的构型并不相同。按波德里亚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古典资本主义阶段的表意方式是再现符号。[36]社会世界按“实在论”的图形借助于符号而得以构建，这些符号的稳定指涉物是物质客体。将能指与所指结合起来的交换媒介是理性。最能例证这种再现符号的交流行为便是阅读写出来的文字。这种书写文字的稳定性及线性排列（linearity）有助于构建理性世界中的主体，有助于构建一个自信的且表达也合乎逻辑的主体。这个主体借助于符号说着实在的语言，而实在的语言的最高理想就是自然科学的话语。当然，在任何时期，表意方式都不会是排他的或单一的；但是，若说在我们前面已经过去的那个时期，这种再现形式占主导地位，这样的论点还是可以成立的。

在现代阶段，能指与所指具有一种抽象关系。这是由于许多词只是理性的工具，与它们唤起的意义或这些意义所指的事物没
62 有内在联系，但仍然足以保证这种联系。理性的元叙事支撑着这种表意方式，通过阅读行为，通过这种对印刷文字在心象中的单向流动的不断追随，这一表意方式被一再向每个人证实。资产阶级过去就是生活在这种再现性表意方式的云雾中而不自知，许多人仍然这样生活着。建筑庞大的工业帝国的指挥者，毫不怀疑词与物一致并再现对象，正如砖头和砂浆相结合便可形成墙一样。

当主体面对晨报或账本时，便被词语按理性方式构建为一个工具主体。该主体已经被再现性表意方式所构建，只有在这层意义上，这个成年白种男性主体才能站在一个超验性的自由的位置上，审视社会世界。

在信息性表意方式（信息方式）中，情况很不一样。符号的各种组成部分之间的内部关系具有一种抽象的规约性（conventionality），这是早期阶段的典型特征，如今被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波德里亚的导师亨利·列菲弗尔（Henri Lefebvre）所说的“指涉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referentials）”中，[37]符号与指涉之间最为重要的联系被粉碎了。新的表意方式是大众媒介的典型特征。在理查德·特迪曼的分析中，报纸首当其冲，从再现方式转变为信息方式，从语境化的线性分析转变为摆出一副客观外表的孤立数据的蒙太奇。但是，所谓的客观性，除了这种对真实性的去政治化的模拟外，还有什么呢？[38]在巴黎以及其他地方，报纸在19世纪后半期，发行量猛增，覆盖面很广，这时，报纸也从特定观点的喉舌转变为“一切适合刊印的真话”的供应商。报纸愈加远离有区别的社团，就愈加脱离其参照群体，其话语也就愈加背离再现方式而走向信息方式。

在电视广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的表意方式，流动的能指只在广告传播的艺术鉴赏层面上，才会被附加到商品上。语言的意指能力，即呈现意义的能力，不仅仅因人们认识到语言的规约性而被承认，它还变成了交流的主体与结构。每一则电视广告都在其结构中复制了语言的终极便利性（the ultimate facility）：语言被

改造了，新的联系在电视广告中得以确立，新的意义借助电视广
63 告而出现。如果按再现性表意方式阅读电视广告，那么它就被阐释为一种冒犯、一种操纵、一套谎言，令人深感厌恶、甚至还具有道德上的危险性。因此，这个世界就好像是根据成年白种男性的理性元叙事构建而成的。

但是要日复一日地对电视广告作这样的解读是很困难的，探究为何如此困难也是很重要的。当看了一则又一则广告后，再现性的批评家渐渐失去了兴趣，变得麻木，便采取不加批评的姿态，变得厌烦而逐渐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接受了这一交流。我的论点是，广告以一种非再现性的、非工具性的传播方式，一种与阅读印刷文字不同的方式，对其观众进行构建。[39] 当然，电视广告是设计来推销产品的，但这样做的时候，广告改造了语言。其工具功能被电视广告否定了，广告只有在它不被理解为广告、不从工具性的角度理解时才起作用。借助其语言结构，电视广告在一个非工具性层面上交流，而工具性则被放到括号中。与产品没有联系的流动能指加入了游戏；图像及文字，不管它们反映的生存状态是否称心，都以一种能够优化观众注意力而又不致引起批判觉悟的方式加以描述。

电视广告中规定了一种交流，这是日常生活的任何语境中都不会有的交流。非真实的被制作成真实的，被交流的是一套没有意义的意义。用波德里亚的术语说，被交流的是对交流的一种模拟，它比现实还要真实。[40] 电视广告中的商品—物体与人们从商店买回家消费掉的商品已不是同一件东西。买回家的东西有用但

毫无诗意，有效但易被忘记，能派上用场但稀松平常。广告中及商店展示的物品是神奇的，可填满欲望的，令人垂涎的，激动人心的。这两者的差异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电视广告的传播在其代码内构建主体。这种超现实（hyperreal）是电视广告中语言学上的创造；当其抽象消费者（the consumer）变为一个具体使用者（a user），当电视传播所构建的抽象主体（the subject）变为一个被构建的具体主体（a subject）并与商品—物体具有日常关系时，这种超现实便荡然消失。

也许不会，也许模拟作用仍会继续。波德里亚坚持认为，超现实就是我们的“现实”，它不只是存在于电视广告中，而且是20世纪晚期的文化用以调动主体的手段。“如今，现实本身正是超现实的。……如今，整个日常生活的现实——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以及经济的——都并入了超现实主义（hyperrealism，译按，不可与本世纪的超现实主义文艺思潮〔surrealism〕相混）的模拟维度。我们已处处生活在现实的一种‘审美’幻象之中。”[41] 波德 64
里亚对超现实这一概念的概括，从具体的传播实践到社会总体性，这是他的话语中出问题的因素，信息方式批判理论必须摈弃他的观点的这个侧面。波德里亚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对一套话语/实践的区别分析向全应陈述（global statements）让步了。做出“我们已处处生活在……”这种陈述的人，他所处的位置也具有有限性，而这种陈述所做出的断言已经超越那种有限性的极限。

正如一位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格里·吉尔（Gerry Gill）指出：“波德里亚赋予‘代码’以一种权势，几乎要统摄经济、政治、意

识形态和文化……”[42] 吉尔善意地比较了阿尔都塞与波德里亚的观点：“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把人们构建为主体，而在同样的领域中，波德里亚则认为，符号与代码给主体在等级制社会秩序中指定了位置，并将他们锁定在一套只能容许商品交换和符号交换的话语中。”[43] 吉尔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使他能够宽厚地把波德里亚早期对商品的批判视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可贵补充，但却把他最近的著作当成后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拒绝。吉尔指责，波德里亚像后结构主义者们一样，从“主体间要素（intersubjective moment）”中抽身而去，然后“沉醉于主动的去中心主体性经验之中”。[44] 对后结构主义采取阿尔都塞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也就构建了这种“主动的去中心主体性”的语境。

在后结构主义者的文本阅读实践中，意义是由读者主动构建的。吉尔论证说，知识分子这样做就在孤立的阅读中构建了自我，因为高等教育的推广，这种做法已经被资本主义推向所有的大众社会。大众教育意味着“培训人们对世界进行有前提有系统的思考，[并]要求自我与它对特定身份与规范的认同脱离，这些身份与规范是封闭的群体生活所预先给定的”。[45] 于是，后结构主义者从理论上概括了一种新的社会实践，但是，吉尔声称，他们错就错在忽略了使他们的实践获得语境的自我反思要素（self-reflexive moment）。吉尔的批判性结论是，“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规划是对以下社会状态的支持，即它生成并维持其主体性的独特方式……而同时又掩盖了其构成条件……”[46]

虽说对后结构主义的这种批判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德里

达、巴尔特、拉康，也许还有其他人，但把它用于波德里亚的观点却不恰当。超现实的理论家一直在努力，想理解波德里亚的观点得以产生的那些实践。很少有理论家比波德里亚更具自我反思性。他的著作弥漫着他周围的社会现实的意识，表明他一直想联系当前的社会状况（that social present）以阐明自己的经验。在波 65
德里亚身上，世界并非局限于书的一隅。马克思主义批评家暗示，阅读实践构建了信息方式，其实这并没有切中目标。电视广告并不像阅读，它并不符合线性的表征逻辑。人们也可论证其逆命题：超现实在电视广告等中的传布，创造了一种自我构建实践，这种实践被德里达、福柯以及巴尔特等后结构主义者翻译成一种新的阅读实践，这种新的阅读实践违背了与阅读相联系的传统的表意方式，这种新的阅读实践与字面意义及稳定性，亦即与印刷文字确凿可靠的单义性断裂了。要说有区别的话，后结构主义只不过是用信息方式的语言翻译了阅读实践。他们之所以会引起如此多方面的强烈反对，也正可以通过这一点加以解释：他们违反了与书本相联系的表征话语的法则，将电视广告令人眩晕的多义性带进了阅读。吉尔说，德里达对其话语的社会语言学语境缺乏反思，他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但吉尔把德里达的那种话语定义为一种阅读则是错误的。最好还是把解构定义为运用到书本上的看电视行为。解构主义把电视广告无实质的非现实性当作写作的元叙事。

马克思主义对超现实的批判是含糊的。一方面，超现实被认为是越来越具主导性的意识形态要素；另一方面，它又被宣判为一种意识形态误构（misconstruction）。我们不可能要求两全其

美：要么波德里亚错了，超现实与当今社会中的自我构建实践并不对应；要么有某种成分在波德里亚的观点中发挥作用，并揭示了社会的某个重要特征，从生产方式范畴的内部还不能将这一特征阐释清楚，它显明的复杂性需要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话语策略。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斥责后结构主义者的自我专注，另一方面又肯定他们将个体自由拓展到“人类生存的所有先天局限”之外，这便暴露出马克思主义者的矛盾心情。[47] 在阅读中，个体通过界定文本的意义而构建自己，吉尔哀叹道，阅读的这种“高峰体验”同样适用于消费行为。但是这正是信息方式的“矛盾”所在：它既许诺自我构建的一个新层次，一个超越固定身份的刻板和约束的层次，同时又可能使个体服从于操纵性的传播实践。另辟蹊
66 径并不是就要为一个时过境迁的集体主体（如，无产阶级）辩护，而是要探索一种新政治的种种路线，为自我构建的现存形式通往民主化的秩序重建开辟通途。

波德里亚谈到了社会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48] 在这种新情境中，辉格党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失去了共鸣。他所说的“社会”和“历史”是指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主体围绕着一种集体方向感而调整自己的实践，对公共事件的阐释也从一个“理性的”元叙事角度进行，相当比例的人口感到他们的委琐小事与人类的最终命运相联系。

> 大众对解放、革命或历史性的活动无动于衷，但这就是他们自我防卫、快速反击的方式。他们是一种模拟模式，是

> 为幻影政治阶层提供的不在场证据，这一政治阶层施加于大众的政治权力的性质是什么，它自己并不明白，而与此同时，对于统治大众的政治过程本身的死亡，它也不明白。就它所暗含的意志和再现而言，大众已淹没了政治。[49]

于是，冲突便从党派政治或阶级结构中转移了。如果波德里亚正确，那么，游戏规则已经改变，雅各宾党与辉格党的变化模式已不再适用。波德里亚的错误在于，他以为旧模式一去不返，所以就没有可代替它们的模式了。

旧模式是男性白人的；人们可能会争论说，女性主义和少数人群体的运动就是新的变化形式，这些形式并非从旧的表意方式中衍生而来。即便并非如此，波德里亚的总体化观点也排除了新运动的可能性。当他陷入超现实令人沮丧的夸张时，便以囊括一切的悲观见解，越出批判话语的底线，似乎他已经知晓一个故事的结局，尽管这个故事还没人想到、更不用说写出来了。信息方式这个概念也许只是对社会场进行批判性的理解时所迈出的一小步，这个社会场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非常难以辨认。正在出现的社会形式会导致错误认识的产生，但不恰当的理论的勉强应用以及批判理论家社会语境方面的局限也都会导致错误认识的产生。 67

电视广告与信息方式

在信息方式下，一套新的语言／实践冲击了面对面及印刷文

字语境下的种种既存语言 / 实践。电视广告代表着信息方式下媒介领域里的极端倾向：它是独白式自指交流，其言语的语境是不同步的。其交流手段脱离了言说者社群，被从生产方式下的物质基础中抽取出来。远程传播的新技术是这种抽取的必要条件，但它们却并不能决定符号的内部结构。新的语言 / 实践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没有作者权威中心（an authorial center）的文化创造，但这一文化创造与生产方式以及它出现于其中的力量场却又是相关的。

电视广告作为符号系统，它与解放规划具有一种含混不清的关系。电视广告把主体构建为一个消费者，将主体当作一个依附性的旁观者而进行合并。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也消解了这一自律主体，这一理性的男性资产阶级。作为一种语言 / 实践，电视广告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类主体，它们以前一直联系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这种生产方式相关的父权制及种族中心主义形式。虽然它取代了作为旁观者 / 消费者的主体，但是它也解构了作为中心化原始行为者的主体。为了在异步独白的条件下将一条音讯传给一个接收者，电视广告便将其自身构建为语言 / 世界，而接收者则被置于指涉对象的位置。接收者 / 消费者便是保证电视广告“起作用”或有“意义”的那位上帝。只有那个不在场的音讯接受者才能保证电视广告的语言说得很好。

于是，广告音讯的接收者扮演着两个角色：一个是其话语的客体，是被操纵的、被动的、消费主义的；一个是其话语的主体，是法官、验证的钢印、指涉对象。由于观众既被构建为客体又被

构建为主体，既是物又是上帝，于是便面临着主体位置的不可能性，即主体根本上的无实质性。要想“阅读”电视广告，要想在其中寻求意义，便要求有一种双重定位：人们既必须接受其音讯的施为力（illocutionary force）（购买那件产品），又必须把流动能指附加到所指产品上，创造广告的意义（制造符号）。观众的这一既共时又分离的位置，动摇了被构建主体的那种虚幻的稳固性。电视广告中创造出来的那种语言，任由／促使观众将自己的主体性看作是一种被构建的结构，将他们自己看作是自我构建者社群 68
中的成员。这个社群是与时空分离的异步社群（有了录像机、卫星），一个沉默的社群，这个社群中的个体只用一种方式参与了电视广告中的自指性交谈：即把他们自己构建为其音讯的主体／客体。

电视广告（以及，从趋势来看，整个媒体）把主体构建为自我构建者，在这层意义上，自我构建的霸权形式便要受到质疑。按非民主方式结构起来的交谈，老板与工人、男人与女人、白人与非白人、成人与小孩之间的谈话，都巩固着自我构建的霸权形式，这些霸权形式中的主体既是从属的又是固定不变的。因此，电视广告的“另一面”就是它们对这些话语／实践的威胁，这威胁也许目前还没有多大直接的政治影响，但仍然可能是对种种支配性语言的批判的开端。电视广告以及，更广义地说，信息方式下的媒体领域，通过对消费者主体进行语言构建，扩展了非自由的范围，并通过对中心主体的所有形式进行解构，为话语打开了一条通向自由的新层面的道路。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参与式监督

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

——摘自《谷登堡续》

电视广告与数据库

在电视广告中，一种新语言情境是通过对语境的操纵、把交谈还原成独白以及音讯的自我指涉性而构成的。数据库所代表的语言情境则有些不同。在这一情况中，根本没有人对个体说话，他或她也不会收到任何音讯。实际上，这里的交流是反向进行的。个体，往往间接地，向数据库发送音讯。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库至多不过是信息的贮库。作为语言的一种形式，它与书写的最早用途很相像：日常生活某方面数据的收集。[①] 然而，在电视广

告这一情形中，语言情境的电子介入改变了一切。在本章里，我将在信息方式下对贮存起来的语言，用电脑行话来说即是，数据库，加以分析。参照米歇尔·福柯的著作，尤其是他对话语的分析，我们便能很好地揭示数据库的结构以及数据库与社会的关系。如果一种理论把语言与行动的相互依赖作为问题进行探讨，像福柯的理论那样，那么数据库的语言特性以及它对政治的潜在含义便能被充分把握。

70 绝对主体的报信员

热衷于信息社会的人高声通报了完美交流时代的来临。戈弗雷（Godfrey）和帕克希尔（Parkhill）宣称："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不可能的理想。但是，电脑与现有通信线路的联姻将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这个目标。"[②]《谷登堡续》（译按，谷登堡 Gutenberg，欧洲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的这两位作者所触及的话题，正日益变成未来学家的标志：坐在舒适的家里，面对一部装有调制解调器的电脑，人就可以进入世界上所有数据库的所有信息了。这使人想起福楼拜对这种追寻全部的完美知识的行为的滑稽描绘。他笔下的两个角色，布瓦尔和佩库谢，徒劳地积聚并整理所有真理。与他们的堂·吉诃德式的追寻如出一辙，萨特在《恶心》中描述的一位负面人物，毅然通读了整个图书馆，从字母 A 开始向 Z 进发。这种幻想的当今翻版则有着如下的臆想：

1. 所有印刷出来的东西都被编码并贮存了；
2. 由此形成的“图书馆”无一受到“口令的保护”，或者用老式资本主义的行话来说，无一“属私人所有”；
3. 人人都将使用这类信息，且这样使用并不具有政治意蕴；
4. 在数字编码、贮存、提取、传输及复制过程中，不会丧失任何有意义的东西。

这些假设的每一条都非常值得质疑。

监视

首先，图文记录的数据编码确实发展迅猛。数据库的数目和内容都很庞大且增加很快。凡看到过数据库中的统计数据或见识过其遍及范围的人，无一不为之震惊。戴维·伯纳姆（David Burnham）在1983年写道：“美国五家最大的信贷汇报公司在其电脑中保存着一亿五千万人次的个人信贷记录。”[③] 刚好也就是那一年，我买了一辆车。在签署合同前，经销商按惯例对我进行TRW信用检查。就在我眼前，与一个我从没见到过的推销商坐在一个我从没到过的地方，几秒钟内，一张我所有的赊购交易清单便从打印机中吐出来了，还包括了教育贷款以及我早就忘了的 71
一些小事。虽说今天看来，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技术成就，但这种信用核查生动地图解了“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的可怕意义。

除了信贷公司以外，拥有数据库的有健康保险公司、市级警察、州级机动车辆机构、不计其数的政府部门、银行、公用事业公司等等，这个名单还可以无限罗列下去。早在1974年，詹姆斯·鲁尔（James Rule）对主要机构的档案做了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数据库能够对任何人的日常活动进行详细的重新构建。④数据库除了范围变得更广，还新增了一些能力。现在，数据库可以包括彩色图片和文字内容，因此对人或事物的识别就容易了。记录也可以转换成永久的微型ROM芯片，以这种形式，例如，包含个人病史的“生命卡”便可以戴在手腕上，以防紧急情况。⑤另外，数据库很容易相互连接，从而构建一个庞大网络，贮存着全民信息，这肯定可以与天堂里那无尽的生死簿相抗衡。⑥

面对这样对个人隐私的大肆侵犯，立法者徒然地奔波忙碌，想赶上信息技术传播的脚步。1974年《隐私法案》（The Privacy Act），再加上《信息自由法案》（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对联邦政府拥有的数据库加以管制。法律限制了可以贮存的信息类型，严格规定数据库的使用，把它限制于收集时的目的，禁止在某些情况下买卖通信地址。《隐私法案》还允许个人查看有关他们的记录。但是这一法案没有覆盖到州、市或银行这类私有机构，而且最为麻烦的是，没能够设立一个机构实施这一法律。⑦《隐私法案》提出了信息方式的一个很普遍的社会问题：信息复制、传输、存取的戏剧性变化已深深地影响了整个社会体制。交流手段和交流关系的急剧变化正在搅乱社会秩序的微妙平衡，这一秩序是在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和20世纪中央集权的福利经济统治时

期，通过协商和斗争而达到的。国家政府与地区政府间的关系，国家及地方政府与经济、教育、宗教、媒体及家族间的关系，以及所有这一切与个人间的关系，简言之，整个社会基础结构，必 72
须重新校准，必须与信息方式的数据库保持同步。

然而，怀疑主义者可能指出，还有许多信息收集与贮存的工作要做，而且新信息的产生将使得所要收录的数据内容这种负担不断加重，即便不是荒唐可笑，也将是西西弗斯式的（Sisyphean）徒劳无功。不过，通过给信息的定义设置很严格的参数，数字编码极大地加强了信息传输及复制的效率。假设犹太教-基督教《圣经》印刷出来有 1800 页，数据库里有这样的一个摹本与电话线相连，那么在配置了速率为 9600 波特的调制解调器的电脑上，一个人便可在十分钟内复制一份，而中世纪的一个修士以羽毛笔蘸墨水在羊皮纸上写，恐怕要辛劳一年才能拿出一本《圣经》。语言、图像及声音的数字编码及电子操作使得交流的时空限制失效了。信息的复制精确无误，传输瞬间即得，贮存持久永恒，提取易如反掌。如今，启蒙运动所梦想的有教养社会，即最底层的人亦可获取所有知识的社会，在技术上已经可行。在哲学家所憎恨的那个黑暗世界里，僧侣们以一种无人能懂的语言喋喋不休，王公贵族私下里便决定了社会的命运，商人及工匠对其产品的生产及分配的方法秘而不宣；在这幽暗世界中，信息流动受到限制，如今这一切似乎已一去不复返了。人类历史新的一天无疑已经破晓，但这一天所预示的是什么还远未清晰。

冲到前场

数据库也许是使得全民真正受到教育成为可能的条件，但是，只有技术决定论者才相信这必然发现。技术新玩意儿是在现有需求的背景下开发出来的，受特定位置上的个人的感知力影响；它们的生产及传播受到统治权力的限制，并受到霸权文化模式和个人恐惧的抵制。虽然从技术上讲，每个人都有可能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得信息，但这一事实绝不保证这种可能必然会实现。实际上，在私有财产的神圣庇护下，一定会有人不遗余力地确保信息不会让每个人都能获得。在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物质商品的生产所必需的社会及自然资源受到自私自利的私人控制。在信息方式时代，这一过程又在起作用了。现在我们不能不相信“信息”首
73 先是一种商品，其次，它受各种市场力量的严格控制。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假定资源是匮乏的，因而资源的分配最好由市场机制来决定。然而，信息却并非匮乏而是丰裕而廉价。在信息方式中，市场自己颠倒了自己：市场通过限制信息的流动，从而形成信息匮乏，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那是自然事实。

问题是，信息太容易再生产了。迄今为止，商品都是难以再生产的。几乎制造每样东西都需要材料与技术的复杂组合。生产者与消费者被生产过程分离。衣物、用具、家具等等，很少有消费者会认为他们可以自产自销这些东西。[8] 书籍、音乐、电影的情形也决无不同。消费者付钱购买的是书籍的制作，而非书中的信息。书中的信息不必花钱便可在公共图书馆里获取。同样，唱

片也是如此：人们所购买的商品是那黑色圆盘，而非其中所包含的、人人皆可哼唱的曲调。信息很难与传达信息的“包装”分开，而包装却有着一张价码标签。信息复制的新技术已经改变了这一切：复印设备、录音录像机、光盘驱动器以及卫星接收器等，使得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制作人。任何人都能复制信息，把它包装起来，他的包装与商业包装一样好，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好。

私有财产这个原则在信息领域内受到了威胁。新的传播技术使得人们既可控制信息的再生产又可控制其分配。当一个人第一次观看他（她）录在录像带上的电视节目时，他（她）被自己对节目的控制所迷惑。复录到录像带上的节目可以随观看者的方便，停止、快进、倒放、重放、慢放、剪辑，每当此时，该消费者便会意识到他或她过去多么依赖节目播放时间表。索尼公司因为帮助实施这种所谓的侵犯自由企业的行为而被诉讼。电视网因为不能证明有任何物质损失而败诉。法庭结论是，只要消费者不进行批量生产并销售其录像带，便没有触犯任何市场法。这一诉讼揭示，资本家不仅想控制电波以及电波所发送的内容，而且还要控制观众，控制他或她何时观看，观看什么，观看的顺序，以及所 74
看图像的速度。录像机并没有真正改变所观看的内容，它们只是从根本上瓦解了播放者对观众的控制及约束。⑨

消费者做出来的录像比生产者制作的还要好，录音则更是如此。人们可以很便宜地购买到空白带，这些空白带的质量比生产商的预录带的质量还要好。家庭录音师的录制或复制是在“实”时状况下（in “real” time）进行的，不像公司制作那样加速了这

一过程，所以家庭录制产生更优质的拷贝，比商业拷贝中所含的原始信息更多。消费者以清洁磁带轨道这个很简单的方法保养设备，因而制作出优质拷贝，这对个人来说是很容易的事，而对于批量生产而言，这便是很难做到的苛求。音像带的制造商们使用劣质磁带，花在拷贝制作上的时间太少，也不把复制设备保持在最优状态。其结果便是，在信息方式下，消费者往往以最少的花费，制作出比生产者制造的产品还要好的东西。于是，信息方式以另一种方式破坏了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实践。

这种逆转的最极端情形发生在数字化的信息中。一旦声音及图像被数字化编码，它们便可以被完美而无穷地复制。将信息商品化的这种努力碰到了数字化复制这堵看不见的砖墙。当声音、图像及语言被数字编码时，它们也就被从物质存在域中抽取出来。惯性法则和能量守恒定律即使没有在技术上受到违犯，在实践中也被弃置一边。信息转换的方式从模拟转变为数字化，就使信息转换可能从自然组织之物转化为可控电子。在语言这一情形中，字母被缩约为一套以 0 和 1 组成的二进制组合代码（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 ASCII）。一旦这种转换可以实现，电子脉冲便代替了 0 和 1。突破了这个点以后，口头及书面语言的自然的物质限制便不再有效。如今，大量语言几乎可以在瞬间就被贮存、传输或复制。又由于这种情形的出现，数字化的语言与商品形式也就极不相称。被数字化编码的语言——电脑程序、百科全书、书籍、银行记录等等——既容易复制，亦容易产生讹误。在工业社会时期，
75 资本主义与语言的关系似乎要求有某种复杂的组合方式，使语言

的复制只有在它转换成沉重呆滞的物质形态时才能实现，而这些物质形态正是资本主义最善于控制的。一旦这种安排被电子媒介的传播设备所打破，资本主义便丧失了控制语言的能力，而在它丧失这种能力的同时，也就在生产（科学）、消费（广告）及控制（市场研究、系统理论、控制论、博弈理论等）过程中对语言产生依赖。

当然，私有企业体制决不会轻易屈服于历史环境的这些解放潜能。无论其结果是如何不合适、不可靠、荒唐或不公平，这个体制都会尽一切努力使信息商品化。家庭联网这种新技术使家用电脑可以获得广泛的信息服务，它例证了信息商品化这一问题。家庭联网为消费者提供产品的图文化信息，并且使得人们能够只通过电脑就能订购那些产品。自 80 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就有了这些服务，而美国正在开发。[10] 从一方面看，庞大的数据库让消费者在家便能很方便地获取信息。从另一方面看，消费者每订购一次产品，也就为那些公司提供了该消费者的详细信息，因而又产生了新的数据库。正如凯文·威尔逊（Kevin Wilson）所述：

> 互动系统的返回渠道……将会……把消费者的需求与消费的许多相关信息传回给工业。这种信息将包括消费者的身份、消费的时间与地点……以及产品特性。这种数据……将出于营销目的而给消费者的活动描绘出一幅无价的肖像。这些系统将会创造一个真正的控制论意义上的生产与消费循环；因为每一次消费活动都会产生一些与将来的生产调节相关的信息。[11]

在家庭联网的信息环路中，一个数据库（产品信息）产生了另一数据库（消费者信息），该数据库又产生了另一数据库（需求信息），而此数据库则为生产过程提供馈给。在此背景下，信息商品化便创造了它自己的扩大再生产系统：生产者拥有关于消费者的数据库，而这些数据库本身便是商品，可以被转售给其他生产者。社会批评家提醒我们，参与者对新的营销体制欣喜若狂，这时他们往往会忘记，90 年代开始之初，电脑仍然还没在美国家庭
76 广泛使用。然而，在法国，电话公司给装了电话的家庭提供的不是电话号码簿而是电脑，从而解决了电脑不普及这个问题。从长远角度看，这种政策是经济实惠的，而更有意义的是，它因此能够为别人提供消费者信息或家庭联网这一极其有利可图的服务。

言谈、印刷与电子

正当交流中的言说（speech）与书写形式因电子媒介而黯然失色之时，言说与书写的区别也受到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注。在哲学领域，一场战火在塞尔（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 theory）与德里达的 écriture（书写）概念之间燃起。在社会理论领域，哈贝马斯虽然声称受到严重误解，但还是把“理想化的言语情境”作为一套普遍的总体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节点（nodal point）而津津乐道。安东尼·吉登斯也使用“言谈”（talk）这个概念作为他的辩护词，以反对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对主体的批判。在《野性思维的驯化》一书中，杰克·古迪（Jack

Goody）维护口头文化的复杂性，指责印刷文化的诸种局限。[12] 而传播史先驱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则对书写与印刷做出了重要的区分。[13] 马歇尔·麦克卢汉及其追随者只是区别了电子媒介和前电子媒介，这很可能已属少数了。[14]

要在信息方式下对数据库进行分析，便要对口头文化与印刷文化的讨论中一些极其关键的论题有所理解。如果要求社会理论及历史从此认真对待数据库的扩散及其对社会的影响，那么必须质疑对语言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所做的刻板区分。口头／书面这种二分法把电子语言纳入书写范畴，从而模糊了电子语言的独特性。需要提出的问题是：

1. 作为与言语及书写迥异的电子语言（在此情形中指数据库），它是以哪些方式帮助和限制意义的传输或贮存的？
2. 电子语言独特的社会特性是如何构成了数据库的使用和影响的？

在本文的讨论中，我的目的既不是要庆贺电子媒介对书籍的“胜利”，也不是要为电子语言所导致的道德沦丧唱挽歌，而是希 77
望能为批判性理解新兴的社会形式有所贡献。

将电子语言与言说及书写进行比较的难处，在安东尼·吉尼斯最近的著作中已经有所阐述。作为社会学的重要理论家，吉登斯很久以来一直维护一种主体理论，这种理论与诸如加芬克尔（Garfinkel）、西屈雷尔（Cicourel）以及戈夫曼（Goffman）等人

种学方法论学家（ethnomethodologists）的著作密切相关。社会理论的这种倾向之所以为人所知，是因为社会行为者通过日常生活所进行的语言学上的和认识论上的协商极为复杂，而这种倾向所敏感的就是这种复杂性。吉登斯很精明地认识到，马克思、韦伯及迪克海姆（Durkheim）的著作中存在着一种危险的盲见，即对于普通个体的认识论上的成就的盲目。这些宏观社会理论家的著作暴露了他们依附于柏拉图对知识与见解所作的区分。知识是理论与科学的结果，而见解只是社会行为者可以获得的信息的低级形式。其潜台词是，社会行为者对控制他或她的命运的种种力量毫无意识，对于获得真理也无能为力。

对于吉登斯而言，这种傲慢给社会批判理论带来的结果，便是使它变成了一个有缺陷的社会行动理论。社会理论被迫摇摆于彻底的决定论与革命性主体这个浪漫概念之间，这个主体可以是一个群体或一个个体，以一种战胜自我的启示录式的姿态，神奇地超越了日常生活的诸多条件。反过来看，如果早把社会行为者看成是在正常的行动过程中取得了很大成就，自由与决定论、主体与结构之间的分野也就不会如此之宽。如果平凡的活动也要求语言上的精妙和认识论上的自我反思，那么社会行为者也早就能够进行批评性反省了。因此，对变化（从虚假意识到真实意识的变化）进行理论思考的主要障碍也就被排除了，而理论话语的特权地位也就受到质疑（普通行动已预先假定了批判理论）。然而，在吉登斯的著作中，对理论主体的批判仍然维持在一个含蓄的层面上，这种批判是对普通社会行为者的再评价所暗示的。

在讨论言说与书写的区别时，吉登斯宁用“言谈（talk）”这一术语而不用“言说（speech）”。他辩论说，这是因为言谈暗示着社会活动。对他而言，言谈植根于人类日常交往的实实在在的语境中。因此，语言才牢固地停泊于社会现实，与语言复杂性相联系的不是语言的内部结构，而是语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排列。吉登斯观点的重要意蕴是，书写缺乏具体情境下的言谈所具有的复 78
杂性。他在一个重要的陈述中坚持这一主张：文本的阐释“照样可以发生，毋须某个背景内共同在场（co-presence）所涉及的相互知识的某些特定因素，也毋须共同协调的监视（co-coordinated monitoring），共同在场的个人把这种监视当作正在进行的言谈之一部分继续下去”。[15] 这种对书写的强调，正如在解构主义中也可以看到的那样，并不适合社会理论；这并非像很多人争论的那样，是因为德里达无法超越文本，而是因为当书写模式被强加于社会行动时，它便系统化地误认了文本，忽略了文本语境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当文本的专家型读者面对阐释普通言说这一任务时，总是看错地方。文本的复杂性与词语的（verbal）复杂性并不相同。

吉登斯以言谈而非书写作为社会理论的中心，不管其长处是什么，但从信息方式理论的角度看，仍存在一个尤其麻烦的难题。言谈行为者这种理论模糊了当今社会中语言实践的丰富性，这些语言实践，如数据库，并不包括言谈行为者。言谈的模式尤其不适合对所有这类重要现象所做的分析。再者，吉登斯只关注对言谈主体的认可，这使他将电子语言的所有形式都当作是文本的另外一些例子而轻轻打发过去。他轻描淡写地说，虽说文本是非言

谈式语言的主要形式，但“在当代，我们还得加上电子传播媒介”。[16] 于是，电子媒介便被归纳在包括了除言说以外的所有文化客体的宽泛范畴下，其中文本则是优先的（pre-eminent）。吉登斯这个事例说明，当前对语言进行的探讨有一个困难：由于这些讨论都集中于言说 / 书写的二元对立，因而就忽视了电子语言独特的重要性。

为各自立场进行辩护的论点是否有力，这并非问题所在：诚然，像德里达这样的书写学家（*écriteuristes*）已经为文本意义的非同一性进行了辩护；而像吉登斯和哈贝马斯这样的言谈学家（*talkists*）（如果能允许我使用这一生硬的术语）则使我们意识到日常生活中的言说复杂性。我感到，这两派人在选择语言经验的关键层面时，都严重偏离目标。标志着 20 世纪发达社会的特点的，恰好就是电子介入的新型语言经验的出现，它们不会很容易地便与言说或书写的特征相吻合。如果联系到电子语言的出现，将言说 / 书写这一辩论语境化，那么人们对此辩论就能有很深的理解。
79 作为社会理论及文学理论优先关注的对象，语言能够出现，自有其社会语言学条件。谈到这一话题，在此似有必要把话扯开一点。

我将站在言谈学家一边，把讨论只限制在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上。法国 1968 年的“五月风暴”大肆鼓吹以“言语（*la parole*）”代替“语言（*le langue*）”，以言说（speech）代替“语言（language）”（从结构主义关于内在二元对立网这层意义上理解）。在过去的十年里（译按，本书英文版出版于 1990 年），法国知识分子已经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转向以语言为中心的理

论，从针对自由主体问题的理论转向揭示结构内部复杂性的理论。1968 年 5 月的那些日子里，巴黎满街活跃着夸夸其谈的人，那些感到被结构主义思潮取代的知识分子（如，亨利·列菲弗尔，埃德加·莫林〔Edgar Morin〕）如今指着众声喧哗的场面，以此作为证据，证明革命仍然可能，证明主体依然可能是历史的行为者，证明一个由共同在场的自我监视的言谈者组成的自由群体的语境会消解无意识结构的制约。[17] 面对“五月风暴”那种无可辩驳的喧嚣场面，结构主义人类学领袖列维-斯特劳斯伤心地宣布结构主义已经结束。对“五月风暴”后的平静日子所做出的最初反应中，值得注意的是大众群体的短暂出现被左派误认为是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定义不够充分的证据。当我回顾那些事件时，我却看到，对发达社会中的对抗进行历史中立化时，出现了暂时的断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种断裂都无法证明结构主义的任何不足，这种断裂反而指向了当今社会具有的这种能力，即能够先发制人地阻止街头的群众集会或任何半官方机构的集体言语行为。换言之，1968 年的“五月风暴”以其特殊的性质表明了信息方式的力量，表明了电子媒介语言的力量，这种力量抑制了社会变革语境中，亦即哈贝马斯所谓的“公众领域（the public sphere）”中的集体交谈。

吉登斯和哈贝马斯的传统都强调言谈是自由行动的立足点。吉登斯表明，当言谈在特定的社会交际语境下发生时，它是如何必然包括一个向外和向内的批评契机。哈贝马斯则表明，“交往行动”必然包括有效性要求，这些要求则要求社会个体像启蒙时

期一样，自律而共同地判断正义、理解真理并感觉热情。在这两种情形中，口语都包含着种种条件，使得由自由的理性个体所创造并组成的已解放社会成为可能。虽说吉登斯及哈贝马斯的观点
80 无疑是语言与社会的关系的发展过程的一环，它也使新兴的语言状态，总的说来也是普遍的状态，不再受到直接关注。发达社会的典型特征并不一定是正义、真理和热情的对立面，而是在一个不同的语域中运作的语言情境，这种语域与共同在场的、语境性的、自我监视式的言谈或理想化的言语情境的语域并不相同。今天的理论／政治问题并不是要将自由言说的条件概念化，而是要解释清楚，实际语言情境以何种方式包含着支配性的结构和解放性变革的潜能。自由言说的历史—本体论的可能性，决不会使电子语言现实性的价值化为乌有。因此，“五月风暴”对“言语（la parole）”的鼓吹，连同吉登斯和哈贝马斯对此进行的详细的理论阐述，发出的信号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智慧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一样：当语言实践受到以往的对立面的争夺时，其契机已过。因为许许多多原因，工厂及其众多的贫苦工人已不能再为革命性言谈带来什么机会。如果竞争性语言要在今天出现的话，它也肯定出现在电视广告和数据库的语境中，出现在电脑和通信卫星的语境中，而不会出现在共同在场的言谈或为了共识进行辩论这样的文化中。

另一方，即书写学家（*écriteuristes*），其论辩也很有力，而且对形势的认识也错了。随着 1968 年“五月风暴”以后岁月的消逝，无论是结构主义的立场，还是前结构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马克思

主义立场都不可能生机再现了。取而代之的是种种立场的一种奇怪 *mélange*（混杂），它以后结构主义而为人所知，成为主导立场出现了，这种 *mélange* 起码在美国越来越流行。为了本文的讨论，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后结构主义观点的这一方面：它对书面文本的集中探讨。要想获得某种正确的观察方式，就有必要先建立语境。在发达社会中，只有两种社会群体会把文本看作在人类经验中具有超验权力，他们的日常实践鼓励他们这样做：正统的犹太教士（rabbis 译按，又译拉比）以及人文学科和某些社会科学中的学术人（academicians）。这些群体如果想避免自我普遍化这种缺乏远见的危险，就应该谨防把他们自己的实践看成是所有人的样板。从个人熟悉的狭隘背景观察世界这种太人性的（all-too-human）倾向是一种一再出现的诱惑，它当然不只局限于读书人。

或许更为严重的是，后结构主义者对文本中心地位的辩护自然不仅停留在字面上。作为非同一性或延异（*différance*）的书写模式，而非书籍的物理或象征性质，才是解构学家、话语分析学家和语义—精神分裂—心理分析学家（semio-schizo-psychoanalysts）的关注焦点。后结构主义者想超越各种形式的还原论的、总体化 81
的文本阐释。对他们而言，文本不是意义的同质（homogeneous）线性载体，不是作者意图的表述或阶级立场的反映。文本使作者与读者拉开距离，插入了至关重要的空间，这就允许阐释行为将作者居高临下的权威置于一边，容许读者把文本只当作纸上的印刷字符来阅读。白纸黑字的符号流通允许人们发现意义群集中的缺口，而对这些符号的策略安排，又使得这一发现指向尼采所言

的权力意志，或肯定与否定这些不被承认的等级系统。于是，因为对其价值观的图表进行了编码，作者所说的就超过了他们想说的；又因为其论点的流动中留有缝隙和缺口，作者所说的便少于他们想说的。对后结构主义者而言，文本的意义源于阅读行为，同样也源于书写行为；果若如此，读者的多样性就会引导我们得到这一结论：文本具有多重的、甚至是无穷的意义。最后，后结构主义者还主张，不仅仅是文本和语言，而且一般的经验都必须按照这种阐释方式来理解。

于是，后结构主义者的论点便是：充满世界的行为与事物，没有一项只有一种意义、一种可能的阐释。在这种情形下，语言并不代表某种超语言的现实，因为书写的非同一性是所有语言固有的。没有一套言说世界的言辞能包含世界的真，而使问题更为复杂的却是，世界自身所包含的，除了别的东西以外，就有文本。西方哲学传统对终结真理的中心追寻（德里达认为这一传统始自柏拉图，但肯定是始于笛卡尔），对这种确凿的、无条件地植根于时空之外的真理的追寻，对这种“明澈而独特”的真理的追寻——这一目标，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故弄玄虚，某种权力意志的标志；这种目标与欧洲对世界其他地区的支配同时共存，并包含在这种支配之中。

面对着后结构主义对基本假定所进行的令人晕眩的颠覆，我又一次想到黑格尔的猫头鹰的奇特运行。后结构主义者的介入是在印刷的伟大时代之后，是在再现论思潮的古典时期之后，甚至是在自然科学中自我肯定时代之后才出现的。当然，这是介于维

也纳会议和凡尔赛条约之间的一个世纪，这期间，西方的广大精英分子坚持伟大的理性、科学和进步的元叙事。透明的现实、单一的意义、完美的再现、自我与世界分离的稳固感——这些都是 82
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标记。印刷商式的文本性作为一种语言形式，其支配地位，在那个时代，正是伴随着后结构主义者所予以否定的立场而出现的。后结构主义奇怪的地方是，在印刷正被电子语言所取代或起码被它所补充的时代，它还维护一种植根于书写的阐释形式，并且以非线性、非同一性的术语对阐释进行定性，而促成这些术语的是电子语言而非印刷媒介。现实到底何在、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方面的混乱很可能附带产生，但不是发生在资产阶级阅读公众身上，而是发生在群众观众身上，他们受到大比特的数据的无声积累与处理的暗中监视。

于是，与后结构主义观点的长处相对应的，并不是书写压倒言说的力量，而是电子媒介语言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后结构主义理论的价值在于，它非常适合于分析被电子媒介的独特语言特质所浸透的文化。我们暂且把这个讨论记在心里，先回到分析数据库的交流形式这个任务上来。第一步将要澄清几组术语：（1）言谈，言语行为，口头文化；（2）印刷，书写；以及（3）电子媒介。下一步便要联系数据库阐明福柯的话语理论。

口头的、书面的和电子的

对许多分析者而言，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和电子语言之间的

关系似乎有一种线性的历史轨迹可寻：言语，接着是书写和印刷，再接着是电子编码，先对声音后对嗓音接着对图像进行编码。除了这种历时分析外，对其作共时分析显示，语言的三种形式在时空坐标上也有一种线性关系。在任何特定时刻，从言语到书写至电子的变化都增加了语言行为所能覆盖的空间，并减少了它传播所需的时间。语言使用的历史似乎与进步论者对人类发展的观点完全不谋而合。语言形式（1）是相继出现的，并且（2）每一种都使得交流行为更加“有效率”。后结构主义者宣称必须要有一种基于语言的理论，而对人类事务中的语言所进行的分析似乎反驳了这一论断。传播史似乎有助于被后结构主义革出教门的这种分析类型。从这一观
83 点看，传播史可以表现为总体化的、连绵不断的、进步的演化。这个历史也佐证了启蒙主义的这种观点：人是机器中的理性幽灵，为了自己的目的逐渐控制环境和顺从环境。人类语言的历史是思想与行动的历史，在这个历史中，人类犹如奥德修斯一样，臆想出一条道路，然后披荆斩棘地沿着这条道路，走向“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这种天堂般的（Elysian）交流乐土。

许多被电子媒介的重大成就所慑服的作者，其思想精髓肯定就是如此了。有一位自由思想者写到这些媒介时，说它们是“自由的技术”，并以此作为他的书名。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人类的命运处于存亡攸关的时刻：“现代传播手段容易掌握、成本低廉并传播知识，这是我们抱有希望的首要理由。”[18] 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充斥着类似的论调。有人提出这些主张，“电脑与（电子）传播手段的结合……打开了个人审查和批评官僚政治的途径，从而消除了

中央集权”。[19] 这两种立场对信息方式进行理论化时，所使用的历史领域的概念和假设都是相同的，它们以前就已被用来分析政治、法律、宗教及经济的转型。而我的论点则刚好相反，新的交流方式的出现要求对它们的分析应该是基于语言的理论；早期的社会-历史理论的表征主义的假设已经不再适用新的语境。

当交流手段被理解为对言说与书写的选择时，交际的所有参与者的在场或缺席往往是其鉴别特征。言说是信息传输者和接收者都在场的交流；而书写则是只有一方在场的交流。言说与小规模群体相联系，如部落、村庄，以及高密度的城区街坊。书写以及后来的印刷，它们的出现可以典型地看作是认知技能得以发展的条件。我想论证的是，书面文本促进批判性思考，这是因为人们对其信息的接受并不是在作者劝导性的亲自出场下进行的，因为书页的顺序和文字的线性排列大致对应于因果逻辑，因为书写能够使人对信息的接受不受外界干扰，从而能促进冷静的思考而非冲动的热情，因为书面文字是物质的、稳定的，这就使得信息的重复接受成为可能，因而也就提供了一再反思的机会，还因为书写从根本上瓦解了传统的权威性和等级制的合法性。此观点的 84
逻辑结论是，书写与印刷是西方经验的一个基本部分，这种经验包含着理性、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包含着科学、民主和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些制度。[20]

将书写与智力联系起来已经受到批判。书写主义（*écriturisme*）因为其种族中心主义，而特别引起人类学家的关注。没有书面文字的文化，就显得缺乏作为人类的本质特征。人类学家杰

克·古迪感到很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同样复杂，从某些方面看，口头语言甚至还要复杂些。他坚持认为，书写使得口语中很少出现的某些语言形式成为可能，如列表、公式、菜单等，它们是语言极其简单化和缩约化的形式。古迪写道：

> 图示书写模式（the graphic mode）的特征之一便是倾向于把术语整理成（线性的）排和（等级化的）列，这样，每一项都被分配一个唯一位置，与其他事物具有一种确定的、永久的、毫不含糊的关系……（表格或清单）把口语的复杂性缩约为图示书写的简洁性，使“两两一对”这种关系的不同形式聚合成囊括一切的统一整体。[21]

在这种阐释中，书写比言说更无助于理性、自由与平等。

对于那些对言说和书写都拥护的人来说，语言似乎只不过是又一种制度，又一种行动形式而已。一条现实主义的假设便道出整个讨论的性质：语言，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只不过是另一种工具而已。它的效果一样可以精确地测定，就像其他制度或行为的其他常规形式的效果一样。无论人们对其性质进行怎样的构型，语言还是世界中的一种物质事物。因此，书面清单像君主制度一样是等级制的，或者，从另一观点看，面对面的言说像民主一样引发批判性思考。在这些讨论中，语言并不存在什么能使它区别于其他社会现象的特征；并不存在什么原因，能促使历史学家或传播学专家或社会科学家从根本上改变其理论或方法论。

如果对语言形式的分析基于传输者和接收者的在场/缺席这一鉴别特征，那么引入电子媒介语言的重要性必然会被降至最低。后者至多不过是书写范式的延伸。传输者和接收者的分离因书写而引入历史，新的媒介——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录音机、电脑、通信卫星等——只不过是延伸了这一分离，无论其程度多 85
大。然而，从我的观点看，电子媒介对言说与书写的区别提出质疑，同时也对与此对应的传播史提出质疑。例如，也许有人会问，电话是把传输者与接收者分离了，还是把它们联系到一起了？父母身居纽约，孩子身处伦敦，当孩子播放有关父母的录像带时，是否增强了信息传输者与接收者的在场还是缺席？虽说从言说转变成书写时，传输者与接收者之间的时空距离确实增加了，但距离的标准也随着信息方式的来临而失去了它的组构权力。电子语言的种种情境颠覆了使语言分析中的距离范畴增势的框架；它们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观点的貌似真实（verisimilitude）和分析力，由此，关于在场与缺席的陈述便能够进入科学的话语。

信息方式开始了对以前的所有语言形式的再思考。就如同在马克思看来，猿的解剖只有在人类的进化演变之后才可理解一样，语言的回溯性重构要从信息方式这个制高点进行。时空坐标一直被用来将语言固定在不同的语境中，而信息方式瓦解了这些坐标的基础。因此，信息方式所展现的对语言与社会的理解，在文艺复兴视野的坐标格中或启蒙主义理性的模仿现实主义中，是绝无参照的。主体不再站在客体的对立面，人也不再是自然的对立面，本质也不再是存在的对立面。无论是处于在场的空间语境中的说

出的话所反映的“真实时间”，还是官僚的文件柜和图书馆档案室里的文件所反映出来的抽象时间，都不可能在时空中找到词语的位置。言说被戏剧化行动的时／空坐标加上了框架，书写则被书籍与一张张纸的时／空坐标加上了框架。这两者对表征的逻辑而言都是可资利用的。而与此相反的是，电子语言则不适宜加上框架。它既无处不在又处处不在，既永远存在又从未存在。它真可谓是物质／非物质。

福柯、话语与超级全景监狱

监督（surveillance）是信息方式中一个主要的权力形式；联系到这一主题时，言说、书写和电子语言的区别就被放大并澄清
86 了。对于当今社会的概念化，对监督的分析既阐明了基于语言的理论对它的重要性，又阐明了语言的电子形式在其中所起的独特作用。

失去了将日常生活的语言固定下来的时／空坐标，社会控制便成为统治群体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抗运动可能会出现，宣扬他们的观点，转眼间就消失，只是日后又会卷土重来。文化潮流和生活方式无须中央集权机构操纵的介入，也能演变和传播。谈到信息方式下的颠覆性语言结构，可以举一个微不足道的事例，它就发生在 IBM 电脑公司内部。像许多大公司一样，IBM 公司鼓励员工为改善经营而献计献策。在过去，“建议箱”无所不在，“最佳建议”将获得数额不大的奖金和酬报，“建议箱”就是以这点区

区代价开发着雇员们为了公司利益的创造力。在很多情形中，如果员工选择了建议箱这个途径的话，那只是因为对现状进行批判是一种很敏感的行为，而它能为他／她这样做提供一种匿名性。事情可以更好，就是意味着现在的安排还不是最好。

IBM 公司过去也有类似的做法，但有着重要的不同。[22] 这家高科技公司不用建议箱，所提的改进建议可以通过电脑登记。员工们毋须离开他们的工作台，也不会被别人看到去建议箱提意见，他们产生什么巧妙想法，马上就可以传送出去。而且，这些建议会即刻传遍所有雇员。当批评意见源源不断地出现时，IBM 的管理层开始担心了。员工不再提诸如改变墙壁颜色之类的无谓提议，而是对公司政策提出了强硬愤怒的批评，这些批评指名道姓，毫不留情。管理部门本来很开明地征求改进意见，而现在却陷入了这种自找的矛盾中，很难抑制越来越高的异己声音。然而，最使管理层感到恼怒的是，他们无法确认批评者，因而也就阻挠不了电脑上颠覆性的流言蜚语。出言不逊的“交谈”无处不在，而又处处不在。

与其说历史是辩证的，看来还不如说它是含糊的，或许更确切地说，它是混淆的。若说反叛性的语言是信息方式促成的，那么全知全能的支配又何尝不是如此。与电子媒介语言的兴起相联系的是权力的种种新形式的出现，这些结构系统地绕开了自由主义者的暴政概念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剥削概念。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暴政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专制权力的行使。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剥削是一种经济行为，是对劳动力进行没有补偿性价值回报的剥 87

夺。信息方式下新兴的支配形式根本就不是语言行为，而是语言形成（formations），是对象征符号的复杂操纵。诚然，暴政与剥削伴随着多种话语出现，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则较早地试图把统治观念的美丽外衣回译成统治阶级那赤裸裸的利益。对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而言，组成社会的，一方面是“真实的”社会行为、力量和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虚幻的、上层建筑的附带现象。

信息方式的诸多层面，如数据库，都能以种种方式产生新的支配形式。为了使这些方式能被理解，分析家们必须从自由主义的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假设转过头来，走向后结构主义的福柯式变体。福柯的话语概念，尤其是他 70 年代在诸如《监督与惩罚》这些著作中所使用的那样，以如下假设进行构架，这些假设相当于信息方式中，尤其是数据库这种情形中所出现的形成类型。

在《诊所的诞生》、《监督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以及《性史（第一卷）》中，福柯发现了制度性重组与科学的学科之间的联系。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各种思想观念在历史关头都占有过一席之地，但在如今出现的现代社会实践中，它们却在相当程度上，被称作科学的这些文本机体所组织并定型。福柯赋予培根的座右铭“知识就是力量（译按，或译‘权力’）”以一种新的、颠倒了的危险意义：

> 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基本上也是在任何社会中，有许多种权力关系渗透到社会机体中，确定其性质，并构成这一社会机体；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

> 挥，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的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㉓

话语真理是社会场中权力运作的关键。应该注意到，在上面所引文字以及他的著作的其他地方，福柯从未充分阐明话语与现代社会的具体关系。

马克斯·韦伯也强调了书面知识与制度之间的关系，至少是与现代科层组织的制度之间的关系。像福柯一样，韦伯注意到了理性与支配之间的关系：科层组织构成了工具理性，以实现其权 88
力。但是，韦伯的术语 Zweckrationalität（工具行动）与福柯的术语 discourse（话语）之间有着重要的不同。韦伯的术语适用于行动以及与这一行动相连的意识的诸种形式。福柯的术语适用于具体书面文本中的语言，这些文本是按照某个社会科学的学科规则收集并形成的。韦伯的文本没有任何语言分析；而福柯的文本则把语言当作一个可能命题而集中探讨。事实上，在社会科学与科层组织之间，韦伯没有看出任何联系。在他看来，社会科学并不是一个历史问题。相反，它是一种特权位置，原则上与科层制统治的兴起和传播是分离的。最后，韦伯力求“客观性”：

> 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在工作中坚持得最为坚决的，那就是，一种社科刊物，在我们看来，若说是科学的，则应是一个追求

> 真理之所，它……应该能够声称具有一种有效性，甚至对一个中国人来说，这种有效性都能适合于分析经验现实。[24]（后一组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韦伯坚持对科学知识与社会“现实”进行康德式的区分，虽说从某些认识论的目的来看，这也许情有可原，但是却模糊了工具理性的科层组织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再者，这使他的立场偏离了把语言构型作为科学话语而进行的分析。

与此相反，福柯的观点是，只有把话语作为一种语言形成来理解时，才可能辨明科学话语对实践的影响。如果假定话语是某个主体的作用，或者是某个非话语性的社会区域的效果——如经济，那么话语的运作和有效性就会丧失。在这两者中，分析的适用域便转换成前者中的意识活动或者后者中的结构实践。虽说这些都是可能的阐释策略，但是选择这些策略的代价是，当语言以书面话语形式出现时，它们便系统地阻碍了对这种语言效果的不同种类所进行的分析，语言的书面形式总是受到一个科学学科的制度性框架的制约。福柯的观点旨在集中探讨如此组构的语言的内部复杂性，以及这种语言的外部的或实践的效果。他的注意力
89 集中在这些方面：这种话语中可能证实的陈述是什么，这些陈述的形成需要什么规则，以及要有怎样的体制才能使得这类陈述能在学科共同体（disciplinary community）内生效。话语分析并不适于揭示作者意图或经济对话语的终结决定性。福柯式分析的价值在于这一信念：对科学话语的仔细研读可能揭示出种种语言模

式，当这些语言模式与实践联系起来时，它们便会以特定方式将这些实践定位，并且使这些实践内固有的支配模式合法化。

至此，我有必要联系福柯关于监狱的作品，阐述他著作中话语分析的运作方式。下文的要点中，应记住的并不是这种分析在较早的时期具有多少有效性，而是：（1）科学的学科已被日渐被置于社会场中，因此话语分析对批判理论来说是很重要的；（2）当文本被理解为一种语言形成时，话语分析便使得文本比主体、意识、理性和观念受到优先阐释；以及（3）随着语言形成方式从印刷文本转变为电子编码，话语分析就有修正的必要，这必须特别引为注意。

《监督与惩罚》对监狱史所采取的阐释策略，与另外两种策略相反：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是，监狱是对早期惩罚形式的一种改进；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监狱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形成。这两种观点福柯都摈弃了，但他也对此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乃偏颇之论：生产方式这种分析法允许历史学家阐明监狱史的某些特征，但没能阐明福柯认为最值得探讨的特征。[25]与此相反，自由主义者的观点达不到任何分析的目的；毋宁说，它是分析的对象，因为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对罪犯进行人道处置和改造这些原则是现代监狱体制的基础。

启蒙主义改良者的小册子是福柯必须分析的话语的第一个层面，这些小册子从贝卡里亚（Beccaria,1738—1794，译按，意大利人，因提倡刑法改革和经济分析而著名）对旧政体（Old Regime）残酷的惩罚体制的抗议，到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

译按，指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法学家）为使犯法的人制度化地转化为有用的人而提出的详细建议。所论述的话语的第二层是行政机器层面上的：监狱运行所需的日常文书工作，以及有关控制犯人日益聚集这一问题的专论。所研究的话语的第三层是刑事学
90 层面上的：监狱管理中系统知识的运用。这些层面的每一层都要求在处理上多少有些不同，但是在每一情形中，福柯的兴趣全都是与话语如何将实践组织到支配结构中有关（用他的术语便是“权力技术”），他并不关注现代监狱发展过程中一个作者的想法在多大程度上被实现了或者没有实现。他也不关注社会群体是以何种方式对监狱问题大做文章，从而决定了监狱的命运。在观念或行动中是找不到福柯的监狱“起源”的。监狱的起源是对“权力技术”的复杂表述，这种表述（1）与话语的早期形成有关，（2）通过断断续续的话语链才得以实现。监狱“结构”的位置的设定，与上文提及的三种话语语域的交互作用有关。

监狱通过生产一些规范（norms）而运作，这些规范把所有人口分为囚犯和非囚犯。既然监狱的目的是要把囚犯还原到非囚犯状态，那么就必须有一个标准，一个审慎的综合的详细标准，以此确认非囚犯、囚犯，以及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的发展阶段。要实现这种转变，还必须有一种详细安排的生活方式。最后，还必须要有一套方法或体系，能够对每一个囚犯的转变进行跟踪记录。福柯借用边沁的术语 Panopticon（一个能看到一切的人），以此指代整个机器，这个机器能界定规范、约束消极因素、观察从消极向积极的转变，并研究整个过程，以便使机器能够完

善。但是也存在着不同。对边沁而言，全景监狱（Panopticon）是这样的一种设计，它使罪犯的心智从犯法这种不理性转向规范这种理性。它以一种固定不变的总体的方式将社会权威施加在囚犯身上。囚犯的行动可能时刻受到狱卒的监视，而他根本就不知道。用卢梭的话说就是，囚犯将会被迫自由。因为不可能逃避或缓期接受全景之目的监督（Panoptical eye），囚犯只好接受规范的权威，接受这种规范的合乎理性的欢娱与痛苦系统。对福柯而言，他的任务是把该系统看作一种支配结构，而非一种理性的人道主义意图的强行实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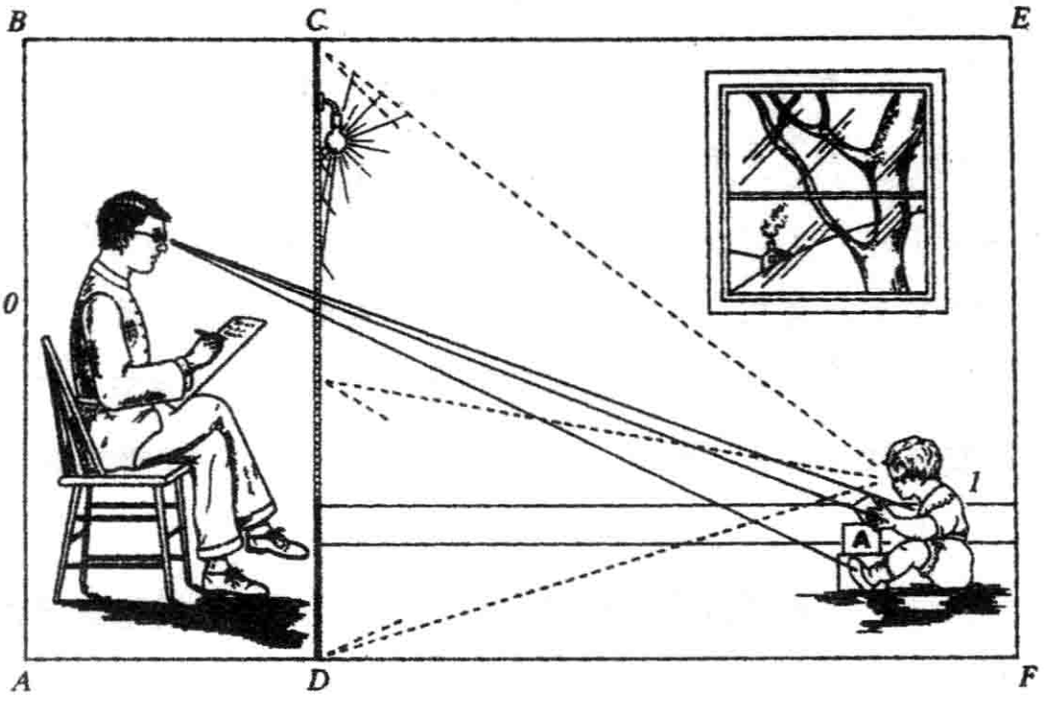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若以自由主义的和边沁的理论标准来评价的话，全景监狱是失败的。福柯的目的是要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之外把握全景监狱的作用：如果它没有改造囚犯，它做了什么？监狱的社会文本及全景监狱话语的效果又是什么？他的论点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语境下，监狱将权力技术，将规范的“微观经济学”91
强加于这个世界；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对市场的无政府状态、自由单元无止境的欲望追寻的混乱状态，以及无约束主体的理性都抱赞赏态度。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调控采取了话语／实践这一形式，它们对规范进行生产和再生产。学校、精神病院、工厂、军营等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模仿全景监狱，尽管可能有很大变异（参看示意图）。在早期时代，权力是由贵族阶层的亲自在场和淫威暴力强制行使的；而在现代社会则不一样，权力是通过话语中的系统梳理、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不断监视、通过对个性的规范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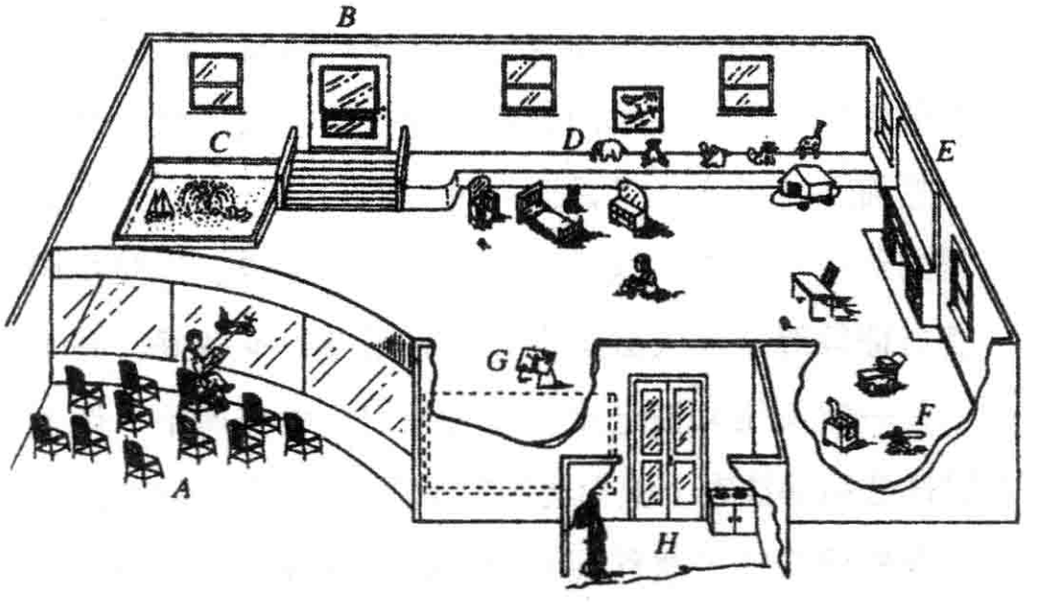
行 *ad infinitum*（无穷）调适和再调适而实施的。现代社会可以被读解为一种话语，名义上的行动自由被他者无处不在的眼光所剥夺。也可从符号学角度把它阐释为一个符号场，其中全景监狱的元话语被再次施加到所有地方，甚至施加到没有设置全景监狱的场所。我们也许可以说，哪怕只是为了保证自己的自由，自由个体也会要求有一个受压抑的他者，一种外部超我，一个不在场的父亲。

在 19 世纪，全景监狱受到技术上的局限。它既要求在安排好的封闭受控空间中被监视者的亲自在场，也要求监视者的在场。狱卒在中心塔楼里，可以看到所有囚犯的牢房，这些牢房分布塔楼周围，窗子全都朝向塔楼。窗子的位置使得囚犯不能确定狱卒是否在监视他。对主体的这种单向全盘监督，因档案记录而延伸。没有对主体行为的系统记录，监督便是不完全的。为了使全景监狱机器发挥作用，个体必须变成一个个案，记载细密的个人档案反映着他偏离规范的历史。当时出现的刑事学，为监狱管理部门提供了档案记录和档案评估的动力与知识。

20 世纪后期，监督的技术条件大大进步了，但福柯却没能注意到它们。大体上，全民都已被标上数字，规范所规定的戒律已变成第二本性。19 世纪城市中的粗鲁、肮脏、目不识丁、不守规矩的盲流，这些“危险阶层”，已经部分地被聪明、有教养、关心
93 时尚、举止优雅的人群取代。福柯感到，在 20 世纪后期，监督已是一种新事物：

92





耶鲁大学心理诊所幼儿辅导所中的隔离观察装置。在上图中观察者（*O*）坐在 *ABCD* 所示的凹室里，在下图中则坐在 *A* 的位置上。幼儿（*I*）坐在 ABEF 所示的地板上。一堵 16 网的屏风墙把观察者（*O*）与幼儿（*I*）隔开。这个屏风起着视线滤网的作用，只能单向观看。（选自阿诺德·格塞尔（Arnold Gesell）《幼儿与人的成长》，纽约：麦克米兰，1928 年版，第 32—33 页）

> 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的社会，而是一个监督的社会；在图像的表面下，深深地掩盖着身体；在交换的大抽象背后，继续进行着有生力量细致具体的操练；传播环路是知识积累和集中的支柱；符号游戏界定了权力的停泊地；不应说个体的那种美妙的总体性被我们的社会秩序所肢解、压抑和改变，而应说在这一社会秩序中，根据种种力量和身体的一整套工艺，个体被仔细地制造了出来。[26]

福柯注意到了这种新技术，但他仅仅把它阐释为19世纪诸多模式的延伸。

今天的“传播环路”以及它们产生的数据库，构成了一座超级全景监狱（Superpanopticon），一套没有围墙、窗子、塔楼和狱卒的监督系统。监督技术的数量增加导致了权力微观物理学中的质变。然而，技术变化只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人民大众已经受到监督的约束，并参与这一过程。社会保障卡、驾驶执照、信用卡、借书证等等，个人必须申办、必须随时准备好，并不断使用它们。每一次使用都被记录、编码并加进数据库中。许多情况中，人们自己动手填表；他们便同时既是信息源又是信息记录器。电脑的家庭联网构成了这种现象的一体化的顶点：调制解调器与生产者的数据库相连，消费者通过这个调制解调器订购产品，便在购买行为中将自己的数据直接键入了生产者的数据库。马克思分析了工业革命时资本对劳动的重组，大批群众早期亲躬农田和作坊，接着在工厂和后来的现代化流水线上重新找到位置。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在日常生活的重组过程

中，个体被构建为消费者，并且他们作为消费者而参与了对自己的纪律约束和监督。这样，消费主义者的活动便从少数贵族精英传到资产阶级，并进而在 1920 年以后遍及平民大众。[27] 这种蔓延并不是走向消费社会的经济变化，也不是走向一个流动能指世界的符号学变化，而是一种政治变化，是全民自我相互控制的一部分。

除了发达的技术（本章开始已对此加以讨论）以及受纪律约束的自我监督的人群外，超级全景监狱还生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情 94
境，其特征非常独特且令人困厄。电子化的信息收集构成了数据库，尽管这种收集方式快速、准确且运算能力强，但仍然招致数据的巨大损失，或更确切地说，它强行进行一种强阅读（strong reading）。以数据库进行的当代监督所依赖的信息编码方式是数字化的，而不是模拟化的。数字化编码对信息强行实施二进制还原。二进制是由 0 和 1 极其复杂地组合起来的语言，但它毕竟还是源于那种简单的格栅。数字化编码根本就没打算再现或模拟，而这正是它与模拟编码的区别。模拟码是物质的直接模拟。地图便是模拟编码的极好例证，磁带录音也是如此。在磁带录音中，电磁处理使金属膜的细屑按顺序排列，模仿音乐所产生的声波。因此，一个高音产生的金属膜结构便与那个频率的短波周一致。振幅中的磁差被编成氧化物颗粒“堆”的相对不同的深度。音长被编为磁带上图形模式的重复；重复越多，音越长。如果用数字码或脉冲码调制的录音机代替模拟码的录音机，那么金属膜就会按 0 和 1 的代码排列。如果你查看一下数字带的膜结构，就会发现那上面的图形模式与声波没有直接联系。

正如字母 k 与联系着它的英语声音之间的关系只是任意的或约定俗成的，数字编码与它的材料对象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然而，书面语言依赖着植根于文化背景中的内涵意义。因此，书写对文化材料的“编码”能力是无限的，正如模拟编码对其材料对象的模仿可以无穷分级。一词多义可使书写的编码能力得以无穷延伸。数字编码则不存在这种能力。事实上，数字编码的奇特力量缘于它限制意义以及消除歧义或“噪音”的程度。若说书写以其内部结构，以某些方式还原了经验，又以某些方式塑造经验，那么数字编码同样也因其格栅的限制，强行改变了它的材料对象。通过数字化编码了的信息而进行的监督，会因为使用数据库所使用的语言而构成了新的主体。

95 数据库将会提供“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这种希望的基础是对语言的实在论假定。从这个观点看，数据库是一种工具，一个技术窍门，它完美地复制了印刷信息。这种看法忽略了语言在塑造意义和实践中的生产作用。对于这个随印刷术的出现而产生的错误观点，本文特此重复：语言复制的这种新技术只会消除旧方法的差错和缺陷，它提供了知识或数据复制的透明度，而不会使意义有任何损失、文本有任何讹误。但是，谷登堡的这一发明与手抄相比既有得又有失。随着印刷机的采用，错误和故意的讹误不但没有消除掉，可能反而成倍增加。[28] 文本复制的控制本来只是针对几个抄经室，如今却要面对数目多得多的商业性出版社。在抄经室里干活的人分成小组，能够监督，在劳动中，要么是对上帝的信念（修道院），要么是对真理的献身精神（大学）

激励着他们；而在商业性出版社中，赢利动机和异见倾向很容易干扰复制过程。与此类似的是，文本复制手段从印刷转向电子化也极大地增加了不完全复制的可能性。

实在论的假设以其唯物论而自豪，却也因忽视了媒介的物质层面而难圆其说。从手稿到印刷文本的这一变化导致生产者和产品之间感官环节的丧失。印刷机消除或缩约了产品中的手艺痕迹。手稿的首字装帧让位于蚀刻甚至是插图。人工手绘线条的低效率被印刷机毫无人情味的重复敲击所取代。[29] 书籍本应是与某个特定的工人群体相关的一种产品，如今这层意义丧失了。好几种因素促进了电子化复制这一过程。例如，当《圣经》被电子编码后，它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被复制成软盘中的文件肉身或阴极射线管上的像素肉身；那些曾经使一页页上等纸为之增辉的字母符号，如今虽然顺序依旧，却在新媒介的化身中失去了一层意义。于是，济慈的《希腊古瓮咏》这首诗，录在英国浪漫诗歌数据库中，便与原始手稿、第一版，甚至大学的导论课课本中的这首诗，不太会是同一实在。

我坚持认为，数据库在现有语言之上强加了一种新语言，一种贫穷的有限的语言，这种语言利用规范来构建个体，并界定不随众的人。数据库在严格界定的范畴或领域内排列信息。在电脑 96
监视器上浏览或打印在纸上时，每个领域便是一列，每个文件便是一行。每个领域都包含数量有限的空间，如果这个领域是关于日期和数字的，那么收入数据库的条目形式就更加有限了。数据库的速度和效率直接随着其中信息形式的固定性的变化而变化。

一个数据库可能以下列种种域组成：一个人的姓和名，社会保障号码，街道地址，市，州，邮政编码，电话号码，年龄，性别，种族，未付的违规停车费，租看成人录像次数，订阅共产主义刊物次数。为这一数据库收集信息的机构根据这些参数构建个人。

许多数据库的域，就它们所指的现象而言，只能是大概充分。只要人名域还有足够空间拼全人名的所有字母，就决不会缩写。数据库中另一个极端的域是“订阅共产主义刊物次数”。在此，这个范畴本身便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数据进入这个域的方式便很好地揭示了数据库的话语功能。刊物的名称可能也会收入这个域，但这样做就比键入不同刊物的数量或级别值（values）的效率来得低。可能有某种综合值（summary values），例如，从 1 到 4，4 表示最具颠覆性，1 表示最少颠覆性。在这点上，一切都依赖具体刊物得到的特定值。《琼斯妈妈》可能被标为 2，《纽约书评》可能标为 1。不管怎么说，刊物与级别值的关系虽然是任意的，数据库中这个域里的数字却毫不含糊。在刊物没有被预先编好代码的情形中，录入该域中的值就更为任意了，因为这个值的变化将因进行数据录入任务的人而定。

这一事例表明，数据库的结构或语法创造了不同信息之间的诸种关系，这些关系在数据库之外的原有关系中并不存在。从这意义上讲，数据库通过操纵不同信息单位之间的关系构建着个体。使数据库具有效力的，不仅是它们的非歧义的语法结构，而且还有他们的电子化编码方式和电脑化贮存方式。对电子形式的数据进行分类、搜寻，其速度之快令人惊叹，可达每秒数百万次，可

谓是光速了。在上文的例子中，美国的整个人口可以在几秒钟内分类，搜寻出《纽约书评》的订户，并将这一信息传遍世界各地。如果个人的指纹和照片图像作为域加进数据库，如现在的警察局 97
的电脑那样，那么数据库认人的能力就更不用说了。

福柯在《监督与惩罚》一书中争论说，在全景监狱中完善起来的监督方法，是现代工业社会得以诞生的重要因素：

> 如果说西方的经济起飞始于那些使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的技术，那么也许还可以说，随着人口增加，其管理方法使得相对于传统权力形式的政治起飞成为可能，这些传统的权力形式是仪式化的，昂贵而且残暴，它们很快便废弃不用，被特意设计的精巧的统治技术所取代。[30]

从封建政体到代议制民主政体这种权力的变化是从折磨到监督的转变：

> （监督）取代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通过那些行使该权力的人的才华而得到展示，并伺机将它所实施的对象客体化；（监督）形成了一套有关行使该权力的人的知识，而不是部署具有炫耀色彩的统治权意符。一言以蔽之，监督是种种细枝末节的技术发明的总成，这些发明减少了权力的种种不便，从而使得大规模使用的范围才有可能增加；而为了发挥这些发明的用途，权力必须对它们加以控制。[31]

全景监狱的话语 / 实践是生物权力（biopower）新形式的条件，是为了生产过程的发展而对人民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

同样，数据库的话语，即超级全景监狱，是在后现代、后工业化的信息方式下对大众进行控制的手段。福柯没有破译主体或工具行动的意图，而是破译话语 / 实践的形成，他以此教会我们如何解读一种新的权力形式。当这种话语分析运用于信息方式时，便带来了这一令人不快的发现：全民都参与了这一自我构建过程，把自己构建成超级全景监狱规范化监视的主体。我们认为数据库不是对隐私的侵犯或对中心个体的威胁，而是对个体的增值，一个额外自我的构建。这一额外自我可能在“真”自我根本不知发
98 生何事时，就对“真”自我造成伤害。数据库的图型构成成分便存在于这种自我构建中。以信用卡进行交易已很广泛，无人怨尤，今天在超市使用，也许明天便进入教室和家庭；这些交易以越来越快的速度给数据库提供馈给，给无处不在的电脑提供监督与控制的语言。即便采取对抗性策略，恐怕也不该是“所有时代所有地方的所有信息”这个格言，而最好是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的结论：“让公众自由进入记忆库和资料库。”[32]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电脑的主体

无论谁与怪物搏斗，都应保证在此过程中不要变成怪物。当你长时间窥视深渊时，深渊也就窥视着你。

——尼采，《善与恶的彼岸》

解构是否随时可用电脑进行？

我在本章中提出的问题是，从电脑角度看德里达书写概念的地位：电脑书写的出现所预示的这一交流阶段，是否是德里达的文本解构法未能预见且无法解释的？就其本身而言，解构是否在前电子时代就颠覆书写、使之失去稳定性并复杂化，从而开辟了电脑书写的理论分析之路？因为技术是书写多种形式之所以可能产生的条件，所以我想提出的论题确实与技术有一定的关联；尽

管如此，本章的这个问题并不打算对手写 / 印刷与电子书写这两种书写技术发难。在从印刷到电子书写的转变过程中，主体和文本这些术语被重新构型，而我感兴趣的便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两种情形中，书写过程构建主体的方式有何差异。

更具体地说，我将分析电子书写的出现是如何发挥作用，使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所描绘的主体形象失去稳定性的。其中，笛卡尔式的主体是站在客体之外的一个位置上，获得对立的客体世界的知识；康德的主体既作为知识起源而位于世界之外，又作为这种知识的经验客体而位于世界之内；而黑格尔的主体则在世界之中转变自身，但也因此体现了世界存在的最终目的。我想论争的是，电子书写消解了主体，因此使得它再不能像在前电子书写中那样发挥中心作用。

100

格雷戈里·厄尔默（Gregory Ulmer）争论道，德里达的阐释策略阐明了电脑媒介书写对主体的影响。他坚持道，“德里达的文本……已经反映了电子媒介的内化（internalization），因此也就标明，在围绕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所进行的辩论中，到底什么才是最关键的”。[①] 然而，为了要提出信息方式这一问题，厄尔默发现德里达的观点仍嫌不足。他觉得有必要将德里达的思想向前推进一步，发展出他所谓的“应用文字学（applied grammatology）”，以便“提供一种与当今这个电子传播时代相适应的书写方式”。[②] 最终，连厄尔默也不能肯定德里达是预示了新的书写时代的到来，还是只看到了这个时代的苗头而并没有真的接受这个时代。德里

达与信息方式的关系中包含着诸多有待澄清的含糊不清之处。

德里达有好几处明确地把他作品的语境指向电子媒介交流。在《论文字学》一书中，他认为当今时代的特征是：它“悬置于两个书写时代之间”，是一个“线性书写”和“书籍”都已“穷途末路”的时代。[③] 在《立场》一书中，他声称，《论文字学》描述了“交流形式目前所发生的剧变，一切形式实践以及档案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出现的新结构，这一切都全面而系统地降低了言说、语音文字及书籍的作用”。[④] 在 1979 年《哲学的一般状态》会谈辑要中，德里达参与会谈的文字有十六页，他在五个不同场合讨论了“信息技术”[⑤]。他的主要论题是，当媒体虎视眈眈地要以“对话语的控制、操纵、颠覆或同化”来瓦解“评价的批判能力”的基础时，我们需要“保持警觉”。[⑥]《明信片》也可以被解释为一篇关于电子或“远距（tele）”书写的论文。最后，德里达 1988 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谈话，尽管带着那惯有的艰涩策略，但他还是指出，作家使用电脑会使主体失去稳定性。他在这次谈话中争论说，电脑有助于文本的可逆性并且使得增补的插入更加方便；然而，电脑扩展了书写的整合能力，从而保护了线性书写（整合能力亦即把注释，因而也就是他者声音，从主要文本中删除出 101
去的能力）。因此，德里达坚持，无论这种整合是由作者、还是另一个人，或者一个集体完成的，电脑都使他们失去稳定性，因而开创了诸多局限的一种新情境。然而，他接着又闪烁其词地说，这也可以理解为对旧情境的延伸，对线性书写旧类型的延伸。[⑦] 因此，在德里达的著作中，电脑书写是一个次要但决非微不足道

的主题；很有意味的是，他往往是在联系社会语境为其立场定位的时候，才在他的文本中插入这一主题。

我将在本章（1）分析德里达关于主体与书写关系的早期观点；（2）讨论与主体相关的数种电脑书写；以及（3）评价德里达的后期观点，尤其是把《明信片》作为分析电脑书写的一种理论策略，而分析其中的观点。本章中，我还将探讨解构是以何种方式使我们能够理解电子书写的，并且探讨电脑话语如何对解构理论的适当性提出一些问题，尤其是语境方面的问题。

他在《言说与现象》、《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边缘》以及《播撒》等著作中争论说，书写的某些特性显明了所有经验的特征，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书写的这些特性一直被忽视或压抑，而西方思想传统从某个方面看是限制性或强制性的，所以当前情境下迫切的理论任务便是探讨这些特性，以便动摇这一传统并使之失去稳定性。为了阐明他所说的书写的意思，德里达往往使用一些与书籍相关的术语，尽管他并不是指书籍的字面意思。这些术语之一便是“文本性”。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不管是用逻辑分析法还是修辞分析法，思想家分析文本都是为了译解文本的“意义”。这一传统的形而上假设把“存在”（包括书籍的存在）界定为自为一体的、封闭的、稳定的、有限的实在；一方面就文本而言，这些实在对于作者是透明的，而就社会行动而言对于行动者也是透明的；另一方面，对于这些存在或现实的读者或阐释者来说，这些实在也是透明的。

在这场意义探求中，分析领域的某些特征虽然对这一分析

领域很重要，但还没有被注意到。对现实的这个封闭层面，德里达最常用的术语是“文本性”。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对此术语进行了确切的梳理，把它描述为“普遍‘被制定的痕迹’的关系网络”。[8] 当德里达写道，“文本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存在时，他所使用的这一术语便是指“普遍经验”的特性，而非仅仅指书籍的特性。[9] 这些“被制定痕迹的关系网络”是一 102
些差异，这些差异既使我们能论证稳定而有界限的意义的存在，而同时又使我们能从根本上瓦解了意义是封闭而自足的这一论断。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争论说，一个言说者不可能既有足够能力使用一种语言，而同时又考虑到使得该语言能像任何一种语言那样发挥功能的差异结构。德里达坚持认为，文本的读者或文化的阐释者要想揭示稳定的封闭的意义，便不可能同时阐明这样的“文本”条件，即只要有了这些条件意义便有可能产生。

例如，在印刷出来的书中，文字被空间和痕迹或记号所区分。再者，与面对面言说相反，印刷书籍可能与它们的作者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得很远。文本的这些基本层面看似无所谓，但却很重要。对于那些认为世界和书籍的组成是某种终结方式能够表现的可知实在的人来说，文本的这些基本层面给他们带来一些严重难题。本着这种精神，柏拉图才会不相信书写，而极力把真理界定为一种心理体验，其中的理念实在与心理表象完全对应。换句话说，他追求的是我们所谓的“真理”。书写与这种心理体验有距离，它与言说是对立的，并时时受到这一特定距离的影响。因此，书写就承受着这一“耻辱”，即它只不过是心理现实的摹本。词语是

对精神的完全在场，精神是对现实界的完全在场，这三者是对真理的完全在场，这几个论点是西方理性文化的标记，尽管在西方传统这个轨迹上的不同时期，这些术语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同。

尽管在某个特定情境中，书写可能是“尾随”言说的，但德里达从言说转向书写，则是力图把书写看成是始终已经（always already）先于言说的；他的这种阐释方法，是从寻求“文本”中形而上的固定意义转而探求“文本”中差异的矛盾游戏。[10] 他的关键范畴——书写、延异、药（pharmakon 译按，指解毒毒药）——把逻各斯中心传统中的观念呈现为种种不能阐述这一逻辑的二元对立。德里达所使用的书写这一术语与言说并不对立，而是先于言说与书写的区别。言说始终已经被作者和真理的非同一性这种始终已经的“书写”所影响。由于将言说与书写进行二元论分析的观点没有将这一点考虑在内，因此德里达就发展了一种不同的范畴，一种非范畴，一种合乎“非决定的（undecidable）”逻辑的
103 范畴；根据这一逻辑，言说之中已经存在“书写”因素，层序化（hierarchical）术语之间的对立既不清楚亦不是最终的，而且书写与言说不断“摆动”，所以彼此都不可能相对于对方而固定下来。

德里达完会清楚，要论证这一观点便要求在差别的“逻辑”内、在文本性的种种不稳定因素中提出自己的论点，甚至在立论过程中就得如此。德里达的书写存在着看似造作或嬉闹的文字游戏，这只不过是他的一种策略，以便使他自己的书写具有其自身的文本特性，以便防止封闭性并因而防止回到他所攻击的立场。例如，假若德里达只是颠倒了言说 / 书写这个二元对立的两极，

赋予书写以高于言说的固定的优先地位，那么他对逻各斯中心论作家的批判，就刚好适于批判他自己的立场。由于这一原因，他不断寻求种种术语，寻求能够阐明起防止封闭作用的文本特性的术语。[11]

德里达力图在他自己的文本中预防意义的封闭，他坚持对文本稳定性保持警觉并进行无情地颠覆，对逻各斯中心的话语及其依附主体进行始终一贯的瓦解。解构主义的这些标记被某些人，有时还包括德里达本人，阐释为走向一种新政治的第一步，这种新政治将超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陈腐的观点。[12] 因此，这一政治问题是新事物的孕育、起源和出生。德里达把他自己的介入定位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上：解构纲领的出现是在书籍时代终结以及与这一时代相联系的政治已经耗竭之时。

请注意，这种自我定位本身并不新鲜。起码自启蒙运动以来，很可能自文艺复兴以来，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总是自以为处于一个转折时代，并感到有必要勾勒出一套新的政治。与德里达更为接近的是尼采，他自然也是以同样方式构建其作品的语境。我们马上就会看到，尼采像德里达一样，借用母亲的形象，把新政治说成是一种“诞生”。他以欢快的心情写道：那“自由精神”将会“诞生出一颗舞动的星”。[13] 尼采走着另一条路，做更加不详的预言，把他的构想想象为一种令人恐惧的威胁。

就解构与电脑书写的关系，我想提出有关语境和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将论证，德里达描述了目前情境中他的观点的铭写，而他的描述方式限制了他对理解电脑书写所做的贡献，且这一局限 104

产生了种种政治后果。我承认：

1. 解构是对逻各斯中心的文本以及（男性）主体与这些文本的关系的深层批判，这种批判使人们的注意力转向文本性的瓦解作用，这种文本性被理解为书面（written）痕迹；
2. 德里达是在这样的情境中提出上述批判的，这一情境被他正确地定义为巨大历史变化之中的一种普遍混乱，他将自己的观点铭写为阐明这一历史情境所必须迈出的一步；
3. 因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当今文化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所以对它的批判具有首要的政治重要性；
4. 一个主要难题是如何发展出一种政治，避免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的旧“现代”政治的种种总体化策略和稳定化封闭。

德里达定义他与在场（the present）之间的关系的方式，是我与解构主义之间的分歧之始。德里达处理逻各斯中心的文本细致入微，而与此相反，他界定当今情境时则往往使用省略而含混的陈述，其间的这一区别使我印象很深。他对在场的特征的归纳是泛泛的、矛盾的、犹豫不决的，对解构与新的书写形式间的关系也不甚明了。似乎他不能确定，解构到底是哲学家的“灰身灭智（gray on gray）”，描画着印刷书写这个已逝时代的轮廓，还是先觉者舞动的星，在宣告电子书写的诞生。现今的情境是一个深渊（abyss），向里面窥视只会看到怪物。

虽然德里达采取的方式非常迂回曲折，但他还是把新时代的特征明确地归纳为“怪物”，而且我认为他对解构的特征也做如此归纳。德里达设想自己处于一个待产妇的位置，而且是一个非常焦虑的待产妇。在《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中，他区分了两种阐释方式，一种是逻各斯中心的，另一种则是肯定性的“游戏”。他并未主张在这两者间做出选择，而是要求努力“构想共同点以及这种不可缩约的区别的延异”。这便是解构的立场：不要使“游戏性”阅读与逻各斯中心的阅读相对，而是要构想这两者背后的延异。带着这一想法，德里达便转向产妇隐喻：

> 这里存在一种问题，我们姑且还把它称为历史性的，目前我们还只是瞥见这一问题的产生胚胎（*conception*）、成形（*formation*）、孕育发展（*gestation*），以及生产（*labor*）的一斑。105 我承认，我使用这些字眼是暗指生育过程的，——但也影射这个社会中那些一遇到难以命名之物便避而不视的人，而我并不把自己排除出这一社会。这种迄今仍难以命名之物正在宣告它的来临，并且必然像任何一种即将诞生的事物那样，它只能被归为无种类的物种，以无形无声幼稚且令人恐惧的怪异形式宣告自己的到来。⑭

解构主义在此被呈现为一种诞生。在上文所引的那句晦涩的迂回曲折的表达中，德里达“影射”着两个方向：其一指向“问题”的“产生胚胎”等，其二指向那些对“难以命名之物”避而不视的

人。前一个方向似乎是解构的方向；后者则是一个新的社会的、一种“怪物”的方向。于是，在同一历史时刻，德里达分娩了，而社会也分娩了。德里达在分娩时没有对社会的怪异分娩避而不视。

他在《论文字学》中对怪异性也有类似的提及。“只有以一种绝对危险的形式才可能对将来进行预见。正是这一点才会与已构建的规范性彻底断裂，只能把它宣布或呈现为一种怪异。”[15] 虽说解构主义并没有被命名为怪物，但可把它当作是“宣布”了怪异未来的事物。归根结底，在这段文字中，正是解构主义之“母”德里达“宣布”未来是一个怪物。那么，一个母亲带着这样的恐惧，该如何为一个新历史时期的诞生做好准备呢？德里达的准备工作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一种双重运动：一方面，他游戏文本，对有些人来说，其游戏已经达到令人恼怒的程度；但是另一方面，他很警觉，警觉得着迷。解构主义一会儿嘲笑逗弄文本；一会儿主张要有非同一般的谨慎、细心与严肃，并身体力行。德里达建议，在文本阅读中要有警觉的细心，他使用的这些词语诸如“耐心冥思”和“苦心探究”，[16] 又如“慎重的、辩异的、缓慢的、分层的阅读”。[17] 当解构主义之母面对着这种在一个怪异时代孕育着一个怪物的“绝对危险”时，其典型特征便是太过讲究准备工作。

在上文所述的段落里，“怪物”这一术语可以被读解为一个毫无渲染的时代意象，核灾变、生态灾难、极权政治等都在威胁着这一时代，这是一个后大屠杀（post-holocaust）时代，任何噩梦都是可以想象的。抑或“怪物”可能就是解构本身，但这只是那些满足于逻各斯中心立场的人，心惊胆战地从外界（the outside）

才这样看。虽说这两种阅读方式都是可能的，甚至或许是作者“所意图的”，但这一意象的修辞的 / 行事性的语力（rhetorical / performative force）具有一种语义过剩（excess），这种过剩溢出 106
了防御姿态而涌向外界，它给读者的下马威太快了一点，使读者还来不及对解构主义做出反应。它暗示了第三种阅读，或许是一种解构式的阅读：德里达建立起一种外界与内界（the inside）的二元对立，外界由一般社会以及对解构主义抱有敌意的人组成，内界则是解构主义本身。内界防止外界对它进行侵染的策略是采取外界的立场，并站在那个立场上将解构称为“怪物”。但是，我们从解构主义便可得知，这些对立并不能像所意图的那样起作用：在防止外界对它产生侵染的文本过程中，内界渐渐具有了外界的某些特征。因此，德里达宣布未来是怪异的，而德里达正在分娩的这种阐释未来的理论策略也是怪异的。[18] 如果我的读解有什么价值的话，那就是它可能有助于阐明解构主义中条分缕析的文本分析和刚刚起步的政治姿态之间的对照。

解构主义的政治与焦虑的母亲这一隐喻相互关联，并受到这一隐喻的限制；焦虑母亲对她体内所“孕含”的未来前景爱恨交织。有些女性主义者已经争论说，德里达以一种“女性的”方式处理文本，他不仅从根本上瓦解着构成这些文本的男性主体，而且还拒绝以一种“男性的”、竞争性的风格与“对手”对抗。[19] 在这种读解中，德里达不是要摧毁逻各斯中心主义，而是宁愿暴露它的种种困难和局限，他容许它们继续存在，但现在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部分失败及不可避免的死胡同的认识则更加复杂。然而，

德里达并没有站到女性主义一边，并没有加入到试图掀起文化革命的女性主义事业之中。相反，他抑制自己，不做出这种承诺。我相信，他这么做的部分原因是，对于将要出世的婴儿是个“怪物”这一点，他具有一种“产妇的”焦虑。这样的犹疑便导致了一种有所局限的文本政治，这种政治之所以得以宣布是因为凭借了与封闭和总体化相对立这一名义。由于这种新政治既被设想为具有迫切的不可或缺性，又被设想为具有噩兆般的令人畏怯性，因此，解构主义便被关在一间两头不靠的旅馆，这里的主要消遣就是无休无止地在文本上费心和游戏。解构主义把自己塞进了一个由多种力量组成的场中，不去直接争夺地盘，而宁可攻击现存立场，往往激起对方敌意的无意识冲动。

我已提出，因一个很具体的原因，解构主义政治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我在下文中将要论证，对于阐明主体与电脑书写的不
107 同形式之间的关系，解构主义尤其有用；而且，解构主义的这一能力为它自身提供了一种普遍性，使它的分析范围延伸到它现行实践的局限之外。就像波德里亚的商品符号学和福柯的权力技术话语一样，德里达的文本解构主义使他能够进入电子书写和主体的新构型之间那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然而，德里达建构自己的观点的语境时所使用的方式，可能并不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解构主义探究这种关系的能力。由于语境化这个问题决定了什么领域可以对分析开放，因此在这个特定意义上，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么，对于他的书写观念得以发展的语境，德里达该如何归

纳其特点呢？德里达的书写观念与他著作的历史语境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文本、语境和电子文本性

解构主义政治因为不能决定该走哪一条路、应站在哪一边、是与左派同一个阵营还是采取不甚投入的态度，因此它常常遭到批判。德里达正确地反击说：解构主义处于两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而分为左派和右派的旧式政治则起源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立法机构代表的座次排列演化而来，已不再适用于这些还有待界定的论题，或起码已不能作为这些论题的定位点。[20]解构主义所处的这个位置在一种明晰的政治得以形成之前、在各种力量的清晰关系出现之前便已确定，而这个位置的发展方向却还难以确定，人们只能在这些关系清晰时才能选定立场。要分析解构主义政治这一难题就必须联系到它界定自身情境的方式：解构主义是从在场的角度界定自身的，这种界定方式是否能使书写概念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出发点？

德里达对书写与在场的关系含糊其辞。在《论文字学》开始的关键段落中，他宣称书写既是“逻各斯中心的”过去的一部分，又超越了这种过去，于是他就在在场中开始进行一种新的语言批判。如果把当前的情境划为转折时期，那么上文这种含糊可能就难以避免，但是关键的问题是，德里达是否对这种含糊性做出了适当的界定。

德里达以修正当时通行的语言范畴的范围开始：

108 已有一些时候了……人们说，“语言”是为了行动、运动、思想、反思、意识、无意识、体验、情感性等等。现在，我们则倾向于说“书写”是为了以上这一切，而且还要更多：不仅要标明字面上的象形或表意铭写的物理形态，还要标明使书写成为可能的总体性；另外，还要超越意指面（face）而标明所指面本身。因此，我们说“书写”是为了所有能够产生一般铭写的一切……控制论程序所覆盖的整个领域都将是书写的领域。[21]

书写的范畴宣告了“书的死亡”，“覆盖”了电子音讯，把它们作为“一般铭写”的一部分。但是这一论点接着便发生一种微妙的转换：“音书写（phonetic writing 译按，又译“语音书写”或“话音书写”）”与另类书写被加以区别了：

情报检索实用方法的发展极大地延伸了“音讯”的种种可能性，以致它再不是某一语言的“书面”翻译，再不是在口语中保持完整性的一个所指的传达。它与表音文字的延伸、与维护口语语言使它在言说主体缺席时仍能发挥作用的所有手段的延伸紧密连在一起。……作为西方形而上的、科学的、技术的及经济的伟大冒险的媒介，音书写既受时空的限制，又自我限制，甚至在它处于给文化领域强加其法则的过程中时也是如此，尽管文化领域已经避开了它。但是控制论（cybernetics 译按，

> 译文对此词的处理仍系用过去习惯的译法）与书写的“人类科学”的结合并非偶然，这种结合导致了一种更深的逆转。[22]

电子信息一旦开始便使“音书写”重新定位，使它相对化并给它划定了一个范围，改变了言说主体与音讯之间的关系。于是，问题便是：解构主义是否属于从电子书写这一新的立足点对“音书写”的批判？抑或，当它从外界目睹电子书写“更深的逆转”时，它只不过是希望达到对音书写的批判而已？一方面，德里达将“一般铭写”纳入他的书写概念的覆盖范围内。但是，他在界定了书写领域之后才宣称“控制论与书写的人类科学的结合”引发了“更深的逆转”，而且他并没有试图界定所述逆转的性质，没有界定它改变书写的具体方式，也没有对这种逆转的“深度”的性质的特征进行归纳。问得更确切一些便是，如与印刷相比，电子书写的间隔（spacing）增加了，这是否会引起主体与语言的关 109
系中某种根本上的断裂？若是如此，其方式又是什么？

德里达之所以不愿提出这一问题，我相信这是因为，这样做便要求他对自己的书写语境进行深层考查，而他虽然嘴上大喊要这样做，但显然他并不真的想这样做。例如，在《论文字学》中，他从某种正在显现的书写“情境”出发，含糊其辞地界定他的书写概念的语境。他接着写道：“为何当今［情境］正在把自己呈现为这般面目（*as such*），而且在事后（*after the fact*）？”[23] 这个问题是提出来了，但他未着一字便很快把它打发过去了：“这一问题将会引起永无休止的分析。”[24] 既然德里达已经把他自己的纲要定

义为永无休止的，那么难以穷尽性便不应该成为绕开语境这个问题的借口。要对逻各斯中心主义进行解构，就要从创建语境这个永无休止的任务入手，但是对解构主义的语境进行界定，这个问题的永无休止性只是为话语封闭提出的失败辩护。能够得出的唯一结论便是，解构主义既认识到它对其语境的依附，又不能界定这种依附，既不能严格地把它作为问题提出，又不能完全承认与这种依附相连的政治意蕴。

在《署名 事件 语境》一文中，德里达联系他的书写理论阐述语境问题，他曾断言不可能对语境进行规定，此文对此断言进行了系统的辩护。他把书写铭写到延异这一可能命题内，把它作为一种抵制意义与作者的同一性的不可简约的缺席。

> 这种可能性才是我想坚持的：摘录以及引用性嫁接（grafting 译按，又译“移植”）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附属于每一个口头的或书面的记号的结构；甚至在符号语言（semiolinguistic）交流的每一个视域（horizon）之前以及之外，这种可能性都会把每一个记号作为书写进行构建。作为书写也就是作为某一特定点上功能发挥的中断（functioning cut off）这种可能性，记号的这种中断是与它的“原始”意义的中断，与它对一个可饱和的约束性语境的附属性中断。每个符号……都能与每个特定的语境断绝，并以一种绝对不会饱和的方式产生种种无限新的语境。这并不意味着这一记号在它的语境之外仍然有效，而是相反，意味着只会存在不具任何绝对参照（anchoring）中心的语境。[25]

德里达坚信，所有交流、所有表达、所有符号都包含着与它们的发送者、言说者、指涉对象分离的可能性，以此作为自己的结构。这一假定是解构主义的本质，并且是其启发力量的中心。

但是，作者意义与符号的不同一性，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说明语 110
境问题应该作为次要问题考虑或不予考虑。《署名 事件 语境》的主题便是，“一个语境从来就不是能够绝对确定的（determinable），更确切地说，……它的确定（determination）从来就不是肯定的或饱和的”。[26]“更确切地说”是很恼人的一招，常常出现在德里达的行文中，因为它以一种令人无能为力的方式，使他的断言失去稳定性——在此所说的断言是指语境的绝对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语境的不完全确定与语境的绝对不确定性两者所含的意蕴是很不相同的，但是这两个观点都没被德里达认可为解构主义的观点。如果语境从来就不是能够绝对确定的，探究它就毫无意义；如果语境只是从来不会被任何特定的确定性所“饱和”，这一问题可能还值得探究，可能会产生重要的、起码是有趣的结果。德里达的这些断言并没有完全排除语境研究。然而，在实践中，他的书写总是无视语境的存在，以至于不完全“饱和”变成事实上的（*de facto*）绝对不确定性。在德里达看来，柏拉图、卢梭、胡塞尔、列维-斯特劳斯以及海德格尔的文本的语境，对于他对他们的分析显然并不相干。

德里达从符号的一般属性的角度提出语境问题。而我提出这一论题则宁愿联系到作者如何在文化／社会世界确定自己的位置，更具体地说是联系到这一定位在限定作者的可能命题中如何起作用。我想以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的方式申明，作家在选择

他们的主题时总是将当代领域或语境以及他们用以处理这一主题的方式总体化。关于解构主义，我想论证如下论点：它的书写主题，如果联系着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语境看，是被总体化了；但若联系着信息方式的语境看，联系到20世纪以来语言包装方面所发生的巨变倾向看，它可能并没有被极有成效地总体化。如果解构主义被明确地置于电脑书写的语境中，那么便会开辟信息方式中的一个重要的附属领域（subset），一个极富成效的分析领域，那么反过来也会对解构主义本身进行重新构型。把解构主义从逻各斯中心的哲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中抽出，重新将它插入电脑书写的社会语境，解构主义便能为社会批判理论做出更多贡献，更有助于它完成对20世纪晚期社会进行分析这种重构工作。

111 为了探究这一可能命题，我将首先提出我对三种电脑书写类型的分析。接着我将考察德里达《明信片》中的文章《寄送品》（envois），指明它是如何提出或没能提出电脑书写和主体这一问题的。在这里我将再回到解构主义中的政治问题这一论题。于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分析电子书写，在分析中既要联系解构主义是以何种方式显明它与主体构成之间的纽带；又要联系电子书写是如何转而成为解构主义有待探讨的语境，这一语境指出了解构主义政治上和理论上的诸多局限。

在主客体的边界上书写

与笔、打字机或印刷机相比，电脑使其书写痕迹失去物质性。

当待输内容通过键盘被录入电脑时，磷光像素便显示在荧光屏上，形成字母。由于这些字母只不过代表着内存中的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系统中的代码，可以说对它们的改变能以光速进行。作家与他／她所用的词语之间的相遇方式是短暂而立即就会变形的，简言之，是非物质的。与此相对照的是，用手划在纸上的或以打字机的键敲上去的油墨有一种不变的痕迹，难以改变或抹擦掉。一旦这些字从头脑中的意象转化成字形再现，它们就变成其作者的敌人，与他／她对抗，抵制他／她想改变或重新调整它们的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在电脑上写作免去了从思想到字形的转化过程，却又达到同一目的。因而，作家所面对的这种再现，便与头脑中的内容或说出来的话，有着相似的空间脆弱性和时间同一性。作家与书写、主体与客体具有这样的相似之处，即走向同一性，这是对同一性的一种模拟，它颠覆了笛卡尔式主体对世界的期待，即世界由广延物体（res extensa）组成，它们是与精神完全不同的存在。[27]刚开始用电脑书写的作家都反映，写作过程的许多方面变得多么方便，或者书写现在简直就像说话一样，对此他们很惊异。荧光屏—客体与书写—主体合而为一，成为对整体性进行的令人不安的模拟。

在使用者经验的现象学层面上，电脑书写类似于一种临界事件（borderline event），其界线两边都失去了它们的完整性和稳定性。电脑书写处于划分主体性与客体性的界限上，给笛卡尔二元论所代表的澄明而确定的世界带来些许含混。人类面对机器，其关系像照镜子一样，令人焦虑：电脑作为机器以它的非物质性模 112

仿着人类。电脑的这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使得书写主体双重化；人类在机器可怕的非物质性中认出了自己。（当他把文章的段落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时，当他把一篇文章附到另一篇文章后面时，当他使用拼写检查或同义词库时）使用文字处理器的新手发现机器的能力竟与人脑的能力类似，在这些情形中，人们注意到了信息方式这一层面的镜映效果，深感震惊。这倒不仅仅是新的技术成就的可能，而是电脑书写的技艺显得与人脑的能力以及人脑所能达到的成就相等了，有些情形中，似乎还把人脑远远抛在后面。后笛卡尔式的世界表征可能会由一个连续体（continuum）组成，一端是简单的机器，另一端是人，而中间则是电脑、似人机器、机器人、机器维持的人。

在使用电子同义词库时，作家指令该程序搜寻一串词或按顺序排列的词。紧接着便是对数据库的搜寻，从技术角度看，它实在平常。但是有了这个非同一般的快速电脑，种种同义词几乎在给出搜寻指令的同时便出现在屏幕上。机器程序推出了电脑作家苦思而不得的词，或说使这个词显形了：这个程序完成的“认识或回想行为”类似于大脑所成功完成的行为。在这一情形中，电脑完成的事恰恰是人脑所不能完成的。或者，让我们以段落重排为例：电脑作家第一次完成这个任务时，不自觉地会发出一声感激的叹息。作家回想起过去要花费多少精力和时间才能做成这种整理工作，如今不费吹灰之力，几乎还没有在头脑中重排这些段落花的时间长。

当然，这些例子很难代表计算机技术的锐利优势；与人工智

能和非线性运算的最新发展相比，这只是微不足道的成就。像图灵检验（Turing's test）中将电脑与人脑进行严格比较时，根本就没选这些例子。[28] 不过，有关电脑智能这一论题的辩论与我们的论述无关。信息方式理论的关键不是计算机是否是人脑的精确复制品或甚至比人脑还好，而是电脑书写是否对主体性的诸种性质提出质疑。这种主体性一直便是与书写相联系的，一般说来更是与理性相联系的，甚至是与身份的男性形式相联系的。把电脑书写作为信息方式的一种实例进行分析，恰恰揭示了一个非常突出的 113
变化。

老资格的电脑作家可能会对我只谈新手的经验提出异议。当作家习惯了电脑技术，用电脑写作的阵阵激动也会很快随之消失。这种异议认为，电脑书写已经与打字或手写相同：技术，无论多么优良，也只不过就是那么回事，一种工具，如此而已。电脑书写决不会使笛卡尔式的主体感到不安，而只会使他们编写出更长的个人学术简历，使其职业成果更加丰富，普遍促进已经存在并与自律的理性主体相联系的制度性书写模式。虽说这一异议确有不少真实性，但是信息方式给主体性的构成方法带来了一些重要变化，而这种异议却忽视了这一过程中的缓慢地震。正在发生的这场地震的征兆之一，恰恰就是我们所谓的常规化效果。电脑书写引起的主体性的新形式很快就变得习以为常，理所当然，不具新意。信息方式的诸多方面，诸如电脑书写，导致了差异，但这种差异被压抑和反驳，被否定和抛弃，以便努力维持一种稳定的常规性。人与新的经验有机融合了，因此人也就接受了已经改变

了的环境，而同时又否认发生过任何事情。这种常规化或现实效果有助于让人过日子，尤其当这种日子与以往的日子大为不同的时候。

电脑化文字处理和作者身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主体的其他方面。作者是一个个体，一个在书写中确认其独特性的独特存在，他 / 她通过其作者身份确立自己的个性，从这个程度上讲，电脑可能会搅乱他 / 她的整体化主体性的感觉。电脑监视器与手写的痕迹不一样，它使文本非个人化（depersonalizes），清除了书写中的一切个人痕迹，使图形记号失去个人性（de-individualizes）。[29] 电脑化的存储媒介也是如此。试以一部写在电脑上存在软盘中的小说与一部以手稿或者甚至是打字稿组成的小说相比较。手稿作为原始件，具有价值。学生和学者查阅它们时，还能抱着更接近作者意图的目的，抱着从中发现“真实”文本或看出文本的演化过程的目的。在作者所做出的修改中，写作的过程，即文本的形
114 成过程被物质化了。这些修改往往可以从作者擦掉、替换和删除的地方，从旁注和增补中，从笔迹的微妙变化中，从创造一件物质事物的整个过程中清楚地看出来。收藏家和图书馆付出大笔的钱购买这样的本真性（authenticity）标记。软盘上的文件中原作性（originality）、本真性以及个性的痕迹都荡然无存了，很难想象会有人为一张软盘上的文件付出相似的兴趣。[30]

电脑书写还以另外一种方式颠覆了作为中心化主体的作者，即它引入了集体作者的诸种新的可能。现在已有许多合作性的文字处理方法：一张磁盘可以在不同的作者间传来传去或邮来邮去；

两个或更多的电脑可以用调制解调器通过电话线交流；区域网可以给不止一台电脑提供同时进入一个文本的可能。在这些情形中，集体加工很方便，在某些学科中这种做法已很常见。电脑为集体作者提供了一种非同步的同时性（nonsynchronous simultaneity）：写作与编辑可以在不同地点同时进行。电脑还极大地简化了对文本的增删工作。更值得注意的是，电脑化书写有助于对其自身进行集体作者新形式的实验。

1984—1985 年间在法国举行了一次这样的实验，德里达也参加了。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蓬皮杜中心主持了一个题为“非物质事物”的展览，其中有一部分是由一个电脑上的集体写作组成。来自不同领域的二十六位作家被要求对五十个词写出短评，选出的这五十个词都与展览有关。这些“定义”被存储在中央电脑的数据库中。然后，作家便可进入数据库，并能将自己的评论附到任何人的文本上，同时连接到中央电脑上的可多达三人。作家们被特别要求对“这种情境对你的书写经验带来的变异（modification）”加以评论。[31] 利奥塔预料，在文本创作中使用电脑，语言本身可能发生变化，可能不太会使意见走向一致，而会因为定义倍增及容易改变而走向他所谓的“歧见（differends）”。

德里达为“非物质事物”所撰文字主要讨论技术是如何影响书写的。德里达针对“作者”这个词写道，当作者服从该实验的规则，他的声音和手被电脑技术抹去时，原作者性（authorship）就变得“不确定”并会“消失”。他推测，这种后现代的书写实验 11
动摇了作者位置的稳定性，使他及其他人寻求“增补的权威”。但

是他还写道，作者每次介入都签了名，这就再次确认了老的“现代”版权法，所以，这个实验并没达到电脑技术所容许的偏激程度。[32]如果作者没有附上名字，电脑文本便对术语的多重定义做出回应，而这些回应再对回应做出回应，如此下去便以匿名的方式对其自身进行构建，其作用便会像利奥塔所希望的那样，使语言失去稳定性，通过对术语不断进行临时性的（provisional）游戏而改造语言。我还可以补充说，新的文本可能会反过来作用于书写主体，消解他们，把他们从处于这个世界中的位置的等级制和固定性中解放出来。

总而言之，虽说电脑书写使记号非物质化，把被书写客体与书写主体合而为一，成为对整体性进行新的模拟，但在它留下的记号，即软盘里的文件中，电脑书写也颠覆了作家的个性。最后，它带来了集体作者的诸多新的可能。

交流与新主体

如果说“非物质事物”那个实验暗示了创作文本的新方法，那么，电脑音讯服务则为交谈的继续进行提供了新的途径。我相信，电脑交谈对自我构建过程进行了全新的构型。主体在电脑交流中被改变了，被消散在后现代的时／空、内／外以及心／物语义场中。电脑交流由电子邮件、布告栏信息以及电脑会议等组成。在这些情形中，电脑既是书写板又是传送器：一个人在电脑上创作一条消息，然后用调制解调器把这条消息传送到一个遥远的地

方，在那里这条消息被收集起来以便将来阅读，或者，在少数情形中，消息接收者立刻便可收到，参与“实时”交谈。这些消息可能仅限于一个单独的收件人，或者任何指定数目的收件人都可收到，或者对“公众”开放，任何能进入电子“邮局”的人都可收到。如果电脑书写能取代印刷文字，那么，电脑交流便能取代邮政系统，取代电话，更进一步则能取代面对面的聚会。邮政系统和电话是“远距”交流，把消息发送给一个遥远的收件人。在前一种情形中，消息是书面的，交流是非同时的；在后一种情形 116
中，它是口语的，交流立竿见影，只要求主体的定位要协调、同步（或者，起码要在接收终端有一部磁带录音装置）。电脑会议是交流情境更为极端的转型：参加会议的人只需把电脑连接上去就可以“参加”会议，而仍然身处遥远的地方。不仅仅是像电子邮件这类简单的单件音讯，而且复杂的协同性交流也能以电脑作媒介。电脑会议所蕴涵的是，原则上讲，人类要交换群体情境下的音讯已不再需要同时同地进行了。

与文字处理不同，电子音讯服务和电脑会议以（电脑化）书写代替了口头交谈。在这层意义上，它们把书写领域扩展了，使它能覆盖到以前只限于当面交际、邮件和电话的交流领域。电脑书写的这些形式似乎对主体具有确凿的影响：

1. 它们引入了对身份进行游戏的种种新可能；
2. 它们消除了性别线索，使交流非性别化（degender）；
3. 它们使关系中的现存等级制失去稳定性，并根据以前并

不相关的标准将交流重新等级化；而首要的是

4. 它们消解了主体，使它从时间和空间上脱离了原位。

电子音讯服务形式多样，但一般说来与电脑化信息服务彼此相关而又截然不同。后者只不过是用调制解调器就可以进入的数据库。这些服务的用户一般要为进入时间付费，可以自由地查看或“浏览”数据，搜寻想找的信息。许多不同国家有成千上万的这类服务，服务范围从图书馆的卡片目录到购物行情，应有尽有。与信息服务不同，音讯服务不是为用户提供固定的信息，而是为用户提供与其他用户的接触。一个人可以为任何其他用户留下音讯，不管相识与否。音讯服务新就新在，一个用户虽有许多身份，而在此的唯一身份就是一个名字或“称号”，而这还有可能是虚构的，且别人也往往这样认为。人们还可以用电话来联系任何号码，联系任何联网的人。但是用这种方法与他人进行的交谈总是有些出格，一般被认为是冒昧无礼，趣味粗俗，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大孩子用来捉弄人的。而音讯服务的参与者则与此相反，他们
117 一般都急于“谈话”。再者，电话交谈在声音和语气中保留了一个人的调号（signature），所以谈话者感到他们的“真实”身份会随着他们的情绪而泄露出来。音讯服务中不会保留这样的身份痕迹。匿名性是完全彻底的。身份在这种交流结构中被虚构化了。

即便他们的交谈伙伴使用真名实姓（一般认为这样不合适），或者像在当面交谈中那样表达自己，音讯服务中的交谈发烧友（conversationalists）还是假定他们的交谈伙伴不是“真实的”人。

于是，主体在这层历史新意义上受到质疑。在部落社会的小社群中，个体处于无所不及的亲属结构的关系网中，日常经历都在对身份进行再生产，因此从出生之日起就“为人所知”。在这一语境中，主体是社会化的，被构建和再生产为一种关系自我（relational self）。与此相反，在城市中的个体则被抽离这样的身份再生产，但是现在是在信息方式之前，交谈还需要面对面的定位，需要确定该个体的身体“调号”，以便必要时还能在以后再回想起那些实际身份。[33] 书写与印刷中，身份进一步脱离交流，但是即便用了假名字，其原作者性也还起到固定身份的作用。在电脑音讯服务中，语言的使用则基本上与传记身份分离了。身份在电子交流网络及电脑存储系统中消散了。

人们终于能够与其他人进行远距交流，而且往往要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交谈中，自己的身体、声音、性别等个人历史的许多标记必然被呈现给交谈伙伴，由此引起的诸多考虑，现在已不必顾及。交谈发烧友处于小说作者的位置上，在书写过程中把自己当做小说角色创作，从诸如自己的感情、需要、观念、欲望、社会立场、政治观点、经济状况、家庭境况等整个人的角度，虚构自己。他们置身于文化之中，其痕迹只局限于这一事实：他们有能力以某种特定的语言进行书写，也许是无穷度的（infinite degree）书写。

由于电脑和音讯服务的介入，书面语言被抽离社会交往，以致身份已变成想象的。这种想象与拉康的想象界并不相同。拉康的想象界产生于镜像发展阶段，所有主体都会因这个阶段而被去

118 中心化和自我异化。电脑上的交谈发烧友并没有再生产自我与欲望之间的结构差异，这种差异是一种空缺，存在于无意识所结构的自我之内。而书面交谈则在其生产过程中创造了（想象的）主体，并没有对语境进行常规包装。[34] 可以这样说，主体总是想象出来的，而统一的自我只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一个意识形态幻象。然而在电脑交谈中，一种零度的或空洞的主体空间被结构到实践之中：书写主体直接将自身呈现为他者。

虽说电脑音讯的匿名性可能被电脑交谈发烧友当作一种解放体验，一种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的体验，但我却要论证这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电脑交谈发烧友根本就不“自由”，而是以多种方式受到约束。首先，他们被约束在在符号交换中，被约束在对主体进行定位的新的电脑化系统中；再者，他们被已有的自我构成所约束，最典型的情况是被这一自我的经验所约束，即作为限制并激发着越轨意识的这种自我在隐匿或悬置起来时的经验；最后，他们被约束在交谈所使用的语言中，这语言具有语义的、意识形态的及文化的特性，这种特性并不会因转换成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而减弱。主体的某些方面在日常生活中是以一种否定形式构成的，我怀疑电脑音讯可能会强化主体的这些方面。我并不是在断言电子音讯能够在事实上促成某种“整体的”或“真实的”自我构建行为，而是说自我构建过程的一种再构型正在形成，这种再构型具有一套新的限制与可能性。

音讯服务一般会出现在电脑公告牌上。美国的每个主要城市都有数百个这样的公告牌。公告牌是个人在电话线上建立起来

的，有时与一个电脑俱乐部或其他特别兴趣小组相联系。他们通常免收打进来的电话费，并提供公共领域的软件、游戏以及一项音讯服务。这些音讯绝大多数往往是关于电脑以及从公告牌上获得的软件的问题。有些人之间的友谊始于交换音讯，有些音讯的传递则在先前已经有所了解的人之间进行，他们已有的相互了解与电子无关。加州奥兰治县有一个公告牌叫做“法式关系（The French Connection 译按，显然借用同名奥斯卡奖电影片名）”，它旨在激活并模仿单身吧或约会服务。你可以参加进来与一个“情人”进行私下交流，在“更衣间”与其他男人聊天，在“梳妆室”与女人聊天，或者在“公共”区域与其他参与者“见面”。该音讯服务限定用户只能使用一个“称号”，因此就降低了玩弄身份游戏的可 119
能。然而，就以这个称号，一个人的日常自我便可能具有多重身份。在“法式关系”中，有一个叫“爱丽丝”的，人们之所以记得她，是因为她在“公共区域”大跳脱衣舞，而且还在屏幕上附上文字。

音讯服务在美国是由商业化计算信息服务机构提供的，而在欧洲则由政府通信机构提供。[35] 为普通大众提供的电脑通信服务中，法国迷你电信（French Minitel）无疑是范围最广、最吸引人的实验。法国政府因为急于要在高科技通信领域赶上其他国家，整个 80 年代期间，免费把数百万台小型电脑送给电话用户，这本来只是为了代替电话号码簿。[36] 迷你电信的用户除了获得电话号码外，还获得数千种服务，主要是有关各种话题的当前信息的数据库。尽管“迷你电信的玫瑰”被滥用作嫖娼联系，[37] 音讯服务（*messagerie*）还是迷你电信上最流行最有趣的现象。

在斯特拉斯堡，GRETEL 系统在 80 年代初期加了一项“音讯服务”，大获成功，很快便传遍整个迷你电信网。迷你电信中有一半拨号是为了音讯服务。[38] 玛丽·马香（Marie Marchand）在她关于迷你电信的书中，描述了法国人如此迷恋音讯服务的一些原因：“人们可以无所不谈，毫无禁忌，无论白天黑夜，想跟谁谈就跟谁谈。人们可以寻找心灵伙伴，惬意地交谈而不会产生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交谈时的那种不安，还可以与固定的讨论伙伴再连接上。”[39] 对法国人来讲，“言论自由”在迷你电信的音讯服务这些条件下最充分地实现了。1986 年通过的对“远程电信服务（telematic services）”进行管理的法规，把这些服务，如迷你电信，纳入播放媒体的范畴；但对它们也予以特殊考虑，给它们规定了与新闻界同等的地位，保证不对它们行使任何采编或审查法。[40] 在政治舞台上，右派攻击迷你电信，而左派则欢呼说迷你电信的引入延伸了共和传统。[41] 于是，迷你电信的音讯服务被阐释为自由主义交流政治的延伸。

在法国人对迷你电信的不同观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自由如今与公共领域或私人领域中个人身份的维护无关，而与其中个人身份的完全隐匿有关。马克·纪尧姆（Marc Guillaume）把迷
120 你电信想象为将来的基本交流工具，对于监视器为个人所提供的保护感到欢欣鼓舞，匿名的个人安全地隐蔽在一个超越责任感的位置上。[42] 用马香的话说便是：“多亏可以随时改换的假名，人们可以玩面具游戏，玩不同身份的游戏了。……人们可以不必亲自来到而又能到场，能看到而不会被看到，能假扮成另一个人，走入未知世界而又不冒任何危险。”[43] 这些作者的假设是，在信息方

式下，在超级全景监狱的世界里，对个人的监督是完全彻底的。自由王国于是便退守到电脑显示器以及虚构身份上，这些虚构的身份的交流可以通过调制解调器进行。

这种眼光无疑是雅皮士式的：白种、男性、中产阶级。1983年对迷你电信用户进行的一份普查也证实了这种情况：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是男性，百分之四十为年龄介于十五岁至四十岁之间的单身汉；绝大多数为中产阶级；迷你电信百分之七十的用户使用音讯服务，百分之七十使用假名，因为“这让他们开心”；百分之四十的人声称他们“宁可要迷你电信而不要电视”。[44]我们可以推测，笛卡尔式主体陷于它自己造成的工具理性世界的陷阱中，而现在则已经发现自己又落入歹托邦（dystopia 译按，乌托邦的反面）的囹圄。无论公众的还是私人的职业追求领域中都缺少或减少了游戏性、自发性，以及想象与欲望。只有音讯服务以其虚构的自我构建与彻底的隐姓埋名，为许多人提供了一种显而易见的缓刑，使他们暂时不必踏入理性的囚车。

一旦与音讯服务相连，一个人的主体性便犹如春花怒放。“电脑咖啡馆”、“单身电子吧”等音讯服务提供了一种新型的社交形式，一种信息方式时代的“社群”。人们对电子村如此依恋不舍，巴黎人八月份到布列塔尼度假时竟会只带上他的迷你电信。贝尚松的一个单身女人创下一项迷你电信账单记录。她的月使用费为11666美元，联机时间达500小时，而一个月的总时间也才720小时。随着音讯服务越发成功，法国电话服务的收入也大幅度上升，迷你电信的通信量大有使现有技术难以承受之势，新旧社会形式

间的矛盾也越发显露。夫妻因为对方迷情电子而醋意大发。一位丈夫愤怒之下切断电话线以阻止妻子与迷你电信的“外遇”（但这位妻子还是能接上线，这位丈夫则把她的那套家什扔出窗外）；还有一位妻子为了一个“极好的”男人而离开丈夫，这位男人只是她在音讯服务中“聊上”的，她对一个朋友坦白说，当她决定离
121 开丈夫时，还没见过她的新情人。这些例证给人的印象是，电脑音讯服务中产生出来的新主体，恰恰正是过去的那种浪漫的人。然而我所要强调的是，当某些用户坦言，他们在电脑交谈中流露出的亲昵言行，比他们对相处很久的配偶所流露的还要多的时候，电脑交谈往往被认为比传统的交谈更加重要。[45] 虚构的主体性可能比“真实的”自我更具“本真性”。请注意上文的异性交往实例中，与“哈里”的关系可能证实是与海伦的联系。

电子社群

正如音讯服务中无性别的隐匿性从根本上瓦解了笛卡尔式的主体一样，在电脑会议（computer conferencing）中，其他的社会等级也受到质疑。如果说迷你电信只容许两个人进行私下交谈，那么电脑会议则允许任何数目的人参加同一讨论，但又可以“自己选择进度、时间与地点”。[46] 如果说迷你电信为面对面的交际提供了电子化的增补，电脑会议则替代了全体社群成员的相聚。在杰西·伯纳德（Jessie Bernard）的想象中，电脑会议改变了“空间对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要想理解一个社会如何运作，我们根

本就不需要社群这一概念”。[47]其他评论者则更为乐观。希尔茨（Hiltz）和图罗夫（Turoff）在他们论述电脑会议的重要论著中，希望满怀地提出：

> 我们将要变成网络国家，与同事、朋友以及具有相似兴趣的“陌生人”进行大量的信息交换和社会-情感的交流。……我们将要变成一个“地球村”。……可以说，一个人将能够在国家或世界的任何地方工作、购物，或者接受他人教育或与他人同受教育。[48]

电脑会议是否会从全方位改变世界，且能达到其支持者宣扬的程度，这尚有疑问。不过，电子互联毕竟是一种新的书写、交际和交流形式，它进一步动摇了主体/语言“界面”的主导构型（译按，在此又可译为“配置”）。

电脑会议就像电子邮件一样，只不过参加“讨论”的人数可以随便有多少（但一般不超过五十人）。传送到中央电脑中的音讯被分类存储起来，立刻又能让其他参与者获取。[49]存取顺序完全 122
取决于读者，因此这便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原作者的作用。相反，整个会议倒变成了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原作者的一个单独文本。

对那些习惯于共时的聚会式会议（meetings）的人来说，讨论的过程既疏远而且又没有一致的方向。在一般的会议中，有许多东西并非依赖于说了什么，而是有赖于谁说的、他们的介入方式、他们如何着装以及他们的体态语言、面部表情和口头表达。

在电脑会议中这一切都不在了，结果，主体被置于一个非常新的情境之中。电脑会议的参与者散布各地，虽说某些常规惯例和术语已经开始形成，但引导他们进行交谈的新礼仪仍有待建立。例如，“潜伏者（lurkers）”是指那些只阅读会议音讯但不对讨论发表意见的人。“私语（whispering）”的意思是私下的旁白，指只限于一个或几个参与者之间的音讯。同时新的“社会病状”也出现了。电脑会议与会者会担心他们的音讯不能引起他人的反应，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中，参与者对是否针对他人的交流做出反应，态度也很随便，而在面对面的言说中很少体验到这种焦虑感。

由于电脑会议中缺少面对面的言说中起引导作用的常规提示和程式，很简单的程序问题就有可能产生很根本的困难。如依次发言并把讨论进行下去，这些事情都出现了问题。某些陈述类型，阐述风格和逻辑严密性会有压制讨论的倾向，而开放式陈述则征求回应，并进而形成会议。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者必须时刻做到尽量明白无误地表达其所说内容，不断以元陈述（metastatements）阐明自己的陈述。讨论中有很大一部分音讯必须专门用来阐述音讯，作为增补信息，以填补平常嵌入言说语境中的那部分。电脑会议的音讯不像共时的言语行为，它们对自己的语言实践的反思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语言惯例被如此彻底地动摇了，所以电脑会议很容易就变成有关言谈的言谈。[50]

电脑会议除了无作者性和自我反思性以外，还会动摇权力关系，这些统辖着共时言语的权力关系既是经济的又是性别化的。可能有许多因素从深层影响着一种表述被接受的方式，所有这些

因素，如制度性身份、个人感召力（charisma 译按，或音译为“卡 123
里斯马”）、修辞技能、性别及种族，在电脑会议中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因而参与的平等性得到促进。要考虑的是诸如打字速度这些新奇而又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的事，它们决定了谁“说”得最频繁。在共时会议这些解决问题的情境中，有很大的压力要求与会者与现存范式或将要达成的共识保持一致。电脑会议则与此相反。由于有着隐匿性和时 / 空距离的遮蔽，电脑会议鼓励公开批评，并鼓励人们提出非流行的或离奇古怪的观点。[51]

聚会式会议要求空间上的同步性，这既费钱又麻烦，而电脑会议则无须如此，仅这一事实便能使电脑会议促进权力的分散。先进的电话技术，如通信卫星等，容许参加会议的范围遍及全世界。会议日程安排变得无限灵活，其包含范围也无限广泛。从技术上讲，希腊集市的参与式民主以及殖民地时期新英格兰的市镇集会这种理想，在发达工业社会已变得可行。希尔茨和图罗夫预见了最好的前景：“我们相信，电脑化会议的基本作用将会是产生出以前所不可能产生的社会网络的数量和新种类。随之而来的将是价值观的性质及制度的性质的大规模转换，而这些价值观及制度则是社会特性的体现。”[52]希尔茨和图罗夫未来学家式的眼光并非总是关注着这种制度性变化的政治过程。他们认为，电脑技术的民主倾向，将会因为对技能的开放式的自由获取和广泛传播而得以实现。电脑会议很经济，这方面的优越性显而易见——要移动的是文字而不是人，因此电脑会议可能会遍及范围很广。果若如此，它将把一种交流形式引入日常生活，搅乱主体在其表达行

为中的定位作用。

在电脑上写作、在音讯服务网上交谈以及电脑会议都将新的限定关系引入作者／文本关系之中。[53] 最具发展潜能的变化是主体性的新构型，这一主体性的构成并不是通过对逻各斯中心式的在场进行文本置换得以实现的，而是在一个与作者／文本关系大相径庭的表达层面上，通过主体的一种分散形式得以实现的。电子记号与图示书写（graphic）记号相对，它容许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阅读与书写的时／空坐标进行深层改造。电子记号使反逻各斯中心的倾向更加激进，而解构主义争论说，这些倾向是所有书写中固有的。这种图示书写记号到电子记号的变化，容许电子书写在整个社会空间内广泛传播，并且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前电子书写
124 的时间局限。于是，主要问题便是解构主义是否能提供阐述手段，以便把握电脑书写的文本性，[54] 或者相应而相反地说，电脑书写是否对解构主义提出挑战，使它修改其策略并使之超越对逻各斯中心的文本的分析。

解构与电子书写

德里达在《明信片》一书中对电子媒介书写的主题处理是最为严密的，这本书无疑是他较难把握的著作之一。书的前半部分题为《寄发件》，声称是自 1977 年至 1979 年间寄出去的一系列明信片上的文本复制品，其中很多是一段段有缺损的散论。明信片针对非交流的语言这一问题："谁在写？写给谁？……寄到什么

地址？……我的诚实使我终于说出我一无所知，而我将这一切归功于我的诚实的任何遗迹。”[55]将这些明信片归入某个作者名下自然不会有问题，如，假如归入德里达名下（尽管这些明信片可能就是他的，这本书本来就是署他的名出版的嘛），或者弄清是那个（那些）收信人（尽管他／她／他们可能实有其人），或者确定书的内容是否对真实的明信片的复制，起码是部分复制，这样做都没问题。德里达的用意似乎是，明信片与书写一样是以说的形式而不说的手段（means of not saying in the form of saying）。明信片具有被寄给某人这一特殊属性，即它们被“指定了目的地”。可是，一旦它们不能到达目的地，它们便会瓦解逻各斯中心的理性。[56]

书的护封复制了一张明信片，文中没少讨论这张明信片。明信片上苏格拉底坐着写作，而柏拉图则站立其身后口授。这张明信片颠倒了这两个人物的关系，表明德里达关于书写先于言说的主题。实际的书写者柏拉图先于言说者苏格拉底，所以他们关系的一种可能再现颠倒了他们的角色，正如明信片所做的那样。但是在德里达看来，明信片是一种书写形式，并因此在逻各斯中心的传统中扮演着一个瓦解性的角色。作为一张明信片，它描绘的是明信片／书写的去稳定性效应，其描述方式是调换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关系。

《明信片》的读者起初可能会被该书的结构搞得莫名其妙。《寄发件》这部分包括明信片上的文字，在此之后重印了两篇论弗洛伊德的长文（《思索——论“弗洛伊德”》和《事实的要素》）。弗洛伊德与明信片的关系所涉及的，是无意识中复杂的记忆痕迹 125

与明信片这种远距书写的距离效应之间的相似性。在《文明及其缺憾》一书中，弗洛伊德对技术的进步以及工具主义倡导者感到遗憾，而且妙语相讥。他说，虽说电话使得人们能够与遥远的朋友谈上话，但首先是这一技术革命才使得人们可能离得这么远，因此才觉得需要电话。[57]弗洛伊德着迷的“技术”并非电话，而是蜡板（wax tablet）或“神秘的书写本（mystic writing pad）”。在德里达看来，这已变成了弗洛伊德对无意识的主要隐喻。德里达认为，弗洛伊德明白这块蜡板通过保留痕迹而起着书写工具的作用，且它由多重层次组成。这些层面有所区分地作用于书写，保持和抹擦痕迹的方式并不直接受书写者的控制。正如蜡板般的无意识超越了工具理性，因而与明信片的“文本”效果相似一样，弗洛伊德着迷于其侄子所玩的“寻宝”（fort-da. 译按，有人音译为“福-达”）游戏，即找回抛出去的物体，也使德里达想到“邮政的某种状态……”[58]在这两种情形中，主体都给表述指定了一个接收人，但这一音讯却被另外一个人收到了。如此而言，德里达觉得把他的明信片与他对弗洛伊德的持久探讨结合起来就很妥帖。他的明信片中有许多是情书，这真是再明白不过的心理分析主题了。

在《明信片》中，德里达延伸了书写的文本性这个领域。书写具有间隔（spacing）以及诸多记号，因此明信片这种媒介也被包括在其探讨范围内。明信片被寄出了：它们是跨越了一段距离的音讯。德里达认为，这种“远距的”音讯传递对书写内容而言是十分重要的。因为书写产生物质痕迹，所以它颠覆着理性主体

对真理的控制能力。这些痕迹介于思想与表达之间，使书写延误、变异，在作者与观念之间打开一道裂痕。明信片还产生另一种复杂情况。因为有距离，所以它们必须远行，它们可能会被寄错地方。作者的意图是把音讯寄给某个特定的人，而这一意图可能会受挫，且大体上总是受挫："一封信可能总是——因而肯定——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59]相对说来，明信片丢失事件极少发生，但因为这件事会动摇那种把明信片仅仅看作是信息传输工具的工具理性的观点，所以德里达赋予它很高的重要性。德里达想强调的是，明信片丢失的可能性极小，但这却是远距离音讯传输中固有的，因而不可忽视。

他还强调明信片这类特性中的其他方面，诸如邮局或邮政所 126
的卷入、信息从一个邮局传到另一个邮局等。他提醒我们，邮局并非一个纯然的职能之所，而是一个权力之地。德里达写道，"'邮政所'总是权力之所。这权力依照邮政网络而实施"。[60]作为一个权力之地，邮政所还改变了明信片的音讯，将它散布在种种交流位置组成的迷宫中。邮局还具有"其后的（after）"这种时间内涵，暗示着迟延，因而也就暗示着改变。明信片最为重要的特质也许是其物质构型：它是一个"开放"的音讯，任何接触到它的人都可阅读，因此它的交流对象不仅是那位收件人，而且还是许多读者，这些读者的数量就难以预测了。如果书写者只想让接收者理解其音讯内容，那么为了隐私起见就必须将音讯转化为密码。于是，明信片便既是公开的又是私下的。明信片上可以用于音讯的空间很小，这也限制了书写者。这种音讯往往只是一句话，说明

我在这儿，以及某种表示关系的音讯，如遇到某人时所说的“你好吗？”或“你好！”之类的话，人们并不指望按字面理解它们，而只不过是重申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些都是明信片的物质特质，它们使明信片成为一种中继性媒介，使得明信片能够像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以及一般意义上的书写那样起作用，从而塑造了文字“背后”的意图以及文字之中的意义，并颠覆发信人对音讯的控制。

在《明信片》一书中，德里达对语言媒介、明信片构筑音讯亦即它塑造交流主体的方式，以及明信片在技术史中的位置等都很敏感。正如德里达提到的那样，明信片很难说是这类技术的最新发展。他把明信片的起源追溯到 1870 年的普法战争，当时明信片这种发明，使士兵能与后方老家的亲人交流。但是对这种情境的疑问又一次引发德里达得出矛盾的结论。德里达在某些地方暗示，明信片是一个时代的基本书写原则，这个时代从柏拉图延伸到弗洛伊德。[61] 而他又在别的地方暗示，电子化的传输形式要么与邮政时代不同，要么就是它的延续。[62] 最终，这种情境还是不确定的：我们是否仍处于明信片时代，还是这个时代已经结束？明信片是书写的延伸，还是一种新的语言形式？邮政记号（postmarks）是否与电子邮件的记号不同？

就我的目的而言，《明信片》的主要意味是它表现了一种碎片化的（fragmented）迷失方向的主体。德里达证明了书写是如何成为一种疏远作用，使主体多元化和去中心化，以致读者不能在
127 任何程度上确定主体 / 作者的位置和特性。德里达在一张明信片

上写道，“你是谁，我的爱人？甚至当你置身那里，完全在场，我对你说话之际，你还是那么为数众多，四分五裂，各自为阵。”[63] 无论明信片的接收者还是发送者，都没有呈现为完整一贯的个体。在时空坐标中，也只能含含糊糊地指定他们的位置。在《寄发件》中，明信片是不完整的，有大块大块的文本丧失或被删除了。收件人姓名也从没明确给出过，所以她或他是好几个人，也有可能是一个人。厄尔默这样阐释本文的这些特征，他说它们表明作者德里达就像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压抑（censor）一样，处于阻抑直接交流的位置。[64] 如果我们把明信片与书相比，把这两者与电脑相比，我们便会看到主体越来越趋向于多重化和分散化。在每一情形中，书写的文本性都大相径庭。

德里达确实对不同媒介中的差异很敏感，这些差异涉及痕迹的物质性这一关键论题，但他似乎并不积极地想把这些差异主题化。他写道：“在日常语言中，邮政‘文件’的传递是对文件的物质支承体的传递，由于这一特性，严格意义上的邮政便能与其他每一种电信传播区别开来（如电报或电话，以及总体上的远程电信）。这个观点并没表达清楚，但是要想就有关邮政的陈腐观念达成共识，这一观点还很有用——我们确实需要这一观点。”[65] 最后那句话躲前闪后，犹疑不决，不敢对“物质支承物”立论。我力图把每种技术的文化构型，把语言与情境的相互作用，把语境对表述的包装作为问题进行探讨；德里达却不是这样，他似乎更热心于探讨书写的同质性，而宁愿将这种技术上的差异大而化小，甚至有时要弃之不顾：

> 在将来的岁月里……可以设想，所要传递的将不再是书写，而是打上小孔的卡片、微缩胶卷，或磁带……“远程邮政”……事实上这些伟大的技术一直就真正具有一种玄学家的天真……因为只要还不能证明，并不是有好多发信人，亦即好多地址，已经将自身渗透到我们每封如此神秘、如此密封的信件之中，那么便还不能证明会有什么混乱。[66]

对德里达而言，书写本身已经包含着反逻各斯中心的原则：新技术的差异趋向于被吸收进书写范畴内。然而，当记号或痕迹
128 像屏幕上的像素那样瞬息即逝，我们便要问一问，是否真的有什么东西可以寄送、邮递或“指定其目的地”。

也许正在改变的远不止文本性本身，如今，书写的情境也正在改变。随着电子书写的出现，书页上的间隔已变成世界中的音讯间隔。随着电脑书写的出现，间隔便从属于文本的新包装：书写可以随处发生，而记号（字〔gramme〕）的电子化又对书写的物质性提出质疑。由于记号不再植根于空间之中，它的时间性也就变得复杂。电脑书写瞬间即可传遍全球，它使自己置于一种非线性的时间中，这就动摇了它与书写主体之间的关系。电脑书写所挑战和激化的远不止是书、信和明信片，而且是解构主义者最先提出来的诸多分析术语。如果说痕迹、间隔和记号使逻各斯中心的主体失去了稳定性，那么关于电脑书写、音讯服务和电脑会议的文本作用，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从一种情形走向另一种情形时，人们也就从对中心主体的本体论权威的挑战，转换到对身份

的再构型，这种再构型的形式又对身体本身进行根本的质疑。电脑书写例示了解构主义提出的游戏，虽说这种游戏是一种很根本的矫正药，但也只是为了矫正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傲慢而已。

电脑书写对主体的去中心化作用当然并不是全然没有预料到的。工业革命创始的交通系统——铁路、汽车、飞机、宇宙飞船等——逐步提升人类身体在空间中的运动速度。如此说来，这些技术可说是将自我分散到世界中。[67] 化装舞会、私人广告以及衣着风格这些行为都为人们提供了玩弄身份游戏的机会；但正在被铭写进我们的文化中的这种电脑书写，强化了这些身份游戏的早期形式，并使之更加激进。这种强化和激化到底能达到何种程度，将取决于电脑书写在将来会撒播到何种程度。只有对这些现象的经验研究才能确定它们准确的社会影响及文化影响。然而，电脑书写仍是最典范的后现代的语言活动。由于电脑书写在非线性时空中分散了主体，由于其非物质性以及它对稳定身份的颠覆，电脑书写便为后现代时代的主体性建立了一座工厂，为构建非同一性的主体制造了一部机器，为西方文化的一个他者（an other）撰写了一篇铭文而载入其最宝贵的宣言中。人们可以把它称为一种怪物。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后现代政治的诸种可能

我想，与这些电脑待在这个房间里，更像是一种脑力劳动。但是你与它打交道越久，你就会越信任它。学会信任它并非易事。如今，人们很怕；他们不信任它，所以有很多压力。他们需要学会如何依赖它，才能放松下来。

——最近才电脑化的工厂里的一名工人，肖莎娜·朱波夫

在《聪明机器的时代》一书中的引述

电脑、科学与工作天地

信息方式意味着马克思所知的工人阶级的结束。随着电脑被引进工厂担负起工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一种新的工

人／主体得以构建，该工人／主体的劳动已不再是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典型意义上的劳动。劳动已不再是一种体力行为，倒更像是一种脑力运作，是阐释监视器上的符号这样的认知行为。用肖莎娜·朱波夫的话来说："由于新的技术安排抹去了行动语境，因此人们就更少有机会求助于以行动为中心的技能，以此作为直接知识的源泉。这就意味着，人们要想找回肯定感、能力感及控制感，就会越来越依赖于智力技能的特质，也越来越依赖于那些为了紧密符号与现实的联系而发明的创造性方法。"[①] 手艺人和流水线上的工人无论有什么区别，他们都还与生产中所使用的材料具有一种积极的"伸手可触"的关系。他们的身体直接参与从原材料到成品的转化过程。工人的感官、心智以及肌肉都被调动起来，统
130 一在技巧与技能的努力中。构建着工人经验的是同样的景象、同样的气味、同样的物体、同样的运动，多少年来日复一日。如今，由于工作场所中引进了电脑，一种新型工人正在产生，他们远离生产场所，坐在监视器前、坐在开关前、指示灯前，坐在一个信息阐释器前。

当我们与无产阶级道别时，我们也就必须合上有关一个整个政治时期的书，有关辩证法和阶级斗争的书。当人们从今天这种位置回头看的时候，人们能够把现代时期看作是自由主义政治与社会主义对立的时期。自 18 世纪以来，西欧及北美的行政权力就一直受到宪法和代议制议会的限制。对这种权力布局的主要挑战来自于社会主义者，他们争论说，质变要求劳动力的重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承认，社会总要致力于扩大的物质生产：

问题是生产过程应该民主到何种程度。电脑被引进工作场所，信息系统的遍布，它们作为控制这些过程的手段，预示了工作和管理的一种新构型，这种新构型的轮廓界限如今还不很清晰，也还有激烈的辩论。有些人争论说，随着工人变得更有技术，更有智能，管理者必须变得更有灵活性，更少等级观念，且劳资双方的界级也正在越发变得模糊不清。[②] 其他人则坚决认为，新的工作场所与旧的并无不同，资方仍占据其位；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工人正变得越来越丧失技能，而管理者则越来越远离车间现场，这是在强化而非模糊阶级界限。[③]

然而有一种倾向是难以否认的：科学知识正被日益应用于生产之中。它所呈现的形式可能是公司中的研究与发展部门，或者是与公司项目相联系的大学实验室，[④] 或者是激发科学工作的军方创见，或者是市场研究、公共政策研究以及独立的企业资助等，但是利用电脑及高科技系统的系统化知识，简言之即是“科学”，如今已是生产过程的中心。生产方面的问题已不再是塑造材料、协调劳动、探明资源、建筑运输系统等方面的了，而是物品的设计、模拟、制模，以及物品生产出来后如何将它们缚在消费者的想象上。如果科学话语已经变成了一种主要的生产力，那么这种将会获得关键地位的话语，就不能复制其行动步骤，而必须发现一种认知（knowing）方式。这种认知方式要与艾萨克·牛顿以及 17 世纪后 131
期的专家所开拓的系统知识的形式保持一定距离。[⑤] 实验室的步骤程式[⑥] 以及把科学家当作客观的、自律的、理性的男性主体而进行的构建，作为知识的基础，必须失去稳定性而变成知识的对象。[⑦]

对科学的“他者”的追寻已经在女性主义者[8]以及其他人[9]的探索中获得了一些成功。当霸权性的知识方式、分析科学以及辩证法不再被看作具有奠基作用时，人们可能追求什么类型的知识，这仍是争论的要点。后结构主义者为了给一种新政治建立基础，力图改写科学问题，我将在本章中对他们的这种努力进行评价。一旦公民不再能够像科学家那样作为自律的理性自我在选举行为中采取批判姿态，一旦工人不再能够采取辩证否定的批判姿态，那么便会产生这样的问题：怎样的话语才有可能严格地支撑起一种批判性政治，怎样的自我才有可能表现并言说一种自由的语言。所以，新政治以及我们应如何在信息方式下从理论上探究这种政治就成为一个难题。为了探讨这一难题，我将追溯 1968 年“五月风暴”以来的后结构主义者的轨迹，他们对政治进行的理论探讨受到了“五月风暴”的极大影响。

后结构主义的政治

1968 年 5 月以前，后结构主义者——波德里亚、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德勒兹——都与左翼的政治团体或党派有联系，起码也是抱着同情态度。1968 年发生在巴黎的“五月风暴”，引发了一场对早期政治学识的反思。巴黎及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 / 工人 / 市民的暴动并没有沿用传统的抗议路线，当时法国政治的特点是党派、群体和社团组成了广泛的网络，而“五月风暴”似乎既是一种政治抗议，又是某种文化剧变 / 街头剧 / 偶发艺术 / 表演。墙

报和小册子所质疑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和官僚政治，而且还有左翼政党、激进知识分子的明星制以及发达工业社会日常生活的文化。用巴塔耶（Bataille）和巴赫金的概念术语来描述它很合适。“五月风暴”将异质性的突发引入了现代性的政治，对雅各宾 / 列宁主义框架里所普遍接受的惯例和假设提出质疑。它是一种越轨的节日，一种极度消费的展示，而绝不是一套策划周 132
密、行之有效的工具性的政治举措，简言之，它绝不是“现代的”政治。随着全世界范围的期待与声援——墨西哥城、纽约、布拉格、东京——“五月风暴”成为对政治的性质与局限进行质疑的借口。

后结构主义者的政治轨迹当然绝不可能相似，也不一定与70年代出现的诸如女性主义、反种族歧视、生态主义、区域主义、反核等种种立场你唱我和。诚然，在某些情形中，后结构主义者与监狱改革、同性恋权利、反精神病学等运动有着松散的联系。但他们并没有在抗议的主要方面占据领导位置，并没有明确与这些运动结盟，甚至也没有广泛撰文维护这些事业。而从伏尔泰到萨特的法国知识分子有一个长期的传统，就是为他们时代的进步运动大肆撰文。事实上到那个七年临近结束之时，已经能够听到左翼对后结构主义的强烈批判：福柯被指责与保守的新哲学家（nouveaux philosophes）沆瀣一气，并支持霍梅尼在伊朗的令人深恶痛绝的新中世纪主义（neo-medievalism）政权；波德里亚因为《论引诱》等书，被指责为反女性主义；德勒兹奢谈精神分裂与游牧生活使他获得了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的称号；德里达

对文本的警惕没完没了，被斥责为摆出一副新面孔的寂静教派的（quietist）情感淡漠；利奥塔可说是这群人中最具政治经验的了，他也被哈贝马斯的信徒谴责为新法西斯分子。[10] 后现代的民主政治要从这群人中产生，其前景确实令人沮丧。

然而，后结构主义者对语言的深思，尤其是当我把它置于信息方式的语境之下时，这种深思确实开辟了一条通往一种新政治的道路，或者起码也暗含着这种开端的可能性。一个人对后结构主义的政治抱着怎样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如何评价现存的政治场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把自律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则是集体的）理性主体预设为人民主权论的基础，所以在我看来，他们的眼光都很不适合信息方式下的现有局面。电子媒介交流的世界瓦解了这种观点的阐释基础。在这一程度上，信息方式构建了各种各样的主体——多重的、分散的、去中心的、不稳定的，以此与同一性的文化相抗衡；这样描述出来的新的政治地形，其中必须放在前沿位置的是现代政治中“他者”的主张。对
133 政治新构型加以理论探究的努力中，最可能有所成就的当属拉克洛和莫菲将霸权理论与解构主义的嫁接，以及利奥塔的习语（phrases）与歧见（differends）的哲学。

拉克洛和莫菲以福柯和德勒兹 / 瓜塔里的著作为其立论基础。尤其在《监视与惩罚》（1975）以及《千座高原》（1980）这两部书中，这几位作者使社会科学的概念复杂化并消除其总体化，而拉克洛和莫菲则采用并改造了他们的这种方式。福柯的“权力微观物理学”和德勒兹 / 瓜塔里的“聚集（assemblage）”都是为社

会提出的隐喻。它们在深层与现代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理论进行竞争。这一理论着眼于界定这样的行为者，他们能够获得社会的客观知识，并尽力摧毁那些阻碍其自由的障碍。政治在这里变成了行为者为了控制社会以及控制对正义的定义的一场竞争。对自由主义者而言，正义是一件程序事项，是理性个人能否具有追求自身利益而不受异律干预的能力这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正义是将个体团结起来并理性化地管理自身事务的能力。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有关这两者的差异的争执甚是激烈。其实，这只是白人男性人文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从长远角度看，这种争论所耿耿于怀的差异恐怕终究不会超过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差异，而是类似于它们之间的差异。说到底，他们都是基督教徒。

福柯使得政治领域多重化并失去主体性，从而对现代社会理论中的政治的定义提出质疑。他争论说，在“现代的”政治中，法律是权力的中心，是一种功能，即从多方面阻碍或促进个人的行动这一功能。福柯以典型的后结构主义姿态，到边缘中寻找证据，以便使这种铭写失去稳定性。他发现，权力作用存在于所有实践中，而不仅仅是存在于直接与中央法律权威竞争的那些实践中。例如，在确定两性人的性别身份时，权力便在医生中间发挥其作用。[11] 对福柯而言，权力散布在人际关系的始终。现代政府之所以能蒙蔽人，就是因为它有这种伪饰，能够把权力限定在中央政府范围内，使人们无从觉察其无处不在的多重形式。如果到处存在着权力的作用，那么人们不仅可以在权力中心也可以在其边缘进行合法的争夺。主导话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将这些四处

扩散的颠覆行为隐藏起来，只允许某些特定的行为者作为“政治性的”而粉墨登场。福柯对现代政治的批判与70年代爆发的抗议
134 运动不谋而合，这种情况过去往往发生在公认的自由主义及社会争论领域之外。

福柯还重塑了政治中主体的位置。现代政治赖以建立的基础是笛卡尔式的主体观，这种主体观认为主体是一个理性存在，介于客体世界“之外”并能通过认识客体而控制它们。福柯动摇了主体／客体、知／行、观念／行动、话语／实践这种二元论，从而反驳了笛卡尔式的主体观。他在话语以及实践的构型之中找到了权力游戏的位置，从而使得社会“客观化”，而话语与实践的构型说到底却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监狱对建筑设计、管理条例、科学知识以及法律机器进行综合，从而构建了一种“权力技术”。在任何主体中都找不到监狱的权力，所以也就不存在可作反抗对象的行为者。福柯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囚犯改造这一问题转向管理权力的机制，即全景监狱，从而他就反驳了自由主义者对现代监狱的赞颂。自由主义者认为现代监狱是对早期的野蛮主义更为人道的进步，而全景监狱作为支配的一种形式却被自由主义话语掩盖了。他的分析没有针对犯人如何被改造为理性主体这一现代问题，他针对的主体是如何被一种特殊的话语／实践的运作所构建这个论题。他所暗含的意思是，甚至连“理性”主体也是被如此构建的。

对福柯而言，后现代政治暗含着他律因素的爆发，越轨姿态在社会边缘的推动（这便揭示了以前一直隐蔽着的权力游戏），以

及“局部知识”对既成话语的置换。在此情形中，自律主体的形象必然被相对化，而理论家的位置也随之受到质疑。理论家被卷入了对行动的批判：如果理性主体的模式在福柯的中心权力批判中被证明无效，那么理论的位置也就受到质疑。因为理论家并不比社会行为者更有权要求站在理性的坚实基础上。为了这一目的，福柯驳斥了西方传统中知识分子的普遍要求，也驳斥了从洛克（Locke）到马克思这些西方理论家的总体化要求。但是福柯自己的理论地位以及该理论对批判地位的要求也因而值得怀疑。

例如哈贝马斯便强烈反对福柯的尼采式话语，反对其中他所谓的“行事性表述的矛盾（the performative contradiction）”，他认为福柯的话语中没有一个观点能当作真理的基础。[12] 为了给自己辩护，福柯回到启蒙主义思潮的“批判精神”这个侧面，从而否认了对“非理性主义”的依附。[13] 按福柯之见，当讨论的对象正是批判话语的传统时，给批判话语确立一个空间也就成了问题。他断言，援用规范而又不把它们落在实处，追求“真理”而又 135
不把主体构建为真理的中心，这种批判立场是可能的。无论这种回应是否能自圆其说，哈贝马斯所指责的行事性表述的矛盾，即人们在例示理性批判的同时必然援用理性法则，假定着一个统一的同质文本场的存在，这一文本场首先就不容许有“矛盾”存在。但是，后结构主义者认为，话语一直已经是他律的，并被缺席和绝境复杂化了，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这种指责就会失去很大力量。

后现代的欲望

在《千座高原》中，德勒兹和瓜塔里把社会看成是去中心化的并且是去主体化的，而他们为此进行的表述比福柯还要复杂。他们的早期著作《反俄狄浦斯》，依赖精神分裂欲望这个观念批判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观点，而那个观念本身就值得怀疑。《千座高原》继续把欲望这种很成问题的观点提出来作为批判基础，但已包括着对社会和政治的后现代理论那颇有前景的详细阐述。该书试图瓦解对理论的线性呈现方式："我们俩人合写了《反俄狄浦斯》。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好几个人，因此我们已经是一群人了。……一本书既无客体又无主体；它是由形式多样的物质组成的……把一本书归功于某一主体便忽视了这些物质的作用，忽视了它们关系的外化性（exteriority）。"[14]《千座高原》缺乏一个中心主体引导读者一步步深入，因此它便从文本形式上向现代理论发起挑战。同理，德勒兹和瓜塔里也鼓励读者随便从哪里开始阅读，因为他们并没有把该书组织成一篇连续不断的线性的论文。

德勒兹和瓜塔里将社会构型为一种处于连续的非线性运动中的机体强度（bodily intensities）的综合体。他们所呈现的逻辑是多维的、变换的、非连续性的。他们谈到层次（strata）、聚集（assemblages）、局域化（territorializations）、飞行线路（lines of flight）、抽象机器等一大堆术语，它们瓦解了诸种概念借助话语表述来控制一个领域的功能。他们的概念范畴切断了常规的理解

线路，戳穿了支配现代社会理论的二元逻辑，这种现代社会理论从一种原始生命力的视角呈现现实图景。似乎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地球本身便会把这些变化描写在其表面，这一居高临下式的观点与个体的自我或者社会科学家受约束的意识相去甚远。 136

德勒兹和瓜塔里从语言与行动两方面对现在进行构型，其构型方式对于后现代政治的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他们写道，

> 就总体而言，资本主义体制的运作，越来越不依靠与工作的物理社会学概念相对应的时—空辉纹（striation）……［而是越来越依靠］一种普遍化的“机器的奴役（machinic enslavement）”，以至于一个人可以不做任何工作便有可能提供剩余价值（如小孩、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电视观众等）……［如今］资本主义更少依赖劳动量而运作，更多的是通过复杂的质的过程而运作。这种质的过程调动了运输方式、城区模式、媒体、娱乐工业以及感知方式等每一种符号系统。[15]

在后现代世界这一景象中，个体因其在信息流的环路中的位置而被构建。一直要听到潮流之声便是最主要的政治行为。

在20世纪晚期，资本主义内部形成了一种新的“聚集”，它使人与机器的关系“重新局域化”：

> 如果动力化机器构成了技术机器的第二时代，控制论的（cybernetic，又可译为“资讯的”）及信息的机器则形成了第三

> 时代，这个时代重构了普遍化了的征服政体：循环的和可逆的“人—机系统”代替了这两个因素之间旧的非循环的不可逆的征服关系；这种人机关系基于内在的相互交流，而不再基于惯用法或行动……随着自动化而来的是……一种新的奴役……人被电视奴役成一个人类机器，由于电视观众不再是消费者或使用者了，按说他们应该是“制造”它的主体，而今甚至连这也不是了。如今他们是其内在的组成部件，“输出”和“输出”反馈或循环，他们与该机器相连的方式已不再能使他们生产或使用它。在机器的奴役中，除了信息的转化与交换外，别无他物……[16]

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不可能用来理解人类与机器的这些新习性（dispositions）。要理解这种环路形式的主／奴关系便要求有一种独到的眼光。

137 《千座高原》恰好对这样的社会世界进行了非线性的表现，使我们对政治的理解更进了一步，但该书的分析却基于一个值得怀疑的自由观念，即把自由当成是欲望之流。与无意识的分裂式发展相对照的是，人类／电脑这个界面变成了一种“奴役”。但是对这种判断的权威首先来自欲望所具有的特权。德勒兹和瓜塔里退守在理论家／立法者的位置上，赞赏欲望的真理，反对“机器聚集”的衰变，这一退守使他们又回到了他们一开始就想瓦解的现代立场。对欲望的阐释使他们的著作走向封闭，违背了其多重的非中心化的作者的主张。他们又一次变成了这样的“主体”，它促进了欲望的成因，甚至在该书的反权威的（anti-authoritarian）组

织结构中，这个一元主体的施为语势（illocutionary force 译按，或译为“以言行事的语力”）还抑制着读者。

取道解构主义走向后马克思主义

拉克洛和莫菲没有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欲望的形而上学，而是提出一种去中心的分化社会观。他们转向后结构主义是因为它能为非同一性的（non-identitarian）批判理论提供基础。而与此相反的是，马克思主义以及自由主义凭借自我同一的主体强行实施一种理论话语，它把社会置于中心地位并使之封闭。拉克洛和莫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想辩护的论题是，“雅各宾派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想象界之间的连贯性不得不因激进式民主的规划而受到质疑”。这种种话语都被“构建为一种对话语性的领域进行支配、对差异流加以阻止，并构筑一个中心的尝试”。[17] 拉克洛和莫菲提出“表达（articulation）”这一概念，以弥补这些不足：

> 如果我们接受所有话语固恋（fixation）的非完整特性，而同时又证实每个身份的关系特性，那么能指的模糊特性、它对任何所指的无固恋性，便只有在存在着一种意指扩散时才可能存在。……社会从来就没有力图与它自身保持同一性，因为每一个节点都被互文性所充溢并被构建在互文性范围内。[18]

因为社会是非同一性的，所以，对他们而言，批判理论必须

是后结构主义的。在他们看来，在理论层面上维持语言的不稳定性，社会于是变得可以理解，这样，就很合适一种民主政治。他
138 们声称，自由主义 / 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这一“中心化”倾向的作用与政治中的民主倾向相对。

他们对资本主义进行重新定义，从而阐明了他们的这一论点。对拉克洛和莫菲而言，资本主义秩序必然是不稳定的，其特征是不断的“对抗”（antagonisms）。霸权之所以得以实现，就是通过对这种不稳定性加以否认，就是通过把社会作为固定、自然、必然的存在而进行的话语构筑。然而语言侵入了差异的关系逻辑，这一逻辑颠覆着霸权话语，维持着种种新联系、新陈述的可能性，他者借此将对抗性认识强加于自我。拉克洛和莫菲提出一种多元主义的政治，这种政治将会把差异与对抗的状态接纳为一种新民主的基础。用他们的话来说，

> 多种身份这种多元性的每项都能在其自身内部找到自己的有效性原则，不必在某个超验或潜在的实证领域内寻求这种原则；只是在这一程度上，多元论才是激进的。寻求这种原则便是为了建立所有这些身份的意义等级，并求证它们的合法性源泉与保证。这种激进多元论的每个项的自动构建性（autoconstitutivity）都是对平等想象界（the egalitarianimaginary）进行置换的结果；在这一程度上，这种激进的多元论是民主的。[19]

资本主义易遭批评，是因为它阻抑了身份的再构型过程，即对后

现代民主进行界定的那种不稳定性。我们在下文将会看到，在让-弗郎索瓦·利奥塔的著作中，对这种多元论的理论辩护得到最令人信服的发展。

拉克洛和莫菲将后结构主义主题引入了已被修正了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从而大胆地提出了一种“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他们力图描绘一种非本质主义的社会理论的轮廓，其中客观性从未被看成是自我同一的，而历史也没被理论化为一个封闭的必然展开的事件链。对他们而言，霸权观念意味着任何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的不完整性。葛兰西和其他人提出的霸权观念，是作为一种增补，以便对诸如阶级意识这类社会现象进行解释；而这些社会现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封闭逻辑所不能解释的。拉克洛和莫菲的论题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可能需要更新更好的增补（弗洛伊德、萨特等），而是这种增补性是所有理论的一个必要成分。对他们而言，理论必须包含“不完整性”，以避免本质主义，避免产生控制社会的幻觉。[20] 这种增补既使得理论完整，又重新维持了它必要的不完整性。

拉克洛和莫菲力图以下列非本质主义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构型。139
世俗积极性是“表述”和“对抗”的合流。日常生活是力的关系的种种特例的合集，这些关系通过对它们范围之外的东西加以抑制，从而隐藏起它们的起源和相对性。同一性因为禁锢差异而得以实现。拉克洛引用圣-茹斯特（Saint-Just 译按，法国大革命时的极左翼革命家，著有《共和国宪法提纲》等），所引的大意是“共和国的统一只不过是毁灭反对它的事物”。[21] 因此，社会是由种种

相关立场组成，但这些立场又全都矢口否认它们的相关性。社会组织主动要求这样的解构式分析，它通过对种种同一性的“阅读”把它们被抑制了的缺席成分重新注入到同一性之中，从而使同一性失去稳定性。拉克洛和莫菲为理论的非决定性、不完整性及偶发性辩护，把它们作为表现历史中的对抗游戏的策略。

社会的文本性在命名（naming）实践中是很明显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到商品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就好像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例外重复（duplicity）。拉克洛和莫菲坚持名称的必然性以及它们自身内部所具有的那种解构逻辑，坚持一种普遍化的象形逻辑。对他们而言，历史可以被描绘成一种双重过程，借助这一过程，诸种力量便既可用能指铭写自己的名称，又可用能指消除自己的名称。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自由主义”这个能指分别被包容关系和排他关系所界定。作为一个能指，当自由主义空虚无义的时候，它在模拟共识、统一其指涉对象过程中，最具意识形态效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个能指非常含糊和不稳定时，对承载其身份的行为者来说，便是最透明的时刻。拉克洛和莫菲断言，当同一性要在偶发性和不完整性中协商出来时，激进式民主便更前进了一步。

他们的观点中存在的这一问题必须予以注意。对理论与社会的某种镜反作用潜入了他们的话语：解构理论揭示的是一个可解构的社会世界。例如，他们争论说，非话语的实践说到底还是话语的，因此他们便批判了福柯对话语实践与非话语实践的区分；“如果我们分析了所谓的非话语性复合体——公共机构、技术、生

产组织等等，我们便只会发现客体之中差别性立场的复杂形式……这些形式只能……被构想为话语的表述。”[22] 拉克洛和莫菲坚决认为，因为社会只有通过在话语中表现为差别关系，才变得有意义，所以福柯不可能假定一个非话语的王国。于是，文本之外，更具体地说是解构性文本之外，不存在任何东西。如果确实如此，封闭性便再次被引入拉克洛和莫菲的观点。为了使社会领域能完 140
全经得住解构策略的检验，他们压抑了非话语的存在。收买解构主义社会的代价是将解构主义文本的思想策略总体化。因此后现代主义退守着现代主义者试图“缝合”或控制其客体的这一理论冲动。福柯的观点是，即便只是把它当作一个非可理解性（non-intelligibility）的视界，非话语的存在也应保留一席之地，我认为，他的这一观点对于节制人们对总体化的冲动具有优势。

社会新运动中存在着霸权身份互相争执的政治趋势，拉克洛和莫菲注意到了的这种趋势，并以此寻求自我保护，免于本质主义的重新潜入。他们断言，现在的“地形（terrain）”已不再适合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但是现有情境的哪些特征能够证明这种判断言之有理，他们却并没有充分描述。后结构主义的诸种概念之所以能够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是因为在促使社会领域具有可理解性方面，前者的权力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拉克洛和莫菲的理论介入可被读解为一种哲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者乞灵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力量，因此拉克洛和莫菲在与他们辩论时，便能够更多地基于理论而非基于语境挑战他们的观点。[23]

他们的理论倾向于将自己表现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我认为，要想瓦解这种倾向，还必须采取另一种措施。我所提出的信息方式，将一种语境偶发性引入了解构主义霸权的策略中。换言之，通过电子媒介语言的铭写，社会世界被文本化为一种有利于后结构主义阅读策略的形式。信息方式的语境给这些策略赋予了某种普泛化力量（generalizing force），又将一种历史化偶发性注入了这些策略。因此，他们的真理要求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既非“通用的”又非“相对的”。于是，理论家拉克洛和莫菲并没有作为一种固定的、超验的能指被嵌入话语之中。

利奥塔论后现代性

就福柯、德勒兹／瓜塔里和拉克洛／莫菲而言，走向后现
141 代政治理论的这一倾向所涉及的有权力与抵抗的场所的多重化，还有将社会复杂化、使之摆脱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理论桎梏，以及把它重新界定为偶发性、缺席和语言不确定性的一个定点（locus）的努力。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在其最近的著作中亦表现出相同的趋向，他把政治作为后现代性的难题，并对此进行极为明确的探讨。《后现代状况》（1979）和《歧见》（1983）可以阐释为开辟政治新领域的严谨之作。正如我在前几章中已讨论的其他后结构主义者一样，利奥塔从语言角度，尤其是科学话语的角度界定其主题。然而，利奥塔比其他理论家走得更远。他一方面在语言与电子中介之间明确地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又在语言与当代

社会语境之间建立联系。从这一意义上讲，利奥塔，尤其是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已经非常接近我在本书中所界定的信息方式这一可能命题。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的开篇第一句，就鲜明地提出这一论题："此研究的对象是最高度发达的社会中的知识状况。"[24] 利奥塔将"知识"视为科学，尤其视为自然科学，将这类话语的巨大重要性注入当代事件及制度的所有维面。今天的科学不仅仅是一系列学科，分门别类地存在于高等教育机构的不同院系中，而且是一种为经济、军队和国家提供基本知识的力量。甚至社会科学学科也是按它们的方法与"严密科学"学科的方法的接近程度来衡量其合法性，衡量其种种努力的地位。正如劳丽·安德森（Laurie Anderson）所赞颂的那样，我们已处于"大科学"时代。科学家自称他们的工作在方法论上受实验室、专业会议和专业刊物的陈规惯例的限制，且这些陈规惯例严格区分了他们的所作所为，而这种区分的依据是从认识论角度看"较不重要的"技术运用活动。当科学家们自己如此表白时，他们实在太过谦虚。几十年前，加尔布雷思（Galbraith）就在《新的工业国家》一书中提出"科技阶层（the scientific estate）"这个名称，承认科学具有越来越显著的社会意义，他甚至还暗示这个阶级是新的统治阶级。[25] 带着这种诡诈的谦卑，科学家对自己享有这样高的地位、接受丰厚的联邦政府资助，且断然拒绝承担社会责任，绝大部分都感到心满意足。

利奥塔关注当代科学的这两个特征：它的合法化约定

（protocals）以及它与电脑的关系。通过对这些主题的分析，他为自己关于后现代性的论辩奠定了基础：一个新的政治纪元来临了，
142 这个纪元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雅各宾主义和列宁主义，两个世纪的现代性。《后现代状况》中的主张包揽一切，其语锋也咄咄逼人。它对读者展开广泛挑战，把他们从自鸣得意的现代主义昏睡中唤醒，促使他们思考这种可能性，即一些根本性的变革正在毫不引人注目地悄然发生，而且频率越来越快。其后的著作《歧见》可说是更严谨地发展了他在1979年所提出的主张的哲学基础。《歧见》也放弃了早期的某些立场，倾向于采用一种更少全球化、更少社会学意味的方法。在这点上，我将先后从合法化问题以及电脑化论题这两方面考察利奥塔对科学的批判。

利奥塔断言，存在着一种极端情境，存在着一种“叙事危机（crisis of narratives）”，较早时期的宏大视角已不再可以相信；这种判断便是他在《后现代状况》中所作分析的基础。要想令怀疑主义者感到满意，便要对这一判断进行验证或例证，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否定这一判断。然而，如果这一判断能被接受，利奥塔观点的重要主张就变得迫在眉睫：我们也许已处于一种全新的“后现代”情境中，面对着性质上全新的可能与挑战。他竭尽全力阐释他的危机判断，但他也注意到他的话语是一种“策略”（第7页，译按，指英文版页码，下同），是他采取的一种立场，注定要引发争议，甚至会招致批判与反驳。利奥塔从好几个思想领域援引证据以佐证他有关危机的观点，然而，他最有力的论点都与科学自身有关。

以我们认为最为典型的后结构主义转向为例，利奥塔争论说，在后现代时代，社会分析的决定性层面是语言。其所以如此的理论原因是，媒体的兴起赋予语言以一种新的显著性（第 16 页），而其逻辑原因则是“语言游戏是社会得以存在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关系”。（第 15 页）在利奥塔看来，分析当代社会的这一语言成分便揭示了一个本质上的新情境的主要原则：通过叙事与科学的总体化或统一化话语的瘫痪，开始走向一种多重性的文化。

利奥塔对叙事与科学的区分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对神话与启蒙的区分，有着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两者都在话语层面上对前现代与现代加以区别，并作了比较。《启蒙辩证法》写于 1944 年奥斯威辛时期的沉郁心情下，当时盛行以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观点对神话和启蒙进行阐释或综合，该 143
书对此予以痛斥。对自然的启蒙支配竟辩证地变成了一场对人的支配这场噩梦，几乎没有希望看到辩证法在将来会有比较美好的转向。[26] 在《后现代状况》中，科学与叙事的关系更加复杂。科学对叙事的要求是它的合法化功能：“如果不诉诸另一种知识，即叙事性知识，科学知识不可能明白也不可能使别人明白其自身就是真知，而从科学知识的观点看，叙事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第 29 页）在最近几年，科学的这些元叙事，如关于进步的故事（story），已经丧失了连贯性。对利奥塔而言，这个危机中至关重要的是新兴了一门新科学，一门基于新叙事类型的后现代科学。

利奥塔把科学与叙事作为不同类型的话语加以区别，它们有着不同的语言“语用学”或语言游戏规则。在传统的叙事中，社

会中的任何成员都可能占据言说者的位置。叙事的言说者、听者及指涉对象是流动的，人们轮流承担每一职能。在这些面对面的际遇中，社会借助于叙事的反复申说就能被再生产了，并不需要一种单独的话语使该叙事合法，而且只要否认故事的重复与早期实例有任何差异便可创造一种循环的暂存性（cyclical temporality）。与此相对的是，科学知识有着不同的逻辑：它只允许唯一的一种语言游戏，即外延游戏，它创造了一种与社会互为外部的关系；它只对科学家或言说者而不对听者提出资质（competence）方面的要求；至于汇报其发现结果这种行为，它则没有对此赋予任何特殊价值；并且，它的话语暂存性是线性的，而非迂回的。

尽管科学对叙事话语要求苛刻，但在某个特定的意义上，科学还得依赖叙事：即科学要想合法化，便要依赖叙事。利奥塔争论说，自柏拉图以来，科学便在叙事中寻求立足点，在一种自身不具科学性的话语方式中寻求立足点。直至最近，这层关系的再生产仍是哲学的任务。哲学学科之所以变成主导话语，其部分原因就在于它自身扮演的角色便是为科学提供立足点。在《后现代状况》中，利奥塔区别了两种为科学提供立足点的哲学叙事：英、法、美的进步观念（第 31 页），以及德国促进民族素质的教育观念（第 34 页）。然而，利奥塔的目的并不是从叙事角度重述科学
144 史，而是要指出科学的这些叙事已不再可靠。利奥塔问道：当科学规划失去合法性时，科学以及如此深深依赖着科学的社会，其情形又会如何？我接着他的这个问题问下去，便提出本书的中心问题：当生成和撒播科学的电子手段方便可用、处处行使之时，

又会发生什么呢？[27]

利奥塔设想，今天的科学处于多重语言游戏这种后现代状况下："科学只能玩自己的游戏；它不能使其他语言游戏合法化。"（第 40 页）由于科学没有其自己的合法化叙事，因此它便退守到自身中。这一情境为"种种新语言"的扩散开辟了话语领域，而这些新语言中没有一种是被宏大叙事所合法化了的，也没有一种语言要求被如此合法化："这就是后现代社会意味着的一切。大多数人对消失了的叙事已经丧失了怀旧感。但这绝不能表明他们就得回到野蛮状态。拯救他们免遭此难的，是他们知道合法化只能产生于他们自己的语言实践和交流互动。"（第 41 页）因此，利奥塔以他自己的方式使非合法化的状态合法化了，这种非合法化的状况也就是指语言游戏无限扩散的后现代状况。

利奥塔使人注意到，在后现代状况下，科学中的合法化状态有两种倾向，它们似乎在相互矛盾的不同方面发挥作用。首先，有些科学逐步产生了性质的诸多形象和自我证实，它们进一步验证了后现代状况。其次，科学拓展了它与科学的关系，拓展了它与社会的行事性（performativity）或工具性的关系。

科学研究中的，往往是物理学研究中的，某些新趋势的理论意蕴让利奥塔非常着迷。起码自维纳·海森伯（Werner Heisenberg）提出测不准原理（indeterminacy thesis）以来，把客观真理的进步作为科学的元叙事已经受到质疑。人们不再能够认为以主体资格出现的（*qua subject*）科学家与被研究的客体有着认识论上的迥然不同。科学实验生成的知识所具有的地位也只不过

是另一场语言游戏，一种真理形式，这种真理被该游戏中的言说者群体所证实，但从任何意义上讲它都不是客观的普遍真理。利奥塔援引科学内部的最近发展，进一步使科学的元叙事，尤其是实证型科学的元叙事失去稳定性。曼德尔布罗（Mandelbrot）的“散碎物”（fractals）和勒内·汤姆（Rene Thom）的灾变理论（catastrophe theory）正在“使知识这个词的意义发生变化，而同时也说明了这种变化如何发生。[它们]正在生产未知，而不是已知。”（第60页）这种后现代科学产生了合法化的一种新叙事，有关“谬论”（paralogy）的“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也就是产
145 生了一种科学工作。这种科学工作并不要求人们注意它的指称陈述，而是关注它对规则的要求，亦即对“规定性表达”（prescriptive utterances）的要求。对科学而言，这些表达是必要的，但它们自己并非科学。

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也质疑了科学的纯指称状态以及科学元叙事的有效性，而令人吃惊且令人遗憾的是，利奥塔并没有在这样的语境中提到女性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凯勒（Keller）等人已经证明了科学与主/客体二元论之间的关系，这种主/客体二元论则把知识看成是对自然进行控制的根据。[28]女性主义者提出要新创一门科学，它与自然应具有一种新的非支配性的关系；利奥塔认为后现代科学是多重叙事。因此女性主义的这个提议与利奥塔的观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应当构成他的批判的一部分。令人痛惜的是，利奥塔与本书所论的其他理论家一样，无论是从整体上还是从所探讨的具体论题上，都没有充分论述女性主

义的著作与观点。

利奥塔探讨了后现代科学，我则对信息方式进行研究。我们之间的主要联系在于以下这两个方面，即科学的电脑化这个问题以及这种电脑化在后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总的说来，电脑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的自始至终都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这也确实是该书的一个首要主题。然而，他对这种作用的看法非常矛盾。有时候，他把电脑构型为现代元叙事和社会实践的顶点，而另外一些时候他又认为电脑化促进了后现代主义。例如，利奥塔讨论了现代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指明科学是如何确认着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并依赖其社会关系的形式，而又因为它对自律的要求而始终否定着这些社会关系。在他看来，电脑在这种语境中起着重要作用：电脑就好像弥补装置一样，延伸了体系的行事性（第 44 页）。但是，利奥塔以一种海德格尔式的态度提醒我们，电脑技术只有在行事性已然是一般社会语境中的主代码（master code）时才会起作用。电脑加强了“语境控制”，即现存权力对偶然性所进行的奥威尔式清除（译按，指英国现代反乌托邦作家乔治·奥威尔）：

> 社会的普遍电脑化有可能带来的正是这种语境控制。一个表述无论是指称性的还是规定性的，其行事性都与人们所拥有的、可自由支配的、有关该表述的指涉对象的信息量成正比例增加。因此，权力的增长以及其自我合法化如今正走上数据存取和信息操作性这条道路。（第 47 页）146

在利奥塔看来，以电脑武装起来的现代科学给自由带来了极具危险的威胁。

电脑化理论——控制论——为系统控制提供了一个模型，它把偶发事件等同于噪音，等同于信息丧失。控制论的社会理想就是消除偶发性，最大限度地加强系统的控制能力。利奥塔争论说，电脑在促进现代社会的效率原则中起双重作用：一是作为理论，一是作为机器实践。在这两种情形中，他都没有系统地或详细地分析电脑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只是一带而过地提到了电脑化对科学所起的重要作用，对这种作用的性质又没有加以说明。《后现代状况》作为一部有关知识状态的主题论文，我们也许不能对它有更多要求。然而电脑化与社会这一问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人们对此论题作进一步考察。利奥塔已经阐明，控制论是一种新的语言游戏，对科学具有很高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问，它到底重要到何种程度？控制论所调控的是科学中的哪些话语领域？它们对当代社会中科学的总体命运具有何等重要性？控制论的理论与科学家们使用电脑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种理论的成功是否会影响到电脑技术的传播？或者是否刚好相反？这种技术对这种理论的影响是什么？

电脑科学与后现代主义

为了探讨电脑与科学的关系这一问题，我对电脑科学（Computer Science）这一学科进行了简短的研究。我查看了针对

电脑科学的定义这个问题的文章。我特别查阅了过去二十年来登载在《计算机协会情报检索》中的图灵奖论文。[29]这些奖项荣誉最高，授予在电脑科学领域做出杰出成就的人。获奖者提交一篇讨论学科现状的论文。我翻阅了这些论文，它们力图界定电脑科学领域中知识的类型，提供该学科的奠基陈述，并对电脑科学生成 147
特定知识的能力加以确定。虽说大多数论文在探讨这些问题时并没有深入下去，但也确实表明了一般性的奠基主题：电脑科学领域的特点可归纳为一台机器，即电脑，这一特点无疑是很独特的。在 1966 年寄给该刊的信中，杰克·卡尔森（Jack Carlson）表露他对该领域的这一侧面感到窘迫："创立电脑科学……就类似于新设铁路、汽车、无线电、飞机或电视技术系一样。"[30]对一台机器的集中探讨也能建立成一个科学领域，并且该学科也把自己界定为这种集中探讨，唯一的例子无疑是电脑科学。其他科学研究自然或人类，而使电脑科学的语言游戏合法化的，却是电脑这个机器性的叙事客体。

电脑就是电脑科学话语的指涉对象。于是乎，它便处于想象界的位置，这个想象界是指这门科学的虚假认识之镜，并且它还被赋予了极大的意指权力，具有了超验的地位。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在某种程度上，电脑科学之依赖电脑犹如小孩依赖其母亲。电脑科学家不可能逃避与电脑的关系；他或她的身份与电脑绑在一起了。随着电脑科学领域的发展，通过学科实践构建电脑科学家的方式可能更加新颖，而电脑科学与电脑的关系却仍是一种误识（misrecognition）。由于电脑科学是通过它与电脑的关系才找

到其首要身份的，因此这种身份便是该领域的学科约定（protocol）之一部分；即便该学科的这一实际客体，即电脑，在多少年的时间中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甚至变得面目全非难以辨认，这种身份仍应如此。

由于电脑是工业和政府的有用之“物”，电脑“科学家们”便对其学科的认识论纯洁性这一问题特别敏感。路易·费恩（Louis Fein）一再致函《计算机协会通讯》，表达他对该领域的含糊地位感到恼丧：“我们的这门科学应当像其他科学一样，保持其推进真理与知识这个唯一的纯理论目的。一个机构竟能同时扮演一种职业、一项工业和一门科学这三个角色，这一点我百思不解。”[31]因此，电脑科学所要求的便是一个稳定的身份。这一点，正如图灵奖获得者莫里斯·威尔克斯（Maurice Wilkes）所争论的那样，只能通过机器才能维持：“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并不是什么抽象理论……而是我们每日都要打交道的实实在在的硬件。”[32]又如另一
148 位获奖者 R. W. 哈明（R. W. Hamming）坦言，“电脑科学的心脏是一个技术装置，即计算机。”[33]

如果电脑科学的核心是一台机器，那么这门科学与这方面的科学家之间的界线又该如何划定并保持呢？另有一封彼特·丹宁（Peter Denning）的信，他所表达的正是这种对机器与电脑科学家之间界线丧失的焦虑：“由于不了解电脑科学的抽象作用，于是我们就冒着这样的巨大危险，即我们把工具创造为我们的主体，而我们却认识不到何时我们将变成这些工具的主体。”[34]1976 年图灵奖得主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和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正是试图把电脑科学界定为人与机器的统一："机器——不仅仅是硬件，而且还有被编程了的活机器——便是我们所研究的有机体。"[35]然而，在他们看来，语言具有字面意义上的物质性："智力存在于物理符号系统中。"对"语言"的解释也是算法式的：只是"执行"了程序所设计的步骤。换言之，语言是公式化的，最多也不过是封闭而无歧义的。

于是，电脑科学便是一种处于词与物的界线上的话语，是一门危险的学科，因为它建立在对科学家与其客体的混淆上。科学家的身份与电脑是如此接近，以致镜映作用（mirror effect）很容易就能得到发挥：科学家将智力主观性投射到电脑上，而电脑接着竟变成界定智力、判断科学家、描述人性本质的标准。确有一位图灵奖得主做如此暗示。1987 年，约翰·霍普克罗夫特（John E．Hopcroft）写道：

> 如果电脑科学的潜力得以充分探索和开发，它将会把我们的世界知识提高到另一个层次。电脑科学将有助于我们更加理解智力过程，它将会加强我们有关学习过程、思维过程、推理过程的知识。电脑科学将会为认识科学提供模型和概念工具。在本世纪中，随着研究人员对物质本质和宇宙起源的探究，物理科学已经支配了人类的智力举措；同样，我们如今正在开始探索种种观念的、知识结构的和语言的这个思想领域。[36]

在此，为电脑科学想象出来的基础竟然找到了牢固的位置，并被

本质化成一种占据精神领域的封闭话语。“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
149 都是活人的鬼魂（doppelgangers），彼此亦步亦趋地模仿，人们几乎不能区别它们。

通常认为，电脑科学领域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硬件与软件，或指涉中心是机器的人与关注焦点是人工智能的人，或工程师与数学家。但是这种对立虽然在某个层次上很重要，却掩盖了对人／机关系的某种共识。科学的电子化呈现为电脑形式，这便在精神与物质的边界上生成了一种话语，如此一来便使这两者间的区别非稳定化。有一种极易变化的话语情境总是侵扰电脑科学领域，所以，虽然有人站在机器一边，另一些人在“智能”一边，但双方都得有所让步，都不能很好地守住那种差异。工程师围绕机器这个符号划定该领域的界线，而数学家则围绕人脑这个符号。霍普克罗夫特在上文所引段落中表明了后一种选择，他把人工智能这种语言游戏等同于人类智能。他争论说，当我们开发电脑语言时，我们不仅仅是在发明新话语，而且也是把人类精神客观化。电脑科学的话语明显不是利奥塔意义上的后现代式的，而是确凿无疑的逻各斯中心的。

在一个更平淡陈腐但绝非不重要的层次上，电脑如今对工业和军队很重要，利奥塔已指出这一点，而且对科学本身也是如此。例如，如果没有电脑，曼德尔布罗的著作便是难以设想的。无论是与行事性紧紧相连的科学，还是有关“小叙事”和“谬论”的后现代科学，都得依赖电脑发挥它们的作用。我们需要充分考察这种依赖性，考察电脑对研究进行构型的方式，考察它作为一种

学科话语 / 实践的权力效用，考察它作为一种语言游戏的合法化效用；人们还需要重构它的中心化和本质化的文本性所产生的边缘化效用。

歧见与社区

最终，《后现代状况》还是以一种直觉为基础，这种“弱”主张困扰利奥塔的程度似乎本不该有这么严重。[37] 利奥塔自认为是一个“哲学家”（第 xxv 页），把自己归附于一个悠久的传统，该传统的覆盖范围始自柏拉图和前苏格拉底时期。种种直觉、明显招致争议的判断以及超越自身的陈述等都不能以推论佐证自身的主张，该传统可不那么容易就会接受它们。利奥塔时常流露出对哲 150
学学科感到不适，例如他抱怨柏拉图式的论辩具有某种强制性质。[38] 然而他仍毫不犹疑地把自己界定在哲学的学科内。

在《歧见》中，利奥塔更坚决地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哲学家。他收回早期作品中某些可能被认为是过分的地方，并且所进行的论辩也很像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表述。例如“习语”（phrase）已变成任何话语逻辑上不可缩约的基础，它从话语中自然流出，其方式有明显可辩的“哲学味”。但是如果当代话语受着元叙事危机的条件制约（conditioned），哲学家的位置是否也必须受到质疑？起码从马克思和尼采以来就已有一大批思想家在这样做了。有一种含混不清很麻烦，它颠覆了利奥塔的文本：他想被承认为一个哲学家，但他的论辩却拒绝通常给予哲学家的那种认识论身份。

《歧见》临近结束之时，某种不安已侵扰读者。利奥塔站在所有致力于共识和总体化的一统观念的论点（尤其是哈贝马斯的论点）的对立面，因为这些一统观念降低人们以不同立场进行阐述的可能；他声称要促成语言游戏的多重性，促成接受这种多重性的公正性。然而，要求后现代中差异应该喷泻不羁这个要求本身就不是这些语言游戏之一，而是凌驾于其他陈述之上的一种元陈述，使话语的扩散合法化。利奥塔注意到了这种两难，而尤其因为他披上了哲学家的外衣，这种两难更使他的话语失去稳定性。我认为，这种两难是一个白人男性理论家的两难，他支持异质性喷发而出，但却缺少坚实的立足点使他能坚持到底。异质性（heterogeneity）亦即对他者的证实，这是女性主义者和特称话语的典型特点。在《歧见》中，利奥塔的内部张力变得很强烈，他的阐述主张越来越像哲学家，而他的论点却坚持要越发有系统地将歧见的不相容性合法化。[39] 这是一种根本无法减少的张力，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说，它也许是不能决定的。

事实上，利奥塔也注意到了哲学与父权制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关系。在《异教主义基础》（*Rudiments paiens*）一书中，他集中整整一章笔墨探讨父权制这一问题，并引用埃莱娜·西苏（Helene
151 Cixous）和露丝·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他使哲学担负起区别男性/女性的责任，并证明哲学话语何以与父权制密不可分。对他而言，哲学是元陈述的话语，与普通言说迥异，而元陈述则假定了男性的位置，即男人自由交往的社会根据，这在早如古希腊时就已存在。在这一语境下，女人代表的是

一种差异观点，这一差异必须受到哲学的压抑。因此，利奥塔写道，“如果女人的差异被中性化了，她们也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一部分”。[40] 于是女人便处于利奥塔后来定义为“歧见”的位置上。然而，在其 80 年代的著作中，女性主义批判这一主题虽然表面上看来很合乎利奥塔的涉猎范围，但却没有明白显示在其著作中。

《歧见》呼吁人们回归哲学：利奥塔宣告，“该是进行哲学探讨的时候了。”[41] 这种回归是针对他的前一部著作，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的前一本书（译按，《后现代状况》）是一篇知识社会学方面的论文，并从总体上反对后结构主义把哲学传统看作问题而非可以援用的手段。利奥塔对哲学家的定义多少有些不循常规，他把哲学家定义为一个不“预先假定他［原文如此］自己的话语法则”的人（第 xiv 页），他还明确区分了哲学家与可能会做出如此预先假定的理论家。该书的主要主题便是对“歧见”进行哲学探讨。利奥塔把“歧见”定义为互不相容的差异，是“矛盾的一种情形……因为缺少能适用于双方论点的判断准则，所以它不可能得到解决”。（第 xi 页）《后现代状况》中以语言游戏面目呈现出来的，如今又被利奥塔更为准确地归纳为歧见这一主题。

有一个歧见的例子贯穿全书始终，那便是犹太人在奥斯威辛所遭受的磨难。利奥塔有关奥斯威辛的讨论很容易受到误解，并且他选择这一话题也许并不明智。但是奥斯威辛对他阐述歧见的某些特征很重要；“［以色列］建国以前在奥斯威辛所蒙受的冤屈的现实一直就是有待证实的，而且仍然有待证实；因为这种冤屈的性质并非共识所能证实的，所以它是证实不了的。”（第

56 页）在歧见中，差异的现实从本质上讲是“非可裁决的（non-adjudicable）”，对利奥塔而言，在这点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奥斯威辛更说明问题了；“有了奥斯威辛，历史便发生了某种新的变化……也就是如下的一切都被极大地摧毁了：诸多事实、带有此地和此时的痕迹的种种证词、表明这些现实的某种意义或种种意义的诸多文献、诸多名字，以及各种不同种类的习语的可能性等，这些
152 习语的联合构成了现实。”（第 57 页）于是，奥斯威辛便是一个无法“被证明的”冤屈之名：“习语的认知体制（cognitive regimen）被赋予了一种对历史的垄断权，历史学家必须结束这种垄断，必须大胆向前，倾听知识法则下不能呈现之事。”（第 57 页）

于是，犹太人对利奥塔说来便很重要，是现代（the modern）的边界个案（boundary case）。他们在政治理论中界定了现代的界限，因为他们所受的不公不可能被包容在理论范围内。这一论点在他最近出版的《海德格尔与“犹太人”》（*Heidegger et “les juifs”*）一书中得以展开。在该书中，利奥塔争论说，现代政治的特点是“恐怖主义的”话语，这种话语压制任何暗示它缺乏根据的言说，从而一直否认它自身缺乏根据。现代主义“根除”一切使之相对化的行为，因而赢得了合法性。犹太人在这场语言游戏中扮演了一个悲剧角色：“西方的‘精神’是为其自身确立基础，就此而言，‘犹太人’则抵制这种精神……沉迷于支配则不可能将他们驯化……”[42] 犹太人以现代缺乏根基而威胁西方，这令人想起一种不足，一种不可能被整合或压抑的不足。要想颠覆现代，侵越其可怕的边界，人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解除其压抑，找到一种途径表

现其话语约束内不能呈现之事。[43]

在该书后面部分，利奥塔使哲学承担起这一任务：呈现不能呈现之事。“面对思想，我们的责任在于……发现歧见，并找到描述它们的（不可能的）惯用语（idiom）。这才是一个哲学家所要做的。一个知识分子则是一个帮助人们忘记歧见的人。”（第142页）确实，80年代巴黎的知识分子与哲学界都特别迷恋于表现一个不能呈现的话题：德国法西斯主义。德里达在《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De I'Esprit: Heidegger et la question*）（1987）中，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在《政治的虚构》（*La fiction du politique*）（1987）中，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马丁·海德格尔的政治本体论》（*L'On-tolgoie politique de Martin Heidegger*）（1988）中，以及许多其他人都挖掘法西斯主义这一论题，探究那场大浩劫的意义，探讨海德格尔（因此也就是哲学）对纳粹主义的潜含意义这一问题。这种非同一般的兴趣汇合本身就已是不能呈现的事实之一例，或者也许可说是巴黎的小小神秘的一个例子。发现保罗·德·曼（Paul De Man）早期写给比利时通敌期刊的文章纯属偶然，这使得知识分子的处境这出戏更加起伏跌宕。[44]最终，利奥塔把不能呈现之事的领域的领土问题搁置一边，留给哲学与历史学在将来争论。 153

尽管利奥塔在《歧见》中避开了后现代主义的话题，早期著作中的有些主题还是再次出现了。在《歧见》中，认知知识仍然是“极权的”。在这两本书中，实证主义的知识观都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托真理之名调控现实并减少或消除存在的诸形式。认

知知识，无论是在为了国家监督服务的电脑化数据库中还是作为科学的元叙事，都把存在的界限划在它所能理解的范围。因此，利奥塔把政治定义为歧见，定义为抵制“知识”内部合并的努力——“政治……是歧见的威胁”（第 138 页）——于是也就产生了这一特别引人注目的观点：奥斯威辛是一个不可能“被人认识的”冤屈。如果知识具有某种连贯性，那么自由是对多样性、异质性和差异的认可这一主题也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歧见》中的新焦点是异质的存在与习语之间的关联这一论题。

关联这一问题为本书提出最后一个论题：信息方式下的社区问题。社会批判理论的传统一直提倡消除社会领域中的支配性，着眼于推进一种透明的社区，在这种社区内，人类能够调节自己的关系，尽量不受社会造成的等级制或失称（asymmetries）的干扰。支配性在个人与团体之间设置了层层障碍，把社会划分成阶层，产生了矛盾与对抗。社会批判理论家们最近讨论了社区这一主题，讨论让人强烈地感到，人们必须放弃马克思主义的社区之梦，因为它只是时过境迁的怀旧残余；马克思主义所梦想的社区，是一个由生产者组成的自我调节的社团，或者更广义地说，是任何一种乌托邦形象，即个人可以通过组织紧密的面对面的社区达到自我实现。[45]

利奥塔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的社区观念，其理由用康德的术语便是，社区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一个概念。马克思误以为他能够在理论上建立一种能够通过社会行动实现的社区模式。然而“社区”不是认知性的，而是伦理—政治的。它要求的是规范性

（normative）陈述，而非描述性陈述。利奥塔指责道，“革命性政治所依赖的是政治王国中的超验幻象：它把可呈现之事混淆为思辨习语和/或伦理习语的对象；也就是说，它把图式（schemata）或范例（exampla）与类比（*analoga*）相混淆了……”[46]对于后现代的批评家而言，社区仍然是一种非可呈现的规范（nonpresentable norm），这种规范只能以话语内部的政治手段进行维护，而不可 154
能被理性地合法化。但是，对社区的这种批判所依据的，是对认知陈述与伦理陈述的区别，这种康德式的区别仍有疑问；对此，利奥塔也没有令人满意的解决。

利奥塔还一反公有社会的传统，争论说，和睦与共识的努力是支配的一种形式，而分野和对抗才会容许对立的话语群体自由发展。70和80年代出现了多种不同的抗议中心；在这样的政治语境下，利奥塔倾向于多样性的观点值得注意。除此以外，信息方式也对多重的、去中心的、被消散的主体进行话语构建，因而就支持了歧见的反总体化层面。然而，准自律的（quasi-autonomous）话语立场或歧见之间的矛盾这一政治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利奥塔朝着后现代政治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是拒绝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现代性的一统化倾向的一步。但下一步仍不明确。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结束时开出的药方是“让公众自由进入存储器和数据库”（第67页），尽管这是一副有益的良方，但并没有朝着后现代正义方向行进多远。

要想对后现代政治这一论题进行更全面的探讨，就不得不面对信息方式的种种分裂冲动这一问题。为多样性社区进行辩论是

一回事，而要面对这种多样性的不可能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社会批判理论所假定的社区基础是面对面的互动交际（interactions），假定着一种口语交流的最小网络。社区在1789年的雅各宾人俱乐部中是可感可触的（男性的？）社会力量，而在此之前则存在于“文艺圈子和社团中、共济会馆中、种种学会中，以及爱国者和文化俱乐部中……”，[47]存在于1917年的工人议会中、存在于过去两个世纪中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文化中的咖啡屋和酒馆中。电子媒介交流在某种程度上增补社交的现存形式，但在另一角度又替代着这些形式。新的社区模式正在形成过程中，尚难以辨认，还很难看出这些模式到底会如何促进或毁损后现代政治。从1789年的巴士底狱，到1968年的索邦大学，人民走上街头，形成动乱，这种形象可能不会在21世纪以及以后重复了。

注 释

导论

① 参看 11 月 9 日、23 日和 25 日《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上的文章。

② John Markoff,《电脑病毒使专家束手》(Computer Viruses Thwart the Experts),《国际信使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9 年 6 月 9 日,第 12 页。

③ Paul Brodeur,《辐射连年:电磁场的危害》(Annals of Radiation : The Hazards of Electromagnetic Fields, Ⅲ-Video Display Terminals),《纽约客》(*New Yorker*),1989 年 6 月 26 日,第 39 页及以下。

④《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1987 年 10 月 18 日。还可参看《时报》有关 1986 年 9 月 12 日那次较早的小规模瘫痪的报道,其中有这样的话"电脑的广泛使用导致这场滑坡"。

⑤ 卡罗琳·马文(Marvin Carolyn)著,《当旧技术还是新的时候》(*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年版,第 4 页。

⑥ 同上,第 107 页、162 页。

⑦ 同上,第 190 页。

⑧ 有关这些事件的细节,请参看 Luigi Albertini 著,Isabella Massey 翻译并编辑的《1914 年战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he War of 1914*),New York: Oxford,1952—1957 年版,第二卷,第四章,第 120—179 页。

⑨ Elizabeth Eisenstein 有力论证了这种影响,参看她的《作为变化行动者的印刷机》(*The Printing Press as an Agent of Change: Communications and Culture Transformations in Early-Modern Europ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年版。

⑩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他最近的几本书中对此术语作了很有成果的阐述。如,《民族国家与暴力》(*The Nation State and Violence*),Cambridge: Policy,1986 年版。

156 ⑪ 采取此观点的先锋杂志是《绝对音响》(*The Absolute Sound*)，它的编辑 Harry Pearson 敢作敢为。自从 70 年代后期，这本发烧友的“地下”刊物便以追求在家中完美再现音乐为其宗旨。(译按，此注释未全译)

⑫ 他的原话是“人将会被抹去，就好像留在海边沙滩上的一张脸”。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物的秩序：人类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New York: Pantheon，1970 年版，第 387 页。

⑬ 对作为男性文化的笛卡尔式文化所进行的出色分析，参看 Susan Bordo，《向客观性遁逃》(*The Flight to Objectivity: Essays on Cartesianism and Culture*)，New York，Albany: SUNY Press，1987 年版。

⑭ 对金钱与写作所做的精彩论述，可参看佳·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的论文《对阅读马克思的沉思》(*Speculations on Reading Marx: After Reading Derrida*)，收在 Derek Attridge 等所编的《后结构主义与历史探索》(*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Quest of Histo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版，第 30—62 页。

⑮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著，《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年版，第 60—61 页。

⑯ 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著，《话语 / 反话语》(*Discourse/Counter-discours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ymbolic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第 43 页。

⑰ Robert Hurley，Mark Seem 和 Helen Lane 译，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力克斯·瓜塔里(Felix Guattari)著，《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 Capitalism*
157 *and Schizophrenia*)，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 年版；以及 Brian Massumi 译，《千座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年版。

⑱ Bernard Wall 译，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著，《人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Man*)，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61 年版。

⑲ 对这些论题很有启发的讨论，可参看 Dana Polan 的论文《短暂际遇：大众文化与感觉的抽空》(Brief Encounters: Mass Culture and the Evacuation of Sense)，收在 Tania Modleski 所编的《娱乐研究：大众文化的批判方法》(*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ass Culture*)，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86 年版，第 167—187 页。

⑳ 对此论题进行的出色讨论，可参看 Andreas Huyssen 的论文《作为女人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 as Woman: Modernisrn's Other)，收在 Modleski 所编的《娱乐研究》第 188—207 页。

㉑ 女性主义也转到这个方向上来了。例如，可参看朱丽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著，Margaret Waller 译，《诗歌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 年版；和 Thomas Gora 等译《语言中的欲望》(*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0 年版；以及海伦·西苏（Hélène Cixous）和凯瑟琳·克莱门特（Catherine Clement）著，Besty Wing 译，《新出生的女人》（*The Newly Born Woman*），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 年版；露丝·伊里加雷（Luce Irigaray）著，Catherine Porter 译，《这种不算一种性别的性别》（*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在这方面还有一篇有趣的论述，参看 Leslie Rabine 的论文《女性主义的无身份政治》（A Feminist Politics of Non-Identity），《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第 14 卷，第 1 期，1988 年春季号，第 11—31 页。

㉒ 这种策略进一步发展了 David Carroll 和 Suzanne Gearhart 的模式，他们结合了理论和经验材料相互攻击。

第一章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① 据我所知，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的首次使用是在 Alain Touraine 所著的《后工业社会：一种新社会的诞生》（*La Societe post-industrielle: Naissance d'une societe*），Paris: Denoel，1969 年版。他用这一术语来界定社会的种种新力量，而非分析社会结构本身。因此，可说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首次使用这一术语来界定这场争论。参看他的《关于后工业社会的几点说明》（Notes on 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刊载于《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第 6、7 期，1967 年冬季号及春季号，第 24—35 页和第 102—118 页。对后工业或信息社会理论的有趣分析，可参看 David Lyon 著，《信息社会：问题及幻象》（*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ssues and Illusions*），Cambridge: Polity，1988 年版；以及 Boris Frankel 著，《后工业乌托邦》（*The Post-Industrial Utopians*），Madison: University 158
of Wisconsin Press，1987 年版。

②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信息社会的社会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Informational Society），收入 Tom Forester 编，《微电子学革命》（*The Microelectronics Revolution*），Oxford: Blackwell，1980 年版，第 521 页。另可参看的《高科技社会：信息技术革命的故事》（*High-Tech Society: The Story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Boston: MIT Press，1987 年版。对于衡量“知识”增加的尝试，可参看 Fritz Machlup 著，《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2 年版。

③ 对贝尔经济观点的批判，以及对信息社会的前景较不乐观的评价，可参看 Jonathan Gershunny 著，《工业社会之后?》（*After Industrial Society?: The Emerging Self-service Economy*），New York: Macmillan，1978 年版；以及和 I. D. Miles 著，《新的服务经济》（*The New Service Econom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mploy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ies*），London: Pinter，1983 年版。

④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社会框架》一文，第 501 页；并可参看丹尼尔·贝尔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New York: Basic

Books，1973 年版，第 343 页。

⑤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 487 页。

⑥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的续编《资本主义文化矛盾》（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6 年版）中，贝尔指明了当今社会的动态冲突是中轴原则之间的断裂（文化享乐主义相对于民主政治和后工业社会结构）。在其早期著作中，社会结构（后工业社会）同化了其他的中轴原则，现在的这一观点与那种简化的论辩方法成截然对立。

⑦ 贝尔，《社会框架》一文，第 532 页。

⑧ 同上，第 507 页。

⑨ 同上，第 506 页。

⑩ “行事性的”（performative，译按，又译，“完成行为式的”、“述行的”）这个术语借用自约翰·奥斯汀（J. L. Austin）的《如何以言行事》（*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年版。行事性表述可以定义为以言词伪装着的行动。意义的惯例定义是词与物的对应，在奥斯汀的书中，行事性表述是指语言效果与意义的惯例定义不相一致的词语。

⑪ 对社会理论中的形象化想象的作用所作的重要阐述，可参看 Cornelius Castoriadis 著，《社会的想象制度》（*L'institution imaginaire de la societe*），Paris: Editions du seuil，1975 年版。贝尔话语的问题不是他使用了造型，而是他把这些造型呈现了理性的、科学的
159 决定因素，因此就混淆了他的话语域而引入完成行为式表述。

⑫ 当然，并非所有社会科学家都是如此。许多人在我之前就已首先提出这些问题，我在本书中始终都受益匪浅。在政治科学领域，例如 Micael J. Shapiro，已经在这个方向上进行研究，如《表征的政治：自传、摄影与政策分析中的书写实践》（*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Writing Practices in Biography, Photography and Policy Analysi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 年版；在组织理论领域，可参看 Robert Cooper 和 Gibson Burrell 的论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组织分析》（Modernism, Postmodernism and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An Introduction），见《组织学研究》（*Organizational Studies*），第 9 卷第 1 期，1988 年，第 91—112 页；在社会学领域，参看 Norman Denzin 的论文《后现代社会理论》（Postmodern Social Theory），见《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第 4 卷，1986 年秋季号，第 194—204 页；在地理学领域，参看 E. W. Soja 著，《后现代地理》（*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London: Verso，1989 年版。感谢 Pauline Vaillancourt-Rosenau 为我提供部分书目。

⑬ 例如，可以参看 Dallas W. Smythe 的论文《交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见《加拿大政治与社会理论学刊》（*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第 1 卷第（3）期，1977 年秋季号。他呼吁马克思主义者注意交流问题，但却又暗示使用经济简化论的方法。同样采取这类方法的有 Phil Blackburn，Ken Green 和 Sonia Liff 的论文《再结构中的科学与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Restructuring），见《资本与阶级》（*Capital and Class*），第

18 卷，1982 年冬季号，第 15—37 页。

⑭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首要原则是劳动力价值论，这也同样不适用于信息时代。正如马克思自己在《经济学手稿》中写道，一旦科学进入生产过程中，价值论就要失效。要想确定每个工人对财富的生产做出的确切比例，是不可能的。

⑮ 把信息并入市场体系并保护个人人权需要哪些新法律，已有许多研究和探讨。例如，可参看 Gary Marx 的论文《新型监督》（The New Surveillance），见《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1985 年 5—6 月号，第 43—48 页；David Burnham 著，《电脑国家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omputer State*），New York: Random House，1983 年版；James B. Rule 著，《私人生活与公共监视：电脑时代的社会控制》（*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Surveillance: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mputer Age*），New York: Schocken，1974 年版。

⑯ 当然，我并不指望把信息分析的经济维面完全排除出去。

⑰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 172 页；另见，《社会框架》一文，第 509 页。另可参看 Brian Winston 著，《误解媒体》（*Misunderstanding Media*），New Yor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6 年版；作者认为贝尔对媒体的影响的观点过于乐观，该书对此提出批判。 160

⑱ 贝尔，《社会框架》一文，第 509 页。

⑲ 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对人类的合乎人性的使用：控制论与社会》（*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New York: Anchor，1954 年版，第 15 页；控制论技术引起的中央控制这一问题受到 Abbe Mowshowittz 的批判，见其《对意志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Wil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Human Affairs*），Menlo Park: Addison Welsley，1976 年版；另可参看 Harlan Cleveland 的论文《等级制的黄昏》（The Twilight of Hierarchy: Speculations o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收入 Bruce Guile 编，《信息技术与社会转型》（*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Washington，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5 年版，第 55—79 页。

⑳ 维纳，《对人类的合乎人性的使用》，第 17 页。

㉑ 同上。

㉒ 参看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以及 Larry Hirschhorn 著，《超越机械化：后工业时代中的工作与技术》（*Beyond Mechanization: Work and Technolog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Cambridge，Mass.: MIT，1984 年版。

㉓ 参看 Rob Kling 对《超越机械化》的书评，见《科学》（*Science*）230（4729）期，1985 年 11 月 9 日，第 1031—1032 页。

㉔ 这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足够研究的重要现象。对发达技术社会中的脆弱性这一主题的讨论，可参看 Langdon Winner 著，《自律的技术：作为政治思想主题的技术失控》（*Autonomous Technology: Technics-out-of-Control as a Theme in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Mass.: MIT，1977 年版；在《鲸与反应堆》（*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中，Winner 展开上文的分析，集中探讨在信息方式下知识是如何变成政治性的。

㉕ 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话语 / 反话语》（*Discourse/Counter-discours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ymbolic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他在此书中对十九世纪法国的报纸进行了很引人入胜的分析，提出了这一论点。

㉖ 卡尔·马克思，《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Grundriss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artin Nicolas 译，New York: Random House，1973 年版，第 704 页。（译按，译文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下册，第 217 页）

㉗ 同上书，第 705 页。（译按，译文出处同上，第 218 页）

㉘ 同上。（译按，译文出处同上，第 218 页）

㉙ 同上。（译按，译文出处同上，第 217 页）

㉚ 同上，第 706 页。（译按，译文出处同上，第 219—220 页）

㉛ 同上。（译按，译文出处同上，第 219 页）

㉜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mo），《启蒙辩证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John Cumming 译，New York: Seabury，1972 年版，尤其是《附录 I：奥德修斯或神话与启蒙》（Excursus I: Odysseus or Myth and Enlightenment）。

161

㉝ 参看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理性与革命》（*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cial Theory*），Boston: Beacon，1960 年版。原版发行于 1941 年。

㉞《终端》（*Telos*），第 19 卷，1974 年春季号，第 13—90 页。

㉟ 重印在 Andrew Arato 和 Eike Gebhardt 编，《法兰克福学派必读》（*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New York: Urizen，1978 年版，第 270—299 页。

㊱《如何看电视》（How to Look at Television），刊载于《影视广播季刊》（*Quarterly of Film，Radio and Television*）第 8 期，1954 年，第 213—255 页。以《电视与大众文化的模式》（Television and the Patterns of Mass Culture）为题重印于 Bernard Rosenberg 和 David White 编的《大众文化》（*Mass Culture*），Glencoe: Free Press，1957 年版，第 474—487 页。

㊲ 阿多诺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可参看阿多诺等著，《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论辩》（*The Positivist Dispute in German Sociology*），Glyn Adey 和 David Frisby 译，New York: Harper and Row，1976 年版，原版发行于 1968 年。

㊳ 有关他的观点的最好陈述，参看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权力 / 知识：采访选编及其他》（*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Colin Gordon 译编，New York: Pantheon，1980 年版。

㊴ 该论文本来是题献给马尔库塞的，后来译文收入哈贝马斯《走向理性社会》（*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Jeremy Shapiro 译，Boston: Beacon，1970 年版；另外有 Cambridge: Polity 版。

㊵ 同上书，第 90 页。

㊶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Guenther Roth 和 Claus Wittich 编，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 年版，第 1 卷，第 4 页。

㊷ 例如，封建社会中的个人约束。在封建社会中，支配性被传统行动的手段合法化了。只要行动仍然基于过去的权威，那么由于不可能存在个人选择能力这个问题，理性便被预先慑服了。如果行动与行动的先存（pre-existing）类型一致，那么这种行动就是合法的；但是如果行动合乎个人利益时，或者至少在这一行动基础被认为是不合法时，个人就被认为是不具有判断能力了。韦伯的观点是，如果工具理性是行动的合法基础，那么封建约束就不可能运作。因此，使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个人支配合法化的社会体制与理性行动是互不相容的。所以，现代社会的最大希望是，由于它构建了工具行动，因此就摧毁了个人支配。 162

㊸ 韦伯在讨论俄国的社会革命时明确地提到这一两难。参看《经济与社会》，第 1 卷，第 225 页，以及全文各处。

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Objectivity’ in Social Science and Social Policy）一文收入韦伯的《社会科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Edward Sils 和 Henry Finch 译编，New York: Free Press，1949 年版。韦伯的原话是，“我们所说的‘理想类型’……与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关联……”第 98 页。

㊺《以科学为业》（Science as a Vocation）收入《韦伯文选：社会学论文》（*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H. Gerth 和 C. Wright Mills 译编，New York: Oxford，1958 年版，第 144 页，以及全文各处。

㊻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1 卷，第 225 页。

㊼ 哈贝马斯对韦伯也有类似的批判。可参看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Society*），Thomas McCarthy 译，Boston: Beacon，1984 年版；另有 Cambridge Polity 版，第 143—271 页。

㊽ 同上。（译按，原文误，应为同 46）

㊾《走向理性社会》，第 9 页。

㊿ 同上书，第 98 页。

(51) 对这一论题的充分讨论，参看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Legitimation Crisis*），Thomas McCarthy 译，Boston: Beacon，1975 年版；另有 Cambridge Polity 版。

(52)《走向理性社会》，第 115 页。

(53) 对这个概念的详细阐述，参看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Communic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Society*），Thomas McCarthy 译，Boston: Beacon，1979 年版；另有 Cambridge Polity 版。

(54) 同上书，第 97 页。

(55) 同上书，第 154—158 页。

(56)《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行动的合理性和社会合理化》，第 179 页。

第二章 波德里亚与电视广告

①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普泛化媒体与偶发性问题》（Generalized Media

and the Problem of Contingency），收入 Jan Loubser 等编，《社会科学一般原理探索》（*Explorations in General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New York: Free Press，1976 年版，第 2 卷，第 512 页。另可参看 Rainer C. Baum 收入同卷的论文《交流与媒体》（Commun-ication and Media），第 533—556 页。对媒体的社会学观点的评价与批判，
163 参看 Tod Gitlin 的论文《媒体社会学：主导范式》（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刊登在《理论与社会》（*Theory and Society*），1978 年第 6 期，第 205 页及以下。对于我们需要新工具才能“读解”电视这一论点的阐述，参看 John Fiske 和 John Hartley 著，《阅读电视》（*Reading Television*），London: Methuen，1978 年版。

② 参看欧文·考夫曼（Erving Goffman），《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New York: Doubleday，1959 年版，以及《交际仪式》（*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r*），New York: Anchor，1967 年版。

③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无位置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New York: Oxford，1985 年版。

④ 同上书，第 314 页。

⑤ 同上书，第 70 页。

⑥ 对新闻构建其观众 / 主体的方式的精彩分析，参看 Margaret Morse 的论文《电视新闻人格与可信度》（The Television News Personality and Credibility），收入 Tania Modleski 编，《娱乐研究：大众文化的批判方法》（*Studies in Entertainment: Critical Approaches to Mass Culture*），Bloomington: University of Indiana Press，1986 年版，第 55—79 页。

⑦ 我在 1986 年对加州奥兰治县生活富足的白人家庭进行了研究，我发现被调查者往往对看电视所花时间这一问题撒谎。在那份很长的调查表中，有些话题涉及隐私，但被调查者最难以承认他们实际看电视时间。

⑧ 罗兰·马尔尚（Roland Marchand），《广告与美国梦：为现代性开路，1920—1940 年》（*Advertising and American Dream: Making Way for Modernity, 1920—194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年版；该书是这类分析的极好例范，它像作者未刊论文《争夺的领地：消费者与广告商到底相逢何处？》（Contested Terrain: *Where* Do Consumers and Advertisers Meet?）一样，为人们理解对现代的定义的变化提出许多洞见。

⑨ 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对电视广告批判者的道德义愤的例证，参看拉希，《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被困的家庭》（*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New York: Basic，1977 年版，第 19 页及全书各处。

⑩ 马尔尚，《广告与美国梦》，第 11 页。

⑪ Vance Parkard，《隐藏的说服者》（*The Hidden Persuaders*），New York: D. McKay，1964 年版。

⑫ Beverle Houston 把电视假设为中心主题的对立面，并对其心理作用进行了极为出色的分析。参看 Beverle Houston 的论文《观看电视：无穷消费的心灵学》（Viewing Television: The Metapsychology of Endless Consumption），见《电影研究评论季刊》

(*Quarterly Review of Film Studies*)，1984年夏季号，第183—195页。我非常感激David James告知我这篇论文。

⑬ T. J. 杰克逊·李尔斯（T. J. Jackson Lears）和福克斯（Richard Wightman Fox）编，《消费文化：美国史批评论文选》(*The Culture of Consumption: Critical Essays in American History, 1880—1980*)，New York: Pantheon，1983年版，第xii页。

⑭ T. J. 杰克逊·李尔斯（T. J. Jackson Lears），《从拯救到自我实现》(From Salvation to Self-Realiza-tion: Advertising and the Therapeutic Roots of Consumer Culture，1880—1930)，收入《消费文化：美国史批评论文选》，第21页。 164

⑮ 同上书，第22页。

⑯ 同上书，第16页。

⑰ Nick Browne的文章很有创见，实属例外，尤其是《电影研究评论季刊》，1984年夏季号，第174—182页上的《电视（超）文本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elevision (Super) Text)。

⑱ 另一路左派批评指出了观众对广告音讯的抵制。参看Kathy Peiss，《廉价消遣：世纪转折时期纽约劳动妇女和休闲》(*Cheap Amusements: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年版；Susan Porter Benson，《反文化：美国百货公司中的女推销员、经理和顾客，1890—1940》(*Counter Culture: Saleswomen, Managers and Customers in American Department Stores, 1890—1940*)，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年版；Roy Rosenzweig，《为了我们所想的事而工作八小时：一个工业城市的工人与休闲，1870—1920》(*Eight Hours for What We Will: Workers and Leisure in an Industrial City, 1870—1920*)，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年版；Francis Couvares，《再造匹兹堡：一个工业化城市中的阶级和文化，1877—1919》(*The Remaking of Pittsburgh: Class and Culture in an Industrializing City, 1877—1919*)，Albany: SUNY Press，1984年版；以及Janice Radway，《读解罗曼史：妇女、父权制与通俗文学》(*Reading Romance: Women, Patriarchy and Popular Literature*)，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4年版。虽说这些著作记录了劳动阶级文化对资本主义诱惑的侵袭有某种反弹作用，但太强调这一点就会导致将一个世界浪漫化的危险，这个世界无疑屈从于信息方式的去社会化。

⑲ 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论文《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Notes Toward an Investigation))，收入《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Ben Brewster译，London: New Left Books，1971年版，第136页注。

⑳ 同上书，第153页。

㉑ 同上书，第155页。

㉒ 同上书，第160页。

㉓ 对这种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参看Teresa de Lauretis，《性别的技术：理论、电影和小

说论文选》(*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年版。

㉔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第160页。

165 ㉕ 同上书,第172页。

㉖ 同上书,第130页。

㉗ 波德里亚作品的英文选本,参看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编,《让·波德里亚:作品选》(*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Jacques Mourrain译, Cambridge: Po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年版;对波德里亚思想的评述,参看《让·波德里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及以后》(*Jean Baudrillard: From Marxism to Postmoder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Po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年版。

㉘ 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harles Belly和Albert Sechehaye编, Wade Baskin译,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年版。

㉙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自己的术语对语言结构的影响进行阐述,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是其中很与众不同的一位。参看威廉姆斯,《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Fontana, 1974年版;以及他编的《接触:人类交流及其历史》(*Contact: Human Communication and its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1年版。

㉚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时尚系统》(*The Fashion System*), Matthew Ward和Richard Howard译,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83年版,第288页;原版发行于1967年。

㉛ 同上书,第234页。

㉜ 关于这一过程的详细历史,参看Rosalind H. Williams,《梦想世界:十九世纪晚期法国的大众消费》(*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Century Fra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年版。另外亦可一阅的是Michael Miller,《大商场:资产阶级文化与百货商店,1869—1920》(*The Bon Marche: Bourgeois Culture and the Department Store, 1869—192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年版。

㉝ 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神话》(*Mythologies*), Annette Lavers选译,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2年版,原版发行于1957年。

㉞ 巴尔特,《时尚系统》,第286页。

㉟ 同上。

㊱ 波德里亚,《生产之镜》(*The Mirror of Production*),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译, New York: Telos, 1975年版,第122页及以下。

㊲ 例如,英文著作可参看亨利·勒费布尔(Henri Lefebvre),《现代世界中的日常生活》(*Everyday Life in the Modem World*), Sacha Rabinovitch译,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1年版,第120页及以下。

㊳ 理查德·特迪曼（Richard Terdiman），《话语 / 反话语》（*Discourse/Counter-discourse: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ymbolic Resista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

㊴ 此处的论点与麦克卢汉的论点不同。麦克卢汉所强调的不是语言，而是感觉中枢（sensorium），即感知过程；参看麦克卢汉，《理解媒体：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New York: McGraw-Hill，1964 年版。 166

㊵ 波德里亚，《模拟》（*Simulations*），Paul Foss 等译，New York: Semiotext（e），1983 年版，第 2 页。

㊶ 同上书，第 147—148 页。着重号系原作者所加。

㊷ Gerry Gill，《作为意识形态的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 as Ideology），刊载于《竞技场》（*Arena*），第 69 期，1984 年，第 70 页。

㊸ 同上书，第 73 页。

㊹ 同上书，第 75 页。

㊺ 同上书，第 90 页。

㊻ 同上书，第 93 页。

㊼ 同上书，第 94 页。

㊽ 这已变成他 70 年代以后著作的一个突出主题。例如，可参看波德里亚，《致命的策略》（*Les Strategies fatales*），Paris: Bernard Grasset，1983 年版；以及《群众：媒体中的社会的内爆》（The Masses: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Marie Maclean 译，刊载于《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第 16（3）卷，1985 年春季号，第 577—589 页。

㊾ 波德里亚，《媒体中意义的内爆与群众中社会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Meaning in the Media and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asses），收入 Kanthleen Woodward 编，《信息的神话：技术与后工业文化》（*The Mytho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Postindustrial Culture*），Madison: Coda，1980 年版，第 145 页。

第三章 福柯与数据库

① 杰克·古迪（Jack Goody），《野性思维的驯化》（*The Domestication of the Savage Mind*），New York: Cambridge，1977 年版，第 79 页。

② 戴维·戈弗雷（David Godfrey）和道格拉斯·帕克希尔（Douglas Parkhill），《谷登堡续》（*Gutenberg Two*（*1979*）），Toronto: Porcepic，1980 年版，第 1 页。

③ 戴维·伯纳姆（David Burnham），《电脑国家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Computer State*），New York: Random House，1983 年版，第 42 页。

④ 詹姆斯·鲁尔（James B. Rule），《私人生活与公共监视：电脑时代的社会控制》（*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Surveillance: Social Controt in the Computer Age*），New York: Schocken，1974 年版，第 273 页。

⑤ 有关这一新技术的消息，请看 1985 年 5 月 20 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⑥ Gary Marx 的报道提供了社会控制能力的又一例证："（美国）国家安全局能够同时监听 54000 部打进或打出美国的电话。"参看《新型监督》（The New Surveillance），刊载于《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1985 年 5—6 月号，第 45 页；另可参看《我将盯紧你》（I'll Be Watching You），刊载于《异见》（*Dissent*），1985 年冬季号，第 26—34 页。

⑦ Michael A. Arbib，《电脑与控制论社会》（*Computers and the Cybernetic Society*），第二版，New York: Academic，1984 年版，第 168—172 页。

167 ⑧ 尽管在工业革命之前，绝大多数产品是为了私用的而不是为了买卖的。

⑨ 同样情形正因数字带式录音机（"DAT"）而重演。自 1986 年起，在日本和欧洲就可以买到，但美国音乐工业迄今还阻止进口这类产品。DAT 使得消费者能够制作出与数字编码的 CD 完全一样的复制品。唱片制造商害怕损失销售量，很有效地说服有关部门，使得消费者接触不到这项新技术。

⑩ 对这些服务以及它们对民主社会的潜含意义的广泛论述，参看 Kevin G. Wilson，《控制的技术：新型家用互动媒体》（*Technologies of Control: The New Interactive Media for the Home*），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8 年版。

⑪ 同上书，第 35 页。

⑫ 参看古迪，《野性思维的驯化》，第 68 页及以下。

⑬ 哈罗德·A. 英尼斯（Harold A. Innis），《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Mary Q. Innis 编，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72 年版，第 7 页；原版发行于 1950 年。

⑭ 麦克卢汉的著作中应参看《理解媒体：人的延伸》（*Unders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New York: McGraw-Hill，1964 年版。

⑮ 安冬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Cambridge: Polit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版，第 100 页。

⑯ 同上。

⑰ 这一观点的例子，参看 Edgar Morin，Claude Lefort 和 Jean-Marc Courdray［aka Cornelius Castoriadis］，《一九六八年五月》（*Mai 1968: la Breche, premieres reflexions sur les evenements*），Paris: Fayard，1968 年版。

⑱ Ithiel de Solo Pool，《自由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Freedom*），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年版，第 251 页。

⑲ 增田米次（Yoneji Masuda），《作为后工业社会的信息社会》（*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s Post-Industrial Society*），Washington，DC: World Future Society，1981 年版，第 25 页；另可参看 Hans Magnus Enzensberger，《意识工业：论文学、政治与媒体》（*The Consciousness Industry: On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the Media*），New York: Seabury，1974 年版。

⑳ 参看 Charles H. Cooley，《社会组织：对更开明的思想的研究》（*Social Organization: A*

Study of the Larger Mind），New York: Scribner's，1909 年版，第 23 页。

㉑ 古迪，《野性思维的驯化》，第 68—70 页。

㉒ 更多的例证可参看《新闻周刊》，1986 年 3 月 17 日，第 71 页。

㉓ 福柯，《两个讲座》，收入 Colin Gordon 等译，Colin Gordon 编，《权力 / 知识：谈访选编及其他》（*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1972—1977*），New York: Pantheon，1980 年版。

㉔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The Methodology of the Social Sciences*），Edward Sils 和 Henry Finch 译编，New York: Free Press，1949 年版，第 59 页。另可参看《以科学为业》（Science as a Vocation），收入《韦伯文选：社会学论文》（*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H. Gerth 和 C. Wright Mills 译编，New York: Oxford，1958 年版，第 129—156 页。 168

㉕ 福柯，《监督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Alan Sheridan 译，New York: Pantheon，1977 年版，第 24 页。

㉖ 同上书，第 217 页。

㉗ 有关这一过程的详细历史，参看 Rosalind H. Williams，《梦想世界：十九世纪晚期法国的大众消费》（*Dream Worlds: Mass Consumption in Late Nineteen-Century France*），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年版。

㉘ Jane O. Newman 对《圣经》不同印刷版本的真实性的争议进行了引人入胜的讨论。参看《言印成字：机械复制时代的路德 1522 年版〈新约〉》（The Word Made Print: Luther's 1522 New Testament in an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刊载于《表征》（*Representations*），第 11 期，1985 年夏季号，第 95—133 页。

㉙ 我对 Leslie Rabine 向我指出书籍生产技术这方面的变化深表感激。

㉚ 福柯，《监督与惩罚》，第 220—221 页。

㉛ 同上书，第 220 页。

㉜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Geoff Bennington 和 Brian Massumi 译，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年版，第 67 页。

第四章 德里达与电子书写

① Gregory Ulmer，《应用文字学》（*Applied Grammatology: Post（e）-Pedagogy from Jacques Derrida to Joseph Beuy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第 303 页。

② 同上书，第 36 页。

③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伽亚帖·斯皮瓦（Gayatri Spivak）译，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4 年版，第 86—87 页。

④ 雅克·德里达，《立场》（*Positions*），Alan Bass 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年版，第 13 页。

⑤ 雅克·德里达,《哲学的一般状态》(Philosophie des etats generaux),收入《哲学的一般状态》(*Etats generaux de philosophie*),Paris: Fammarion,1979 年版,第 32、38、39、40、41 页。另外,德里达以赞许态度简短地应对了 Regis Debray 的谈话。参看第 169—170 页。

⑥ 同上书,第 41 页。

⑦ 关于注释的会议,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C Irvine),1988 年 4 月 10 日。

169 ⑧ 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论包工头与读者》(Of Lumpers and Readers),刊载于《思想史通讯》(*Intellectual History Newsletter*),第 10 期,1988 年,第 5 页。对文本与上下文(语境)关系的精彩论述,参看 Gregory Jay,《价值与解构:德里达、索绪尔与马克思》(Values and Deconstructions: Derrida, Saussure, Marx),刊载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第 8 期,1987—1988 年冬季号,第 153—196 页。

⑨ 德里达,《哲学的边缘》(*Margins of Philosophy*),Alan Bass 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年版,第 318 页。

⑩ 正如许多评论者已经注意到的,德里达的观点很难概括。由于他在表达他的观点时常常变换术语,因此连对他的观点进行释义都很成问题。有关思想史家对此论题的重要争论,参看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论文《思想史再思考与文本阅读》(Rethink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Reading Texts),收入拉卡普拉和 Steven Kaplan 编,《欧洲现代思想史》(*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 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年版,第 47—85 页;对方观点参看《为释义欢呼》(Two Cheers for Paraphrase: The Confession of a Synoptic Intellectual Historian),刊载于《斯坦福文学评论》(*Stanford Literary Review*),1986 年春季号,第 46—61 页。尽管对解构主义进行概括必然很冒险,但也不乏成功的努力。克里斯托弗·诺里斯(Christopher Norris),《德里达》(*Derrid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版,便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⑪ 这些术语有“处女膜”(hymen)、“(解毒)药”(pharmakon)、“折叠”(fold)、“增补”(supplement)和“播撒”(dissemination)等。

⑫ 有关德里达的文本,请参看《地缘心理分析与“世界上的其他人”》(Geopsychanalyse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刊载于《穿衣镜:创造他者》(*Psyche: Inventions de l' autre*),Paris: Galilee,1987 年版。另可参看米歇尔·赖安(Michael Ryan),《马克思主义与解构》(*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2 年版。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承认解构主义有用,且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参看其《政治无意识》(*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 Symbolic Act*),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 年版。另外对这一问题很有启发的是 Roberto Unger 的《社会理论,状态与任务》(*Social Theory, its Situation and its Task*),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版;以及《政治学:建设性社会理论的工作》(*Politics: A Work of 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版。尽管 Unger 没有使用后结构主义的任何术语,但他呼吁要对制度性常规和

习惯进行彻底地去稳定化，这便与解构主义者对文本进行的操作非常相像了。

⑬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Thomas Common 译，New York: Random House，无日期，第 11 页。

⑭ 德里达，《书写与差异》（*Writing and Difference*），Alan Bass 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8 年版，第 293 页。

⑮ 德里达，《论文字学》，第 5 页。 170

⑯ 同上书，第 4 页。

⑰ 德里达，《播撒》（*Dissemination*），Barbara Johnson 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 年版，第 33 页。

⑱ 德里达的论文《有关新语症、求新主义、求后主义、寄生主义以及其他微不足道的震撼主义的一些声明和老生常谈》（Some Statements and Truisms About Neologisms, Newisms, Post-isms, Parasitisms, and Other Small Seismisms），收入 David Carroll 编，《理论的诸状态》（*The States of The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 年版。在这篇论文中，德里达回到了怪物主题，在这里当然是“理论的”怪物。他把“怪物”（monster）标志变化了，使它包括种种总体化观点。这些只是“正常的怪异性”（normal monstrosities），与诸如解构主义这种“从不呈现为如此怪物”并总是“难以认识且被误解”的“怪异的怪异性”（monstrous monstrosities）迥然有别。德里达此时不再把目前情境或新时代称为怪物，但他还是重复着他对自己观点的这种归纳。我们起码可以说他的这种归纳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当他说他的观点是一种“怪物”的同时，却又断言“怪物”从不呈现为如此怪物。于是，他的表述便使这种怪物正常化了，因此也就不能表征这一怪物。

⑲ 参看 Leslie Rabine 的论文《女性主义的无身份政治》（A Feminist Politics of Non-Identity），《女性主义研究》（*Feminist Studies*），第 14 卷，第 1 期，1988 年春季号，第 11—31 页。另可参看 Alice Jardine，《创女记》（*Gynesis: Configurations of Woman and Modernity*），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

⑳ 德里达宣称，“我坚持认为，解构主义不是中立的。它是介入的。”《立场》（*Positions*）第 93 页。

㉑《论文字学》，第 9 页。

㉒ 同上书，第 10 页。

㉓ 同上书，第 9 页。

㉔ 同上。

㉕ 德里达，《边缘》，第 320 页。

㉖ 同上书，第 310 页。

㉗ Michael Heim，《电子语言：文字处理的哲学研究》（*Electric Language: A Philosophical Study of Word Processing*），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版。他在此书中也有类似看法。“数字书写取代了书籍的框架工程：它自动地控制着原材料从而取代了手艺者对付该材料应有的精心；它使人们从关注书籍中的个人表现，转而关注算法

步骤更一般的逻辑；它将对观念的从容扎实的沉思性阐述转化为过于丰富的动态可能；它使私人思辨性读写的隐世孤寂转变为一个公共网络，其中原作者身份所需的个人象
171 征性框架因为与人类表现的总体文本性相连而受到威胁。”第 191 页。

㉘ 有关该检验的讨论，参看 A. M. 图灵（A. M. Turing），《计算机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刊载于《心智》（*Mind*），第 59 卷，第 236 期，1950 年 10 月，第 433—460 页。

㉙ 打字机可能会被认为能达到与此相同的目的。然而，每一台打字机都会在纸上留下不同的痕迹，这一点每一个侦探小说迷都知道。

㉚ 作家当然可以保存他对文档所做的每一处或每一组修改，进而保留其作品创作的历史。我怀疑很少有人会这样做，或者即便如此也肯定比不上手稿能保留的改动的相对完整性。

㉛ 完整的文本由该中心出版。参看利奥塔，《非物质事物：书写的试验》（*Les Immateriaux: Epreuves d'ecritures*），Paris: Centre Georges Pompidou，1985 年版，第 7 页。另外值得参看的有 John Rajchman 的评论，《后现代博物馆》（The Postmodern Museum），刊载于《美国艺术》（*Art in America*），1985 年 10 月，第 111—117，171 页。

㉜《非物质事物》，第 19 页。

㉝ 对身份形成中城市的作用的阐释，参看乔治·齐美尔（George Simmel），《货币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Tom Bottomore 和 David Frisby 译，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78 年版。

㉞ 在信息方式之前，这样的匿名主体性出现在报纸上的私人广告中。虽说在这些广告中有很多身份游戏的成分，但它们不容许进行更广泛的交谈。我感谢 Renee Fraser 将私人信息与电脑音讯服务联系起来。

㉟ 音讯服务在美国已越来越常见了。纽约有一家叫做“上线”（Aline）的音讯服务非常成功，很像下文描述的法国迷你电信的“信使”（messagier）。参看“数据游戏”（The Data Game），刊载于《新共和党人》（*The New Republic*），1989 年 2 月 13 日，第 20—22 页。

㊱ 关于迷你电信的有趣历史，参看 Marie Marchant，《迷你电信的伟大冒险》（*La Grande Aventure du Minitel*），Paris: Larousse，1987 年版。到 1988 年，大约已有三百万迷你电信用户。参看“The French Videotex Connection”，刊载于《科技论题》（*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第 4 卷，1987 年秋季号，第 108 页。

㊲ 参看 Justine De Lacy，《法国人正爱上电脑并借助电脑而恋爱》（The French Are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ir Computers and Through Them），《纽约客》（*New Yorker*），
172 1987 年 7 月 31 日。另可参看论迷你电信的专论，《迷你电信年》（L'Annee du Minitel），刊载于《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第 1156 期，1987 年 1 月 2—8 日，第 40—47 页。

㊳ De Lacy，《法国人正爱上电脑并借助电脑而恋爱》，第 92 页。

㊴ Marie Marchant，《迷你电信的伟大冒险》，第 138 页。

㊵ Marie Marchant,《迷你电信的伟大冒险》,第 74 页。
㊶ 同上书,第 69 页。
㊷ 同上书,第 144 页。
㊸ 同上书,第 138 页。
㊹ 同上书,第 93 页。
㊺ 同上。
㊻ Starr Roxanne Hiltz 和 Murray Turoff,《网络国家:借助电脑的人类交流》(*The Network Nation: Human Communication via Computer*),London: Addison-Wesley,1978 年版,第 xxvi 页。
㊼ Jessie Bernard,《社区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Glenview. Ill.: Scott-Foresman,1973 年版,第 181 页。
㊽ Hiltz 和 Turoff,《网络国家》,第 xxix 页。
㊾ 对电脑会议的精彩讨论与分析,参看 Andrew Feenberg,《电脑会议与人文科学》(Computer Conferencing and the Humanities),刊载于《教学科学》(*Instructional Science*),第 16 期,1987 年,第 169—186 页。
㊿ Andrew Feenberg 的未刊论文《主持一次教育远程会议》(Moderating an Educational Teleconference)注意到了电脑会议的这一特征。
(51) Hiltz 和 Turoff,《网络国家》,第 105 页。
(52) 同上书,第 472 页。
(53) Marc Guillaume 把这种新的关系称为“光谱式的”。参看 Catherine Bidou,Marc Guillaume 和 Veronique Prevost,《远程电信的普通之处》(*L'ordinaire de la telematique*),Paris: L'Iris,1988 年版。
(54) 电子书写,尤其是电脑会议的许多特征可能显得与哈贝马斯的“理想化的言语情境”这种反事实的观念相一致。Timothy Luke 和 Stephen K. White 在《批判理论、信息革命与走向现代性的生态之路》(Critical Theory,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an Ecological Path to Modernity)一文中做出如此论点。该文收入 John Forester 编,《批判理论与公共生活》(*Critical Theory and Public Life*),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85 年版,第 22—53 页。Paul Rabinow 向我指出,电脑会议似乎消除了言语行为的非对称性语境,因而促进了它对“普遍有效性要求”的例示作用。按此观点,电脑会议完全可说是非扭曲的交流,大体上能为公共领域提供自由进入的可能,而同时又能消除诸如金钱与权力等系统媒介,这些媒介是生活世界“正常”交往情境中的扭曲因素。虽说哈贝马斯主义者可能会进行这样的深入思考,但我认为解构主义者对电子书写中的自我构建的再构型这一观点将是更有成果的分析。对哈贝马斯的观点持赞同态 173
度的论点,可参看 Peter Dews,《分解的逻辑》(*Logics of Disintegration: 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London: Verso,1987 年版。
(55) 德里达,《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及其以后》(*The Postcard: From Socrates to Freud and Beyond*),Alan Bass 译,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年版,第 5 页。

㊺ 对《明信片》很有启发的讨论，参看《传递的解脱与信件的付费》（*Affranchissement du transfert et de la lettre*），Paris: Confrontation，1982 年版，尤其参看德里达所参与的言论。

㊼ 弗洛伊德，《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 Norton，1963 年版，第 39 页。

㊽《明信片》，第 44 页。

㊾ 同上书，第 121 页。

㊿ 同上书，第 404 页。

(61) 同上书，第 62 页。

(62) 同上书，第 103 页。

(63) 同上书，第 193 页。

(64) 格雷戈里·厄尔默（Gregory Ulmer），《后时代》（The Post-Age），刊载于《发音符号》（*diacritics*），第 11 期，1981 年，第 43 页。

(65) 同上书，第 104—105 页。

(66) 同上书，第 105 页。

(67) 参看 Stephen Kern，《时间与空间的文化：1880—1918》（*The Culture of Time and Space: 1880—1918*），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年版。

第五章　利奥塔与电脑科学

① 肖肖尼·朱波夫（Shoshana Zuboff），《聪明机器的时代》（*In the Age of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New York: Basic Books，1988 年版，第 88—89 页。

② Larry Hirschhorn，《内心的工作场所：组织生活的心理力学》（*The Workplace Within: Psycho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Life*），Cambridge，Mass.: MIT Press，1988 年版。

③ Harry Braverman，《劳动与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74 年版；另可参看 David Noble，《生产力种种：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New York: Knopf，1984 年版。

④ 大学通过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新发展而与公司及国家发生联系，有关这方面的困难的讨论，参看 Jon Wiener，《校园资本主义：哈佛追逐生物工艺钱》（Campus Capitalism: Harvard Chases Biotech Bucks），刊载于《国家》（*The Nation*），1989 年 1 月 2 日，第 12—16 页。

174 ⑤ 对这一时期科学的复杂性的评价，参看 Frank E. Manuel，《艾萨克·牛顿画像》（*A Portrait of Issac Newton*），Cambridge，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年版。

⑥ 对“实验室”令人信服的社会认识论分析，参看 Bruno Latour，《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构筑》（*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Beverly Hills: Sage Publications，1979 年版。

⑦ Susan R. Bordo 提出了这一论点，参看《向客观性遁逃》（*The Flight into Objectivity: Essays on Cartesianism and Culture*），New York，Albany: SUNY Press，1987 年版。对

科学认识论的社会学中的各种新方向的讨论，可参看 Geof Bowker 和 Bruno Latour，《没有纪律的新兴学科：法国的科学（社会）研究》（A Booming Discipline Short of Discipline:（Social）Studies of Science in France），刊载于《法国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in France*），第 17 期，1987 年版，第 715—748 页。

⑧ 例如，可参看 Evelyn Fox Keller，《对性别与科学的思考》（*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

⑨ 例如，Stanely Aronowitz，《作为权力的科学：现代社会中的话语与意识形态》（*Science as Power: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Modern Societ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年版；另可参看 Joseph Rouse，《知识与权力：走向科学政治哲学》（*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版。

⑩ 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中，哈贝马斯没有讨论利奥塔。参看 Frederick Lawrence 译本，Boston: MIT Press，1987 年版。曼弗雷德·弗兰克（Manfred Frank）于 1988 年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系列讲座弥补了这一不足。他对利奥塔进行了哈贝马斯式的分析，在分析中，他指责利奥塔具有失范非理性（normless irrationalism）倾向，在讨论中，甚至指责他助长新法西斯主义。参看 Rainer Rochlitz，《德国哲学面对法国思想》（Des Philosophies allemands face a la pensee francaise: alternatives a la philosophie du sujet），刊载于《批评》（*Critique*），第 464—465 期，1986 年 1 / 2 月号，第 7—39 页。Rochlitz 的评述包括弗兰克的《何谓新结构主义？》（What is Neostructuralism？），他反对后结构主义者基于语用学对意义进行增值，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不可能靠“文学阐释的不可穷尽性”这一原则生存。Eve Tavor Bannet 对后结构主义与批判政治持比较赞赏的观点，参看她的《结构主义与异见逻辑：巴尔特、德里达、福柯、拉康》（*Structuralism and the Logic of Dissent: Barthes, Derrida, Foucault, Lacan*），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9 年版。

⑪ 福柯，《海居琳·芭宾，刚刚发现的一个十九世纪法国两性人的回忆录》（*Herculine Barbin, Being Recently Discovered Memoirs of a Nineteenth-Century French Hermaphrodite*），Richard McDougall 译，New York: Pantheon，1980 年版，法国版出版于 1978 年。

⑫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尤其参看第 266—293 页。 175

⑬《何谓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收入 Paul Rabinow 编，《福柯读本》（*The Foucault Reader*），New York: Pantheon，1984 年版，第 32—50 页。

⑭ 吉勒斯·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千座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Brian Massuri 译，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7 年版，第 3 页。

⑮ 同上书，第 492 页。

⑯ 同上书，第 458 页。

⑰ 欧内斯托·拉克洛和尚塔尔·莫菲（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走向激进的民主政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Winston Moore 和 Paul Cammack 编，London：Verso，1985 年版，第 152、112 页。

⑱ 同上书，第 113 页。

⑲ 同上书，第 167 页。

⑳ 同上书，第 4 页。对他们的观点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批判，以及他们的回答，参看 Norman Geras，《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刊载于《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 163 期，1987 年 5/6 月号，第 40—82 页；以及拉克洛和莫菲，《不加辩护的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 without Apologies），刊载于《新左派评论》，第 166 期，1987 年 11/12 月号，第 79—106 页。

㉑ 1989 年 4 月 20 日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举办的题为“霸权的逻辑与政治”的研讨会。

㉒ 拉克洛和莫菲，《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 107 页。

㉓《建立一个新左派：与拉克洛的访谈》（Building a New Left: An Interview with Ernesto Laclau），刊载于《策略》（*Strategies*），第 1 卷，1988 年秋季号，第 10—28 页。

㉔ 利奥塔，《后现代状况》（*The Postmodern Condition*），Geoff Bennington 和 Brian Massumi 译，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4 年版，第 xxiii 页。

㉕ John Kenneth Galbraith，《新工业国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New York: Signet，1967 年版。

㉖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启蒙辩证法》（*Dialectics of Enlightenment*），John Cumming 译，New York: Seabury，1972 年版。

㉗ 例如，在最近有关冷核聚变的争议中，对于传播最初的研究结果，电脑所起的作用是重要的，但并非必不可少。全世界的公告牌和电脑会议辩论 Fleischman 和 Pons 的核聚变实验，为科学家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环境。参看《网络能够阻碍研究》（Networks Can Hinder Research），刊载于《国际信使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1989 年 6 月 9 日，第 13 页。

㉘ Evelyn Fox Keller，《对性别与科学的思考》（*Reflections on Gender and Science*），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5 年版，第 64 页。

㉙ 我决定联系利奥塔的著作和信息方式下的科学问题对电脑科学学科进行探讨。我之
176 所以会想到这个领域，是因为它既新又与本章主题有明显的联系。我非常感激 Leigh Star 和 Rob Kling 建议我查看图灵奖论文，以此作为有用的索引，了解电脑科学家界定他们的研究领域的方式。对图灵的成就的非专业化的解释，参看 John Shore，《沙氏算法与电脑焦虑症的其他解救良方》（*The Sachertorte Algorithm and Other Antidotes to Computer Anxiety*），New York: Viking，1985 年版。

㉚ Jack Carlson，《论电脑科学教育大纲的确定》（On Determining 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Programs），刊载于《计算机协会通讯》（*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第 9 卷，第 3 期，1966 年 3 月，第 135 页。

㉛ Luis Fein，《计算机协会有身份危机吗？》（ACM has a Crisis of Identity？），刊载于《计算机协会通讯》，第 10 卷，第 1 期，1967 年 1 月，第 1 页。

㉜ Maurice Wilkes,《那时的电脑和现在的电脑》(Computers Now and Then),刊载于《计算机协会学报》(*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第 15 卷,第 1 期,1968 年 1 月,第 7 页。

㉝ R. M. Hamming,《电脑科学的一家之见》(One Man's View of Computer Science),刊载于《计算机协会学报》,第 16 卷,第 1 期,1969 年 1 月,第 5 页。

㉞ Peter Denning,《回顾与展望》(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Ahead),刊载于《计算机协会通讯》,第 14 卷,第 12 期,1971 年 12 月,第 820 页。

㉟ Allen Newell 和 Herbert Asimon,《作为经验探究的电脑科学》(Computer Science as Empirical Inquiry: Symbols and Research),刊载于《计算机协会学报》,第 19 卷,第 3 期,1976 年 3 月,第 125 页。

㊱ John E. Hopcroft,《电脑科学:一门学科的新兴》(Computer Science: The Emergence of a Discipline),刊载于《计算机协会通讯》,第 30 卷,第 3 期,1987 年 3 月,第 201 页。

㊲ 对"弱"思维的辩护论点,参看 Gianni Vattimo,《现代性的终结:后现代中的虚无主义与阐释学》(*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John R. Synder 译,Cambridge: Polity Press,1988 年版。

㊳ 利奥塔和泰波(Jean-Loup Thebaud),《公正游戏》(*Just Gaming*),Wlad Godzich 译,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5 年版,第 4 页。"对于对话话语的控制,甚至对于柏拉图意义上的辩证话语的控制,在我看来,都是与权力相联系着,由于它的最终目的乃是对对话伙伴所交换的陈述的效果进行控制……"

㊴ 在有一个地方,利奥塔在哲学家的位置之外寻求他的话语身份:"我不相信自己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一个'政治家'。"同上,第 55 页。 177

㊵《妇女斗争中的一件关键事情》(One of the Things at Stake in Women's Struggle),Deborah Clarke,Winifred Woodhull 和 John Mowitt 译,刊载于《实质》(*Substance*),第 20 卷,第 9 期,1978 年,第 13 页。原文见《异教主义基础》(Rudiments paiens: Genre dissertatif),第 7 章,Paris: Union Generale d'Edition,1977 年版。

㊶ 在第 xiii 页,利奥塔嘲弄人们使用"后(post)"这一前缀。整部书中,"后现代主义"这一术语只用了几次。在第 136 页,利奥塔又一次嘲弄地问道,后现代是否是"一个老头在终结性的垃圾堆中寻找残存食物而进行的消遣……并为自己的新发现感到荣耀……?"《歧见:有争议的习语》(*The Differend: Phrases in Dipute*),George Van Den Abbeele 译,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 年版。原法文版发行于 1983 年。

㊷ 利奥塔,《海德格尔与"犹太人"》(*Heidegger et "les juifs"*),Paris: Editions Galilee,1988 年版,第 45 页。

㊸ 对歧见与不可呈现之物的关系的一篇很不错的讨论,参看利奥塔,《有争议的见识,或马克思后面的康德》(Judiciousness in Dispute, or Kant After Marx),收入 Murray Krieger 编,《表征的目的:主体/文本/历史》(*The Aims of Representation: Subject/Text/Histor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 年版,第 23—68 页。

㊹ 保罗·德·曼（Paul de Man），《战时新闻，1939—1943》（*Wartime Journalism，1939—1943*），Werner Hamacher，Neil Hertz 和 Thomas Keenan 编，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88 年版。

㊺ Ken Anderson，Paul Piccone，Fred Siegel 和 Michael Taves，《公产极权主义的圆桌会议》（Roundtable on Communtarianism），刊载于《终端》（*Telos*），第 76 期，1988 年夏季号，第 2—32 页。

㊻《歧见》，第 162 页。

㊼ 弗朗索瓦·富莱（Francois Furet）对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创造的他所谓的“新的政治社会性”做出了很大贡献。参看《阐释法国大革命》（*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lborg Foster 译，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年，第 37、173 页。

人名索引

（人名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人名后的页码为原书页码）

Adorno，Theodor　阿多诺　33—35，142

Agnew，Jean-Christophe　阿格纽　18

Althusser，Luis　阿尔都塞　6，53—56，64

Anderson，Laurie　安德森　141

Austin，John　奥斯汀　41

Bacon，Francis　培根　40，87

Bakhtin，Mikhail　巴赫金　131

Barthes，Roland　巴尔特　57，59—61，64—65

Bataille，Georges　巴塔伊耶　131

Baudrillard，Jean　波德里亚　17，18，57—58，60—66，107，131，132

Bell，Daniel　贝尔　23—29

Bentham，Jeremy　边沁　89—90

Bourdieu，Pierre　布尔迪厄　152

Burnham，David　伯纳姆　70

Carlson，Jack　卡尔森　147

Chardin，Teilhard de　德日进　15

Cicourel，Aaron Victor　西屈雷尔　77

Cixous，Helene　西苏　150

Deleuze，Gilles　德勒兹　15，17，131，132，133，135—137，140

Denning，Peter　丹宁　148

Derrida，Jacques　德里达　17，18，64—65，76，78，81，99—111，114，124—127，131，132，152

Descartes，Rene　笛卡尔　81

Dick, Philip K. 迪克 4
Diderot, Denis 狄德罗 27
Durkheim, Emile 迪克海姆 77

Fein, Luis 费恩 147
Flaubert, Gustave 福楼拜 70
Foucault, Michel 福柯 7, 11, 17, 18, 44, 82, 87—93, 97, 107, 131, 132—135, 139—140
Fox, Richard Wightman 福克斯 52
Freud, Sigmund 弗洛伊德 57, 124—125, 138

Galbraith, John Kenneth 加尔布雷思 141
Garfinkel, Harold 加芬克尔 77
Giddens, Anthony 吉登斯 76—80
Gill, Gerry 吉尔 64—65
Godfrey, David 戈弗雷 70
Goffman, Erving 考夫曼 44, 77
Goody, Jack 古迪 76, 84
Gramsci, Antonio 葛兰西 44, 53, 55, 138
Guattari, Felix 瓜塔里 15, 133, 135—137, 140
Guillaume, Marc 纪尧姆 119

Habermas, Jurgen 哈贝马斯 34—35, 38—42, 47, 76, 78—80, 134—135, 150
Hall, Stuart 霍尔 16
Hamming, R.M. 哈明 148
Hegel, Georg 黑格尔 42, 80—81
Heidegger, Martin 海德格尔 145
Hiltz, Starr Roxanne 希尔兹 121, 123
Hopcroft, Jphn E. 霍普克罗夫特 148—149
Horkheimer, Max 霍克海默 33—35, 142
Hunt, Lynn 亨特 18

Innis, Harold 英尼斯 76
Irigaray, Luce 伊里加雷 150

Jameson, Fredric 杰姆逊 13, 14

Keller, Evelyn Fox 凯勒 145
Kuhn, Thomas 库恩 21

Lacan, Jacques 拉康 57, 64
LaCapra, Dominick 拉克普拉 18, 101
Laclau, Ernesto 拉克洛 18, 133, 137—140
Lacoue-Labarthe, Philippe 拉库-拉

巴尔特 152
Lasch, Christopher 拉什 52
Lears, T.J. Jackson 李尔斯 52—53
Lefebvre, Henri 列菲弗尔 62, 79
Levi-Strauss, Claude 列维-斯特劳斯 79
Locke, John 洛克 134
Luhmann, Niklas 卢曼 43—44
Lyotard, Francois 利奥塔 17, 18, 98, 114—115, 131, 132, 138, 141—146, 149—154

McLuhan, Marshall 麦克卢汉 2, 15, 45, 76
Man, Paul de 德·曼 152
Mandelbrot, Benoit 曼德尔布罗 144, 149
Marchand, Marie 马香 119—120
Marcuse, Herbert 马库塞 34—35, 39, 40
Marvin, Carolyn 马文 5
Marx, Karl 马克思 6—7, 8, 16, 26, 30—35, 37, 39, 40, 42, 77, 85, 93, 129, 134, 139, 150, 153
Megill, Alan 梅吉尔 18
Meyrowitz, Joshua 梅罗维茨 44—45
Morin, Edgar 莫林 79
Mouffe, Chantal 莫菲 18, 133, 137—140

Newton, Issac 牛顿 131
Nietzsche, Fredrich 尼采 81, 103, 150

Parkhill, Douglas 帕克希尔 70
Parsons, Talcott 帕森斯 43—44
Plato 柏拉图 81, 124, 143, 149
Porat, Mare 波洛特 23
Rousseau, Jean-Jacques 卢梭 90

Rule, James 鲁尔 71

Saint-Just, Luis Antoine Leon de 圣-茹斯特 139
Sartre, Jean-Paul 沙特 70, 110, 131, 138
Saussure, Ferdinand de 索绪尔 59
Searle, John 塞尔 76
Shannon, Claude E. 香农 28
Simon, Herbert A. 西蒙 148
Socrates 苏格拉底 124

Terdiman, Richard 特迪曼 14, 62
Thom, Rene 汤姆 144

Turoff, Murray 图罗夫 121, 123

Ulmer, Gregory 厄尔默 100, 127

Voltaire 伏尔泰 132

Weber, Max 韦伯 16, 26, 30, 35—40, 77, 88

Wiener, Norbert 维纳 28—29

Wilkes, Maurice 威尔克斯 147

Wilson, Kevin 威尔逊 75

Zuboff, Shoshana 朱波夫 129

译后记

本书的翻译于译者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本人不仅参阅了国内许多相关书籍，而且请教了诸多师友，获益匪浅。

首先我要感谢南京大学中文系周宪教授的信任、帮助和督促，使我有翻译本书的勇气。由于本书涉及的内容较广，且许多术语国内尚无定译，因此在参照有关著述时，时时向周宪先生讨教，并总会得到他详细耐心的阐述。初稿译出后，周宪先生又从百忙中挤出时间逐字逐句校对译文，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使译文增色很多，而他对后学的热忱平易亦使译者深为感激。

感谢商务印书馆的徐奕春先生和王仲涛先生的指导和关心。对东南大学文学院的江德兴院长、许苏明院长和袁久红兄的热心帮助，深表感谢，感谢朱国华兄与译者日常的“学术闲聊”。感谢邢爱玲小姐牺牲许多时间为我打出了大部分文字。感谢我妻 Tina 任劳任怨的支持。

本书作者 Mark Poster 教授热心地解答了我的有关问题，并且

改正了原文中的一些印刷错误，本人在此深表谢意。

除了附于文中的原文外，另外还有一个贯穿全书的术语需要作一简单交代。原文中的 communication（s）在大多数情况下译为“交流”，但也视具体语境译为“传播”、“交往”、“通讯（手段）”、“交通”等。由于原书没有术语索引，而诸多术语译名不统一，也是出于个人的偏好，我在译文中附出了较多原文，希望能给读者的理解带来一点方便。

本书的翻译是在课余进行的，仓促的时间使我本来就很不足的学养很难给读者呈现出更好的译文，希望各位学者专家不吝赐教。

译者

1999 年 6 月于南京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MTM2MDM2NDdf5L+h5oGv5pa55byPLnppcA==",
  "filename_decoded": "13603647_\u4fe1\u606f\u65b9\u5f0f.zip",
  "filesize": 35347045,
  "md5": "b42b524019957762b87a591f4e3342fc",
  "header_md5": "9972a2b6263b4ea35f3a3ba324c2e1cb",
  "sha1": "79648a70f48727de1dfe2b02a4ccf185c57396a5",
  "sha256": "7d677e617469bccac8869cf9df78f6990231de801134b3d920a91b328bd73c88",
  "crc32": 1601982781,
  "zip_password": "wcpfxk&*^TDwcpfxk",
  "uncompressed_size": 44916100,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248,
  "pdg_main_pages_max": 248,
  "total_pages": 264,
  "total_pixels": 1072399168,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